

河南社科文摘

双月

2023·2

特稿

- 3 用新视角和新范式开辟中原学的新疆域 李庚香

主 编：宋淑芳

执行主编：马应福

编 辑：付彦松

中原学理论研究

- 7 现代化视域下中原学的研究趋向与未来发展

李庚香

- 11 中原学的研究旨趣

尹全海

- 14 中原学研究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张新斌

- 15 2021年中原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王学宾

中原学关联学科研究

- 22 中原学与河洛学

李庚香

- 27 构建中原经济学，奏响“新中原中心论”时代最

强音

李庚香

32 中原学关联学科的讨论及学科体系的初步架构

张新斌

中原学与中原文化

37 中原学之本:厚重博大的中原历史文化 王星光

43 中原学之夏文化研究的思考 李 龙

45 形塑共同体: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的内在耦合性
研究 王明钦,岳鹏星

中原学与二程思想

51 二程洛学与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第五次重构

李庚香

54 二程理学是中原学研究绕不开的“高峰”

李庚香

61 思想文化是黄河文化之魂 汪振军

66 二程家风文化的易学探源 王 璋

71 二程理学对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影响 吴建设

74 二程理学是中原学的灵魂 魏 涛

主管主办: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地址:郑州市丰产路23号

邮编:450002

电话:(0371)63935606 63921208

印数:100

准印证号:河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
[省直]011号

发送范围:本系统

印刷: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3年4月

用新视角和新范式开辟中原学的新疆域

◇ 李庚香

摘要: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拥有厚重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建设中原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河南探索。因应历史要求,中原学必须担负起构建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炎黄学、宋学、黄河学、洛阳学等四个学科领域,共同构成了中原学的“四梁八柱”。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驾驭现实,如何用历史、哲学、文化思考支撑信心,如何用制度分析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原学研究的三大核心方法。要认真区分精华与糟粕,增强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中定位中原学,注重研究地域性、流域性与民族性、国家性问题,研究根祖、根亲、根系问题,研究“道之体”与“道之用”等问题,努力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

关键词:思想重构;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原学

一、积极参与中华民族第八次思想重构

在中华民族思想史和复兴史上,有七次思想重构属于过去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在他看来,“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七次思想重构。第一次,诸子百家与“百代都行秦政法”。问题是秦之短命或历史倾覆引发深层思考,德法关系成为关键。第二次,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实即被“意识形态化”了,从思想对策变成了统治工具。第三次,魏晋南北朝玄学。以道释儒,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对

立问题。第四次,隋唐儒释道并立。治世、治身、治心三位一体,中华思想体系对心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第五次,宋代理学和心学诞生。援道、佛入儒,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完成了本体化建构。第六次,冯友兰“以西释中”。1840年后,在遭受西方军事和经济双重冲击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特别强调公德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中体西用”说的意义被低估。到了近代,中原文化被重新唤醒。一是发现了甲骨文,二是敦煌的出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唐朝。中原文化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民胞物与、与时偕行、变易求新、和而不同、和为贵、以德治国、民贵君轻、求同存异、协和万邦等观念,至今仍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之源,对于新时代“中国之治”意义重大。第七次,近代以后,如何处理马、中、西的关系,成为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何以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

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与古代中国人的“大道之行”思想、“天下为公”理念有着紧密的关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理性,是相通相融的。“马魂中体外用”,成为我们正确处理本来、外来、未来的指导原则。

新时代,是第八次思想重构。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也是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局势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经历深刻变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树立国际视野,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只有坚持不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战略上更加主动,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把握才能更加深刻、更加自觉、更加坚定。

综览中原的文明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我们会发现,中原学的流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第一,中西文化的根性不同。中原文化的阴阳,不同于西方的因果。第二,儒墨道法兵诸子百家的融合,法家占了上风。第三,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农耕文明的被动性出现。第四,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仍然是儒是儒、道是道、佛是佛,但最后走向了融通。第五,儒释道三教融合,形成了宋明理学,特别是宋学,标志着中国学术的高峰出现。第六,在与西方文明的博弈中,中体西用的价值需要重估。第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如何处理马、中、西的关系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第八,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我们进入了一个

需要理论和思想的时代,如何进行思想重构、理论重构的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

二、构建区域性知识体系是中原学的重要任务

构建区域性知识体系或地方学,是中原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极大改变自身的同时,积极参与重塑世界秩序,必将导致知识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因应历史要求,中原学必须担负起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拥有厚重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201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要求,河南“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的文化发展哲学”。建构中原学,就是我们落实总书记这一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河南探索。

在我们看来,以下四个学科领域,都是需要中原学着力把握的,这四者也共同构成了中原学的“四梁八柱”。

(1)炎黄学。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祖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代表,是根,是源。炎黄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先,是中华文明之源。如何建立完整的民族与国家文化“道统”,意义十分重大。

(2)宋学。就时间轴而言,黄河文化演进流变到宋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经过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兵诸家的融合,到以长城为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与博弈,再到宋代援道、佛入儒,中华民族实现了第五次思想重构。二程体悟到的“天理”意义巨大,二程“洛学”在“宋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黄河学。黄河文明是一种大河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是一种道文明,具有崇道贵德、明礼尚法、执中求和的价值追求。黄河文明是一种流域文明,

并非简单的区域性大河文明,它是中华文明、国家文明的代表与象征。对黄河文明的研究,是中原学必须聚焦的学科领域。

(4)洛阳学或叫河洛学、河济学。河洛地区形成的河洛文化,是河洛学与洛阳学诞生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千年摇篮文化。要重视济水,重视研究济水在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以洛阳学引领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炎黄学、宋学、黄河学、洛阳学四个学科群的建设工作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四位一体”大学学科群的建设格局才刚刚形成,今后的建设之路还很漫长。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骨骼与主体,也是中原学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驾驭现实,如何用历史、哲学、文化思考支撑信心,如何用制度分析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原学研究的三大核心方法。

构建知识体系,对于中国人而言,是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走向何方”;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则要回答“何谓中国”,尤其是“何谓当代中国”以及“中国将如何发展”。知识体系的生产不是静态的单一结构存在,而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知识体系是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前提。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受知识生产的制约,它们是一个时代知识总体的建构和完善。话语权牵涉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但话语权必须建立在“真知灼见”的基础上。中原学研究的极其繁难之处在于,必须既研究历史又研究现实,既重视国内又重视国际,既重视物质又注重精神,既研究内涵又研究外延。这种“两难”,是中原学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新时代中原学建设要努力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

1.在中华文明中定位中原学,研究地域性、流域性与民族性、国家性问题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也具

有“多元一体”的特质。这里,“多元”是貌,“一体”才是本。只有确立中原学的主体性,我们才能够找到文化自信。弘扬地域文化,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文明。即是说,我们必须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要注意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深化地方学的研究才有意义。

2.进一步寻根溯源,研究根祖、根亲、根系问题

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古人应对自然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当前,要特别重视对夏文化的研究。要研究伏羲、黄帝的根祖文化,基于血缘的根亲文化,基于地缘的根系文化。

3.研究“道之体”与“道之用”问题

弘扬中华文明,包括弘扬中原文化的结晶华夏文明,要有道,更要善于把握“道之用”。“道”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在中国哲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这里,道是“天理”,是“规律”,是价值体系。道作为规律,需要长期探索。事实上,当人们“明道”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自觉地投身于“救世”,包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重视生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道”,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要重视对“道”或价值体系的研究。

4.认真区分精华与糟粕,参与第八次思想“重构”

从老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文化有精华与糟粕之辨,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时候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礼之用,和为贵”是孔子讲的,但前提是针对齐鲁地区“穿小鞋”“整人”“争”和“斗”的习惯而讲的。康百万庄园中的“留余篇”是对做事“不留余”的反思和规劝。“执中”是大智慧,但如何避免中庸的“圆熟”也是一大问题。这样看问题,我们才会看得更深刻一些,文化建设的针对性才会更强一些,才能承担起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5.增强开放性和包容性

中原文化本身是杂合的,能够兼容并蓄。首先,

黄河文化是儒墨法道相互融通的结果。其次,黄河文化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融的结晶。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鲜卑族对于融入汉族的自觉,满族对于汉文化的认同,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起到了极大作用。特别是中原文化在大礼乐文明基础上走向“斯文”,其内向性和内卷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正是草原文明的“尚武”精神对其进行了洗礼,从而保持了文与武的平衡。

6.在世界文明中研究中原文明问题

中西两种文明根性的不同,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要加强文明互鉴,在世界文明比较中研究中原学的“原生性”问题、“主体性”问题。

(1)西方重“分”,中国重“统”。与西方哲学重视天人二分、重视真实、强调逻辑相比,中国哲学重视天人合一、以天为则、重视生态,具有崇尚道德、辩证思维、内圣外王等特点。中西所有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以统为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质。

(2)西方重“个体”,中国重“共同体”。如果说西方立足于个体,那么,中国则立足于共同体(尤其是家庭、家族)。

(3)西方是“自由论”,中国是“秩序优先”。如果说西方主张“自由优先”,那么中国则重视“秩序优先”。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

分崩离析,特别是一盘散沙;对于秩序而言,则要探究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和活力。治理的要义就在于保持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做到既“井然有序”,又“充满活力”。西方重视平等,中国重视平衡。西方重视自由,中国重视自律。

(4)西方是“知识论”,中国是“境界论”。与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概念是理念、精神实体、形而上学、对象、本质、存在等知识论不同,中国哲学属于境界论。

(5)西方是“经济人”假设,中国是“公共事务动机”。西方重视“真实”;中国重视“真诚”,不仅重视事实的真实,更重视态度的诚实。西方的“经济人”假设与中国的“伦理人”预设是截然不同的。“公共事务动机”,构成了中原学的理论公设。

参考文献:

- [1]袁惠民.文化自信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J].理论视野,2020(2):17-21.

作者简介:李庚香(1966—),男,河南淮阳人,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力、现代化与中原学。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第10期)

现代化视域下中原学的研究趋向 与未来发展

◇ 李庚香

今天,我十分高兴。这是全省研究中原学力量的第一次会师和集结,对于开启中原学研究新局面,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子。

中原学从2016年提出到现在,2018年在省内开始被普遍接受,2021年开始折枝成林、开枝散叶。这一周,我讲了中原学与河洛学、中原学与二程理学、中原学与黄河学、中原学与新宋学四个专题,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可以说,中原学已经和炎黄学、黄河学、新宋学等成为河南地方学研究中的“显学”。

中原学之所以迅速成为河南地方学研究中的中坚力量,有如下四个原因。一是中原学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要求紧密相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后,我们开始了艰辛的河南探索,提出了中原学这一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现实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中原学与中华民族的第八次思想重构紧密相关。中原学是聚焦新时代、着眼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五次学术高峰,还有五四新文化、新中国、新时代,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八次重构。这五次学术重构,包括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习近平总书记重点提及了25位思想家,不仅有老子、庄子、韩非子的子学,还有二程的洛学、宋学。宋学大于洛学,包括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为新时代提供有效理论供给,是中原学

经世致用的最大动力。三是中原学的兴起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中国”的论断紧密相关。对应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原学要研究的不仅是地域、流域、区域,而且要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研究的是中国之中原、亚洲之中原、世界之中原,这就极大地超出了中原学研究的视界,使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学。四是中原学与大省河南、出彩河南的发展新路密切相关。过去是“老家河南”,现在是“出彩河南”。中原学既是理论,更是实践,始终坚持道与学、道与术的统一。

一、中原学与中国文明化进程

第一,中原学如何定位?之前,我们研究中原历史文化都是碎片化的,大家的研究各自为政,对中原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成体系。新时代中原学研究则有三个定位。(1)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这是新时代的真学问、大学问、暖学问。(2)新文科。它具有自科的基础和文理交叉的特点,是学问之学,是学术之学,是学科之学。(3)地方学。河南应该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应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第二,什么是中原学?中原学是五方之学。目前河南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地方学——炎黄学、殷商学(甲骨文学)、新宋学、河洛学(洛学、洛阳学)、黄河学共同构成了中原学的“四梁八柱”。在中原学中,黄河学特别是宋学,就时间轴而言,黄河文化演进流变到宋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严复指出,宋代对于现代中国民族性、世

界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锺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甚至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经过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兵诸家的融合,到以长城为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与博弈,再到宋代援道佛入儒,中华民族实现了第五次思想重构。因此,宋学、新宋学是中原学要着力把握的。“中”,就是要把旗帜插在高地上,因此,我们的学术理想就是能够让中原学学术思想在中原大地上高高飘扬。

第三,中原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是什么?始终坚持研究大历史观。河南省委原书记徐光春有一个论断: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判断,从史前文明到北宋,标志着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三千年的终结和两千年的开启,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和伟大再生力量。中原学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要实现对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体系化、系统化、学科化、学术化。

始终坚持大视野观。中原学作为一种地域学研究,必须超越地域。具有学术意义、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域其实是很少的,但中原在中华文明核心进程中作为总引领者,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看中国,知中国,是其显著特征。徽学的落脚点,具体是徽州,着眼点却是全局,即明末清初的经济转型。敦煌学展示的则是唐代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和核心地带,研究河洛文化、河洛学、洛阳学,要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研究。我们要把区域性研究上升到国家层面,在这个意义上洛阳学不仅是研究古代的城市,而且要研究中华文化,视野是整个中华文明。虽然研究的是个案,但进行的研究其实具有全局眼光。

始终坚持正确的文化观、文明观。始终在中华民族复兴史、河南出彩史的进程中进行把握。(1)根性研究,加强仰韶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研究根祖文化、根亲文化和根系文化,这是中原文化之“根”研究。要研究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要讲清楚“鼎立中原”“逐鹿中原”“得中

原者得天下”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例如,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皆有关联,夏商文化特别是夏文化对其产生了极大影响。三星堆文化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宗教的关系,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2)“基因”研究,就是要进行精神或价值研究,这是中原文化之“魂”研究。在这里,要突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制度”“中国规律”这些影响中华民族的基本因子。(3)“脉络”研究,即“主线”“结构”或“谱系”研究。中原学研究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先秦的“天人关系”经过魏晋的“体用关系”,在宋代变成了“理事关系”。魏晋玄学重视的是体用关系,以道学为体,以儒学为用。他们提出的是“无”“有”“独化”本体论观念。到了宋明理学,则是理事关系。“礼者,理也”,与理相对应的是“事”;理对应着“天”,“事”对应着人。理事关系,可以说是天人关系这一中国哲学主题的第三次变形。对于理和事的关系,中原理学有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理在事先,亦在事中;二是理在心中,亦在事中;三是理在事中,事在理先。魏晋玄学可以为存在找到终极依据,却不能为人的“立心”“立命”价值安顿找到依据,宋儒则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张载的“四为”是鲜明体现。(4)思想流变规律研究,突出中原学的学脉研究、思想史研究。一是中原子学,要写出积极的道家、真实的法家、朴素的墨家。二是两汉经学。三是魏晋玄学,对道家、儒家、名教与自然的初步整合。四是新宋学。五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中原学是五方之学,也有五大研究领域。这是中原学“谱系”中的五大“领域”。中原学研究包括中原子学(中原六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新宋学、新理学五个重点。宋学,包括廉、洛、关、闽诸学派。宋学特别是新宋学在中原学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洛学与关学的牵手,是极富新时代价值的。可以说,新宋学、新理学,特别是新宋学研究是中原学研究的重头戏。(5)精神谱系研究。中原文化史是人与自然搏斗史,也是精神锻造史。特别是治水实践,对于中原儿女临难不避、愈挫愈勇性格的形成极为重要。

总之,中原历史文化是地域文化、区域文化,也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具有二重性。研究中原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原历史文化研究是

河南学术研究的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是中原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

二、中原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原学要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原学建设要始终坚持三个注重。(1)中原学要更加注重“两个相结合”。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2)中原学要更加注重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的统一,是更有引领力和更有魅力的现代化。(3)中原学要更加注重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再定位”。一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过去是农耕文明,是自然经济,现在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科学技术的基础。人文与科学的结合尤为重要。

在国家层面,新时代中原学研究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讲清楚中国式民主,讲清楚中国价值,讲清楚如何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讲清楚如何构建有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如何保证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优选公共选择呢?我们必须把“中国式民主”说清楚。现在我们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来破西方的“选举民主”或“宪政民主”。民心不同于民意,民意(舆论)具有多变性,而民心(精神)具有复杂性。制度的活力基于信任。任何制度如果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就难以维持。民主必须莫基于“法治”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大智慧。

为什么要把“中国价值”说清楚?在“斯文”这一文化形态之下,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人文和道德。人文体现在中、和、价值上。道德体现在易、道、仁、理、心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是科学和民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价值取向是实践和生产方式,即我们的生产方式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我们所致力现代化是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现代化。新时代,复兴和创新则成为我们的时代价值。我们反对“普世价值”,但认为人类有共同利益,也有共同人类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同时,和平与和谐是中国价值的最高体现。如何才能实现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双循环”?如何实现中国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

的双循环,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否则,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何为中国,何为我们自己。

为什么要把精神性提上来,要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呢?我们有一个“能行好”的问题,还有一个“举立建”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因为现代世界以资本至上作为主导原则,在历史进程中因资本原则的内在矛盾,迄今面临着改弦更张的变局。然而,我们也需要破解重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面临的四个突出问题——精神性、创新性、公共性、生态性。一是精神性。这方面宋学提供了全新的阐释,特别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求,怎样为天地立心、怎样为生民立命,宋学追求心安理得,心学讲求心安,理学讲求理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就找到了,这对于精神性来说意义重大。二是创新性。宋学本身就是创新,宋学在宋代经受佛学的冲击而岌岌可危,但最后为什么屹立不倒?原因就在于创新。新宋学更是强调创新。讲到创新,包括河南传统文化里面中原文化、炎黄文化、黄河文化最为突出,发展到今天,如果不搞先进文化、现代文化、创新文化是不行的,必须和新时代相结合。三是公共性。传统文化没有解决公共性问题,儒家的“仁”“仁者爱人”,费孝通说是一种等级、一种差序格局,靠亲情来维系,越亲的聚得越紧,越往外越远,没有解决墨家“兼爱”的问题。佛教有慈爱,基督教有博爱,儒家没有解决感情往更大范围扩展的问题。但是宋明理学“以公释仁”就有了一个大的改变,“廓然大公”一下就把视野空间给扩大了。四是生态性。儒家所讲的“民胞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及“天人合一”说,认为天人本来就是一体的,不需要合。这里所包含的生态理念与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是高度契合的。从这几个角度来说,新宋学对于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创新性、公共性、精神性、生态性四大难题,都能提供思想资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实现了从精神上被动到精神上主动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得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新时代,我们如何在赢得时代主动的同时,实现历史主动,展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丰饶美丽,是我们在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上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就构建有引领力和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而言,关键是要增强主导力和认同力。要在文明话语权的基础上,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统一。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上,我们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在地域层面,就河南说河南,要把大省新路说清楚,讲清楚河南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讲清楚河南的国家创新高地建设,讲清楚河南的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讲清楚河南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讲清楚河南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的新作为,讲清楚河南的新型城镇化进程,讲清楚河南的乡村振兴。过去我们对河南的定位一直是“老家河南”。党的十八大之后,关于河南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河南时说,要“让中原更加出彩”;2019年调研河南时说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一个“更加出彩”,一个“奋勇争先”,一个“绚丽篇章”,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出彩河南”阶段。古、中、多、新是河南的特点。从“老家河南”经过“中原崛起”再到“出彩河南”,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复兴都是绕不开的。第一个背景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在中部崛起中,中原崛起是必然的。在国家东中西整体布局里面,中部又被提上来了,所以才有“新中原中心论”。在中国新发展格局中,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将形成新的“中原中心论”。在这个大布局里,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怎样才能传承和弘扬,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第二个背景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是新增增长极的形成。黄河流域规划纲要提出的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意味着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双城圈之后,中国第五个增长极有可能出现在洛阳和西安之间。二是黄河文明轴心带的形成。这为弘扬中原学提供了一个事实上的依据,因为大势在往这边汇聚,所以要研究过去的高峰。现在,河南国家战略叠加,有双循环国家战略,有中部地区崛起高质量发展战略,有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如果说中原学对应的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那么黄河学对应的则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在未来百年的新征程上,河南提出了“两个确保”的战略目标和十大战略体系,要求县域经济成高原。就中原学研究而言,最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两个:一是创新,二是乡村振兴。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把握新时代要求和河南的地方需求,进行理论供给。始终在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以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我们坚信,现代化的视野中,建设中原学、打造中原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也必然有助于我们迎来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光时刻”。

三、推动中原学研究起高峰

中原大地起高峰,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岳嵩山。在学术意义上,中原学里边要起高峰。除了中原历史文化之外,河南有三大研究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大省新路、乡村振兴、党性教育。这三个领域河南在全国是有话语权的。成一家之言的前提,就是要通古今之变。我们要正确处理老祖先和老祖宗的关系。中原学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以古闻名、以中联通、以新出彩。

就工作层面而言,主要是实现五化。(1)组织化。建立省级层面的中原研究会。(2)体系化。要通过更加体系化、理论化、学术化的《中原学通论》,推出中原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3)网络化。以《中原学慕课100讲》进行触网实践。(4)国际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实现中原学全球传播。在高校开设开放论坛,在国外首选地是日、韩。(5)大家化。拟成立中原学学术委员会,通过王震中、王中江、张宝明、刘志伟等学界人物的加盟,构建中原学学术共同体,打造中原学派。

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中原学能够深植中原大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出新出彩。

作者简介:李庚香(1966—),男,河南淮阳人,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力、现代化与中原学。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12期)

中原学的研究旨趣

◇尹全海

中原学,自2016年由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李庚香主席首度提出,业经学界同人共同努力,今已大见成效;作为参与其中一员,不仅乐见其成,更感欢欣鼓舞。然学术发展大抵“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后续建设有赖吾辈永继努力,日有精进,发扬光大。鉴于一学科之成立,当有明确的学科性质与问题意识,独特而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等学科基本理论。借参加“现代化视域下中原学的研究趋向与未来发展理论研讨会”之机,从中原学的性质、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大家关心的话题,谈谈中原学的研究旨趣。

一、中原学之性质

对于中原学之学科概念及其含义,学界基本达成一致、形成共识;中原学学科概念于2016年正式提出,亦无异议。但中原学从提出、发展到初见成效的内在动力,同样是中原学学科建设进程中必须明确的问题,不然中原学之学科性质将存在动摇、模糊、边界不清之虞。如同敦煌学是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首次提出,但敦煌学的起始则是1909年敦煌文书的发现。中原学之缘起及内在动力,既非“由新发现而成就的新学问”,如近世之敦煌学、甲骨学、徽学等,亦非因其首创者所居之地地名或水名命名之学,如宋代理学之濂学、关学、洛学、涑学、蜀学等,而是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的成

果。因此,中原学的性质是学科,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问,也不是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学派。

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就是将中原历史文化传统转化为中原学,中原学是中原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化。从中原文化到中原学,看似非常相似的概念,其实学术意义差别很大。比如中原文化的时空内涵,学界或以现今河南省行政区域,或以中原经济区的区域范围界定其空间范围;时间范围均以新中国成立为下限。而中原学是21世纪的新兴学科,时间范围涵括“自古及今”,类似于中国传统史学之“通史家风”,从远古至当下;空间范围则是把中原作为一个区域而不是地方,一个被后人发现的有特殊意义的区域。中原学把中原文化作为学科化之传统资源,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框架内,开展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建设,最终实现中原文化传统的当代复兴。

二、中原学之问题意识

目前全国范围内以地方文化研究、区域文化研究等命名的地方性或区域性“学”,争奇斗艳,各美其美;河南境内已有黄河学、炎黄学、河洛学(洛阳学)、开封学(新宋学)等。那么,中原学与上述诸学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要建设中原学,也是中原学建设者须向学界表明的问题,即中原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揆诸中国学术发展,自古以求真、致用为大端,

但往往有所偏废,如乾嘉学术为求真而排斥致用,康有为为维新变法而放弃求真,均不可取也。求真者亦有两途,如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于是被演绎为考据、辞章、义理、经济四途。中原学在研究旨趣上以求真达致用,既非义理之学,亦非考据之学,而是致用之学。

中原学的致用旨趣,核心就是以学科建设实现中原历史文化在当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表现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在观念层面上,中原文化传统往往从地理、政治、文化三个层面界定“中原”的空间意义,以至于形成中原与边疆、中心与外围、内地与沿海等二元对立性概念。其实,中原还是中华姓氏之根、中华文明之源、丝绸之路的起点,不仅蕴含空间意义还有时间意义;二元对立的概念就是在时间演变中形成的。最具注释意义的是梁启超关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论述逻辑。同样,中原不仅是中国之中原,也是世界之中原。中原学主张在时间中理解空间,对中原的空间意义作动态性解释,强调中原在时间上的绝对性和空间上的相对性,以及中原作为一个空间的结构过程。中原学以时间优势代替空间局限的创新观念,将成为内陆地区制定对外开放战略的逻辑起点。

在理论层面主要是见之于行动,“将施有政”。中原学可在2011年10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所设计的提高中原文化影响力、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塑造中原人文精神等方面有所作为。比如,可以通过挖掘中华姓氏、文字沿革、功夫文化、轩辕故里等根亲祖地文化资源优势等,“提升具有中原特质的文化内涵,增强对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通过“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塑造具有中原特质、体现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亦可在2016年10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

确定的建设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基地、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现代文化创新发展新高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基地等战略定位的具体实施方面有所作为。比如依托新郑黄帝故里、淮阳太昊陵、内黄颛顼帝喾陵、商丘燧皇陵、桐柏盘古之乡、泌阳盘古圣地、西华女娲城等文化遗迹,建设人文始祖拜谒地,形成“河洛是故乡”“寻根到中原”的文化认同,具体实施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建设工程。

三、中原学之研究内容

地方之学,因“地近则易核、时近则易真”二便,言一方之全史,亦因其以“观风问俗”为目标,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往往停留在地方性话题。中原学不是中原地方之学,而是中原区域之学,以中原区域为研究对象。作为区域的中原,与中国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与作为地方之中原区别在于,区域中原可以超越国家界限,可视为全球视野下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于是,作为区域之学的中原学,研究内容可以是国家层面的话题,也可以是世界性话题。

中原区域之学,从中原区域出发,发现并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内陆诸省和沿海各省遇到的发展问题各不相同,内陆省份中河南遇到的问题与陕西、山西等省遇到的发展问题又不同,中原学的研究内容是从中原作为一个区域遇到的问题出发,研究其在中原、在全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意义。比如21世纪的中原学界先后提出黄河学、炎黄学、中原学、河洛学这一文化现象,本身就可以作为中原学研究内容;若能够超越中原区域,而是在全国范围甚至在世界范围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自然会发现这一文化现象在全国范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以此为研究内容探讨21世纪中国区域学或地方学的生成机理,便是从中原出发探讨全国性话题。

中原学从中原区域出发,发现并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一方面可以避免把中原学描述为全国层面学术研究的地方版,模糊整体和局部的差异;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突显中原学独特而具体的研究对象,用以区别其他区域学或地方学。由于中原学尚处于建设之中,研究领域又关注当下,中原学的研究内容可能会因时而动。根据我的理解,相对稳定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中原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概念、学科功能、研究方法、学术史等,类似于“绪论”。第二,中原区域的结构过程。用于界定中原学的区域性而非地方性,据此发现并确定中原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区域的中原,是由中原人的禀赋界定的中原,而不是由地理范围或行政范围界定的中原。第三,中原历史文化遗产。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遗产,既是中原学的学术资源,也是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的基础与起点。第四,中原人文精神。主要从具有中原特质、体现时代特征两个方面提炼中原人文精神的载体和谱系。第五,中原经济区。经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中原经济区,是从经济战略角度界定中原作为一个区域的官方行动,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一个区域战略,当纳入中原学的研究范围。第六,中原学人、中原学案,按照中原学的学脉与宗旨,自宋代的洛学,至当下中原学,其中包括学人、著述及其学术思想。

四、中原学之研究方法

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一样,是一个学科成立的基本条件。中原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属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所谓新兴,系因其诞生于21世纪初,或者说正名于21世纪初;所谓交叉,系因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研究对象(客体)并非单一学科,而是个学科群。举凡中原历史、中原文化、中原人物、中原经济与社会、中原风俗与艺术等,均可纳入中原学学科范围,成为实现中原历史文化在当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视角。中原学研究内容的多元性,决定了研究方法选择的多学科性,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交叉学科研究法。但依据上述中原学研究内容,其学科分类基本上以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为主体学科,与新文科涵盖的学科领域基本一致,而且交叉学科研究法本质上就是突破或弱化学科界限,与新文科追求的目标和途径也是一致的。因此,中原学的研究方法,且称之为新文科研究法。

作者简介:尹全海,男,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中原学研究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 张新斌

一、中原学研究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 中原学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这个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研究河洛文化的时候,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河洛文化、河洛学是怎么回事儿,河洛文化研究一定要上升到河洛学吗?是上升还是平行的关系?我觉得好像两者有联系,但不是一个升级的关系,比如中原学和中原文化,这应是两个问题。

当然,我认为中原学的核心是中原文化,但是它有一个外延,中原学应该是河南地方之学。刚才李庚香研究员讲完之后,我就很高兴,他说了,中原学就是河南的社会科学,我说这个定位一下就对了,如果把中原学当作中原思想文化研究的话,它是另外一个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还应该继续研究,要把这个搞清楚。

(二) 中原学和哲学流派的关系

历史上所谓思想流派,它就叫关学、理学、洛学,所谓的关学、理学、洛学,首先要有代表人物,比如关学就是张载,洛学就是二程,理学就是朱熹,有代表人物,而且这种命名已经形成规范,你不能随便叫,我要是一个思想流派,我叫中原学,能这样吗?肯定不行,或者肯定不能够达到这个约定俗成的东西。

我们说思想史方面的哲学流派是固定的,比如我们说洛学,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研究二程思想的就是洛学,为什么?就是在洛阳这样一个地方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以二程为代表。所以我觉得在中原学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这把两者区别开。比如我们一开始提出来构建思想文化高地,主要是围绕几个阶段的变化,像经学、玄学、理学、史学等,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中原学?我觉得肯定不是,中原学比那个面要宽得多。但是,我觉得所谓的哲学思想流派,应该是刚才李庚香研究员说的根脉、经脉、基因,一定要把这几个东西区别出来。

(三) 中原学与洛阳学、炎黄学、黄河学的关系

我大概在2010年就写过关于黄河学的文章,2017年又参加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也写过炎黄学的东西,我们也召开过洛阳学研讨会,2016年发表过相关文章。这几个学,应该说我都介入了,这几个学的关系是一定要讲清楚的,一定要把它跟中原学的关系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当然,李庚香研究员有他的一套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大家可以讨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也都需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问题。

二、中原学研究的重点

我认为,第一,中原学一些研究,没有成为一个热门的东西;第二个,中原学的研究,还没有被学术界所认知。所以说,目前河南省涉及这几个重要的学,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理论体系研究、理论基础研究、理论体系构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工作,包括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框架、学科定位以及相关学科的关系。我认为中原学重大理论、规律体系的探索,包括在全球角度下对中原发展规律的认识,都需要进行研究、揭示。

三、中原学需要强化的着力点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下一步应该做的工作,《河南社会科学》中原学研究栏目一定要坚持办下来,因为总体来说中原学研究有这样一个栏目,会对高校老师有吸引力,如果有这个动力促进大家做研究也可以。《黄河科技学院学报》樊洛萍教授也在做这个中原学研究栏目,要把这个叫响,我感觉还没有叫响。包括全国性地方学研究联盟成立,把目前我们陆续发表的文章进行汇集,以及《中原学概论》编撰,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把中原学研究向前推动。

作者简介:张新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2021 年中原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王学宾

摘要:中原学从2016年提出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河南地方学研究的一门“显学”。2021年(第十届)河南社会科学年会分会之一——“现代化视域下中原学的研究趋向与未来发展”理论研讨会的召开,是全省研究中原学力量的第一次会师和集结,与会者从中原学理论建构的深化与发展、中原学与中原文化研究、中原视野下的黄河文化研究、中原学与国际传播四方面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原学研究进入了新的更高的层次。

关键词:中原学;中原文化;黄河文化

2021年10月19日,2021年(第十届)河南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分会之一——“现代化视域下中原学的研究趋向与未来发展”理论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召开。这次研讨会由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黄河科技学院中原学研究院承办,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庚香,郑州市政协原主席王璋研究员,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河南省社科联原副主席王喜成研究员以及省内主要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4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向东教授主持。

研讨会上,李庚香研究员做了《现代化视域下中原学的研究趋向与未来发展》的主旨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原学研究的相关议题各抒己见、探讨交流,展开了多元化、多视角的学术研讨。用李庚香研究员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全省研究中原学力量的第一次会师和集结,对于开启中原学研究新局面,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子”。

一、中原学理论建构的深化与发展

中原学从2016年提出,2018年在河南省内开始被学界普遍接受,2021年开始折枝成林、开枝散叶。中原学已经迅速成为河南地方学研究中的中坚力量,和炎黄学、黄河学、新宋学等成为河南地方学研究中的“显学”。

第一,中原学研究的现状。河南省社科联王喜成研究员从中原学的课程建设说起。他认为,《中原

学慕课》一书已经基本完稿,这是当前中原学研究的一个最新成果,但仍需进一步加工打磨。有了这么一个体系,又是作为“慕课”讲的,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不断补充、修改、发展、完善,这个路子很好。五六年来,中原学研究不但集结号已经吹响,而且果实已经开始收获,影响已经形成,可以说这是对河南社科界的一个填补空白的贡献。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中原学的研究也是一样,尤其是要成“学”,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河南省社科院张新斌研究员回顾了中原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原学从2016年提出到现在,省内外相关专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对于深化中原学研究很有意义。但就目前状态来说,中原学研究还没有被学术界充分认知。因此,中原学的理论体系研究、理论基础研究,如重要的概念、范畴、框架、学科定位、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中原学重大理论和规律体系探索,包括在全球视角下认识中原发展规律,都需要进行揭示。

信阳师范学院尹全海教授分析了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的状况。目前,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成果,已形成郑州大学的“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河南大学的“黄河文明学科群”、信阳师范学院的“炎黄学学科群”、安阳师范学院的“甲骨文信息处理学科群”四大学科群。它们均以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或以大河文明命名,或以历史人物命名,或以中原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命名,或直接以“中原历史文化”命名,彼

此之间没有科际标准;四大学科群以“学科群”命名,虽然反映了国家鼓励新兴交叉学科的趋势,但毕竟属于类概念,未能提炼出反映中原历史文化特色的概念,且呈现为各放异彩的分流局势,难以呈现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方向。

第二,如何推进中原学研究。王喜成研究员提出,中原学研究要与河南文化强省和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相联系,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相联系,突出反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要求。要坚持以中原地域、中原文化研究为己任、为重心,范围上以广义的中原为基础,以狭义的中原为核心,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限制得过死;内容上以河南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以传统思想文化为重点,着力聚焦党和政府关心的、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迫切需要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既要追溯学术之源,也要关注当前和未来的现实需要。既要按照历史、经济、文化、生态等学科去研究,也要实行跨学科研究;既要注重对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的研究,也要重视抬起头来看周围、看全国、看世界,树立全局思维、系统思维。要着力瞄准优势领域,多下苦功夫、大功夫,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从而奠定在全国的独特地位。要注重营造广泛和重大的社会影响,坚持每做一个课题,都要深耕细作,力争出新创新,不要浅尝辄止,如果是价值不大、水平不高的课题,宁可不做。

关于构建研究体系问题,王喜成认为中原学要想真正成为一门“学”,就必须构建起自己的学科体系、研究体系、支撑体系、地域体系,形成独特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推出一批研究大家,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推进。当前的中原学研究,离系统化、体系化差距还比较大,需要认真考虑。(一)对当前的研究思路,要进一步梳理、推敲,使之进一步条理化、学理化、规范化,向一个成熟的“学”去发展。如果形不成“学”的体系,走的不是“学”的理路,恐怕难以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同,今后要有大的发展就很困难。(二)对当前的研究结构,要进一步完善,使其更科学、更合理、更系统,使之逻辑严密,层次清晰。(三)要进一步总结界定出一个合理的中原学研究范畴,不要过小,也不要过大。要体现中原学的独特性、价值性、时代性等,不要硬贴,不要拼

凑,要切中肯綮。(四)要厘清中原学的“四梁八柱”到底是啥。厘清哪些是核心层,哪些是紧密层,哪些是外围层,哪些是相关层,厘清中原学与经学、子学、佛学、理学等的关系,不能把中原学完全等同于中原文化,得有一个科学的分野。这方面虽不好界定,但又必须想办法解决。为加快推进中原学研究,一是组织力量把中原学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去打造,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能成功将大大提升中原学在学界的凝聚力和在全国的影响力。二是考虑编辑出版“中原学丛书或论丛”,辑录近年来发表的成果,以推进中原学的研究。三是适时组织调研组到相关外省市调研,学习人家的成功经验。四是中原学今后的发展,应做到有计划体系化推进,有组织统筹化发展,立体化深度普及等,可考虑成立中原研究会或中原学智库联盟予以推进。

张新斌研究员认为,中原学研究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中原学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原学和中原文化是两个问题。中原学的核心是中原文化,但是它有一个外延,中原学是河南地方之学。(二)中原学和哲学流派。历史上的思想流派有代表人物,比如关学的张载、洛学的二程,这种命名已经形成规范。在中原学研究中,一定要把这两者区别开。(三)中原学与洛阳学、炎黄学、黄河学的关系。它们跟中原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需要认真研究。

郑州大学陈隆文教授认为,建构中原学的学科体系必须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尤其不可忽视。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区域,以历史区域分析方法比较历史时期中原及周边区域的历史价值,并进一步阐释中原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关怀,既是深化中原学研究所必需的手段,也符合中原学内在的理论要求。古代中原地位阐释与古代中原文化的研究是中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原学有关历史地位问题的研究中,区域历史地理学及其历史区域分析应是中原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方法。区域历史地理学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某一特定地区内的环境特征、区域差异、区域与区域的关系、人类活动干预对其发展的影响及其变化规律等问题的地理学分支学科。区域历史地理学以历史区域分析法为主要分析方法,其关注对象在于人地关系、区域分异和区际联系。它与区域地理学有类似的研究对象,即关注重点都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时段的前后差异,但二者又能够形成良好的时间延续和空间互补,共同构成地理学在不同时空内研究对象的重要内容。历史区域分析法引入古代中原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中原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学术探索。就中原地区而言,从新石器时代至金元以前,长期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央,这一核心区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重大作用,其核心地位与价值使这一区域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远远高于周边其他地区的。我们把中原学与地理学,特别是区域历史地理学相联系,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原学的学科体系,而且还可以深入阐释中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价值,这对于深化中原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尹全海教授认为,建设中的中原学应大致沿着如下若干方向推进学科化进程。第一,以中原为学科标识,突出地域性。学科标识或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研究对象的抽象化,如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以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等古代文献和遗存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等,均系研究对象的高度凝练。以黄河及其流域为研究对象及由此构建的黄河学,以炎黄二帝及广义炎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炎黄学,其学科标识在时空范围和学科影响力方面已超出中原历史文化的含义,甲骨文信息处理学科群并未涵盖中原历史文化的全部意义。第二,以中原的开放性为前提,避免地方化。中原学之“中原”,界定的是中原学的空间范围,从中原之中原,到中国之中原、世界之中原,是一个由内向外多层演进的“空间过程”,极具开放性。中原学之“中原历史”,界定的是中原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涵盖真实发生的历史和后人对其的认识成果。中原学之“中原文化”,界定的是中原学的价值追求及问题意识,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形态、中原文化的超时空影响及其所蕴含的国家使命和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三个层次,非孤立地研究中原文化。第三,以中原文化的本质特征为阐释对象。中原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中华姓氏之根,中华文明之源”,中原学的阐释对象包含两个阐释方向:一方面中原学是中华文化的地域性呈现,换言之,在中原区域呈现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与源,进一步抽象为中原学;另一

方面通过中原历史文化的学科化,使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成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优势资源,在此意义上,中原学的问题意识就是“再造中原”,从空间中原转换为时间中原。第四,以时间序列统括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已有成果。中国传统学术生成,一般是先有学术之实,后有学术之名,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等。目前学界已取得的学科化成果,即是中原学之实,中原学的建构就是以时间序列统括之。首先是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成果追寻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源头的炎黄学,其次是研究具有中华文明根与魂之称的黄河文明,再次是中原文化源头的河洛文化,然后才是具体而微的甲骨文信息处理问题。第五,依托高校学科建设进程,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纳入“新文科”建设,推动中原历史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需要首先完成《中原学通论》《中原学案》的撰写,配合已经出版的《中原文化通史》《中原文化大典》等,作为中原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中原学在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进程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当借助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建设成果及高校“新文科”建设大势,以中原为学科标识、以中原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为阐释对象,历经学问之学达于学科之学,推动中原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原之学、中国之中原学、世界之中国学。

二、中原学与中原文化研究

与会者认为,中原学研究中原的文化、文明,是研究中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原学作为一门地方性学科,具有地域的特征或者地域的形式,同时,又必须超越地域。它涵盖古今,对古代而言是激活文脉、学脉,努力实现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今天而言是高度重视中原发展特质的研究,进而举一反三,探索中国、中原发展的规律。既研究历史,又重视现实,使它超出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在古与今的结合点上,探求自己的生长点,是中原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郑州市政协原主席王璋研究员从易学的角度,对二程家风文化进行了分析解读。注重修身齐家、注重家教家风,是“二程理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二程是学易、用易、研易的大家,易学义理是贯穿二程理学的主线,特别是《程氏易传》在易学的传承发展

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二程家风文化是二程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易学中的主要齐家精髓,更有利于把握实质、加深感悟,产生更大的弘扬效果。(一)二程理学与易学的关系。程颐解《易》,重义理而轻象数,主张“因象以明理”,认为“事尽天理,便是易也”,将《周易》视为天下万理的总括。他通过注解《周易》构筑了理学思想体系,同时也用理学思想成功地完成了对《周易》的解读。《程氏易传》是易学史上继王弼《周易注》之后的又一部义理派名著,对后世影响巨大。易文化与程氏理学,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易文化是程氏理学的源头活水,程氏理学又丰富了易学内涵;二者为纲与目的关系,易文化是总纲绳,程氏理学是纲绳下结出的目;二者为体与用的关系,易文化是程氏理学的本体,程氏理学是易文化的具体应用和发扬光大,《周易》与《程氏易传》之间是经与传的关系,做好易文化传承,既要坚守经之要义,又要通过“传”之转化发扬光大;二者是守与化的关系,通过对以易文化为源头活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树立起强烈的文化自信,进而通过学习感悟在传承中与时俱进进行转化,形成具有独到见解、有力推动易文化精髓弘扬的“传”。(二)二程家风文化是二程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二程家风文化必须寻根溯源,学习易学中的主要齐家精髓。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明白要到哪里去,进而更好地把握要义、加深理解、继承发扬。二程家风文化主要体现在家国情怀、立德为要、书香常绕、尊老爱幼、谦卑待人、尽责有序诸方面。这些方面均可在易学中寻得源头活水:八卦大家庭道出了齐家与治国的关系,纳甲学问道出了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责任,五行生克装六亲道出了家风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蒙卦道出了启蒙教育与书香常绕的重要性,谦卦道出了正确的学习态度,咸、恒、家人三卦道出了不同阶段家风建设的重点。

河南省委党校田宪臣教授认为,中原学应当发挥作用,通过繁荣中原文化,助力河南乡村文化振兴。河南省委工作会议提出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略”。“十大战略”中的第七个,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是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弘扬、传承、发展、繁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移风易俗、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乡

村社会文明程度,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一是进一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河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传统乡村文化资源,这些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古色”文化将礼仪习俗、民俗风情、内在精神、地域特点进行了很好的诠释。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原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时代内涵,以实现“古村新貌、古训新德、古贤新秀、古艺新传、古业新途”,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大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河南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南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河南本土特色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总和,数量多、分布广、影响大。“二七”大罢工把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高潮,确山竹沟“小延安”影响深远,鄂豫皖苏区开辟了坚实的革命基地,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以及南水北调精神为打造“精神道德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河南注重对红色资源的挖掘,但总体上讲对红色文化的挖掘、弘扬深度不够,还未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河南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使红色资源在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聚同心上发挥积极作用。

河南省社科院李龙副研究员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对中原学的夏文化研究进行了思考。夏文化是中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对夏文化考古与推动中原学研究有颇多的启示。(一)学术研讨要有新目标。建议由河南省委、省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讨会,共同推进中原学之夏文化相关研究工作。(二)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面对新的与中原地区有关的考古文化现象,有关部门应该及时跟进举行新闻发布会,学术界要根据考古发现材料讲清史实。(三)夏文化研究要有新进展。河南要加大考古发掘力度,从点到面,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寻找新的夏文化遗址。(四)科研整合要有大力度。要整合科研队伍,培养夏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

三、中原视野下的黄河文化研究

中原学是以中原地区文化发展及现实发展需要

为导向的学科。中原学学科建设重在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与黄河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地域耦合性,中原学的文化研究指向与黄河文化的耦合性,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的路径耦合性。在中原学视域之下,如何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黄河文化基因、弘扬黄河文化精神、讲好黄河故事,成为中原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指向。

河南大学王明钦教授对中原学视域下推进黄河文化研究的宏观路径进行了思考。他提出具体路径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双轮驱动、三个工程。(一)一条主线即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这是中原学学科建设和黄河文化研究在民族、国家层面的终极意义。(二)双轮驱动即一方面立足于中原学学科推进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面立足于黄河文化研究提振民族精神,推进二者的相融互惠。(三)三个工程即“中原学派”学术共同体培育工程、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科平台创建工程、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体制机制建设工程。在“中原学派”学术共同体培育工程方面,倡议成立“中原学派”,形成学术风格;在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科平台创建工程方面,要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立体化宣传平台、多层次交流平台,还要搭建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平台;对于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体制机制建设工程,一方面争取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积极运用社会力量,发挥社团作用,增进国内外交流,从而推动中原学学科的发展,推进黄河文化研究的深入。

郑州大学王星光教授作为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黄河文化专题(卷)的主编,谈了“讲好黄河故事”“弘扬黄河文化”的认识。(一)黄河文化专题(卷)是弘扬传播黄河文化的知识宝库,重要价值不言而喻。黄河文化专题(卷)拟分为综论总述、地理与生态环境、黄河水利、政治军事、学术思想、考古文物、经济发展、文学艺术、科教体卫、民俗生活、旅游名胜、域外交流等12个分支,主要条目为2500~3000条,计200万~300万字,图片约3000幅,视频约300个,力图让读者全方位、多视角详细了解黄河文化全貌。(二)黄河文化专题(卷)应展示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在黄河文化专题(卷)中的考古文物分支,设有黄河流域古遗址与古文化、黄河流域古墓

葬,旧石器时代的白石崖遗址、大地湾旧石器时代遗址、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新石器时代的南庄头遗址、唐户遗址、泉护村遗址、庙底沟遗址、瓦店遗址、晋陕高原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在总论综述分支设有中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伏羲文化、黄帝文化、大禹文化、三代文明、黄河流域根祖文化等,展示中华文化的根和魂。(三)黄河文化专题(卷)应突出黄河水利特色。以黄河治理为中心的黄河水利是黄河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水利分支设有古代黄河水旱灾害、古代水患治理、近代治河、现代治河及防汛、现代工程管理、黄灌区、黄河桥梁、治黄人物、黄河治理文献、黄河碑刻、黄河图等类目,如在黄河图类设有古代黄河图、全河图、河源图、东河图、南河图、河工图、河患图等词条,确实为黄河水利的书写添色不少。(四)黄河文化专题(卷)应体现黄河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不仅是奔流在神州大地上的母亲河,而且升华为一种精神象征。在总论综述分支设有黄河精神、大禹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等词条,正是对黄河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彰显。(五)黄河文化专题(卷)应反映黄河流域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民族风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黄河文化专题(卷)中的地理与生态环境分支,不但设有黄河流域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资源等类别,还专门设计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类目,其中有黄河生态功能分区、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区、黄河国家湿地公园、黄河国家地质公园、沙漠公园、黄河国家公园等条目。在民族生活分支,设有岁时节日、婚俗、生育风俗、丧葬风俗、信仰祭祀等类别,以展示黄河流域十多个主要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六)黄河文化专题(卷)应具有时代风貌。在经济发展分支设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亚欧第二大桥、郑欧班列、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显示了黄河文化专题(卷)的时代特色。(七)黄河文化专题(卷)具有国际视野。黄河文

化专题(卷)专门设立有域外交流分支,包括政治、经济、技术、宗教的对外传播交流等内容,并设有“域外黄河研究”这个词条,凸显黄河文化的开放、包容和传播交流特征。

河南大学田志光教授从三个方面谈了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共性关系。(一)黄河文化的概念。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是多民族人民和自然相互作用创造出的灿烂文化,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所在地的地域文化。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后孕育了诸子百家学、两汉经学、玄学、佛学、宋明理学等,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比方说甘肃河湟文化、山西三晋文化、陕西关中文化、河南河洛文化、山东齐鲁文化等各具特色的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和魂。黄河文化作为国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主体性、连续性、包容性、和谐性的特征。(二)黄河文化的定位。从根上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作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帝的历史活动舞台是在黄河流域,在夏代之前的万邦时代,颡顼、尧舜禹的邦国联盟,也形成于黄河流域。夏、商、西周三代乃至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国都大多数建于黄河流域。所以,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象征。从魂上讲,黄河文化包括这样几种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注重生态保护、天人和谐精神,自西周以来敬德保民的人文精神,汉唐以后儒释道兼容、中外文化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体现出为知识分子和天下贤能之士提供上升通道的公平竞争精神,以及超越时空的仁义礼智信、大同和合的道德精神,五千多年文明连续不绝、与时俱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国文化精神。黄河文化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和历史渊源。(三)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称,以河南为核心,以广大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逐层向外辐射,影响延及海外。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黄河文化之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根源性。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产生了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第二,原创性。中原文化

在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无论是元典思想、政治制度构建,还是商业文明的开始,乃至重大科技文明和中医药的产生,都有中原文明的烙印。第三,包容性。比如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乐、胡人食品有很多融入中原文化之中。第四,开放性。中原文化有很强的辐射力影响力,辐射各地,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来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秦汉以来,中原文化主要通过陆路交通向东西方广泛传播,影响了朝鲜、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所以说,黄河文化和中原文化关联性非常强,关系非常密切。

四、中原学与国际传播

与会者讨论了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实现中原学全球传播的问题。新形势下加强国际传播工作、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工作议程,受到高度重视。中原学的研究也应该注重国际传播,不仅要面向河南、面向全国,还要面向世界,不仅要回溯历史、回顾以往,还要面向未来、面向人类的整体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思想资源。

黄河科技学院于向东教授认为,在实现河南更加出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原学研究必须努力为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一)中原学讲好中原和河南出彩故事,可以为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做出贡献。中原学作为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原学的研究,建构中原学研究新范式、新路径,有助于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有助于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有助于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使世界更好地认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强大中国。河南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长期居于重要地位,有着重大影响。“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说法,体现了中原祖辈先贤和父老儿女的巨大贡献与高度自信。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包括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和现今的中国,认识发达的中国和发展中的中国,这些都需要了解河南、认识河南,需要讲好中原和河南出彩的故事。(二)中原学的丰富内涵曾在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可以为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做出贡献。主要孕育产生于河南的洛学可以

说是历史上的中原学,中原理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理学曾在汉文化圈的周边国家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传播,形成学派、学说,产生深远影响。越南民族文化的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于18世纪的越南著名历史文化名人黎贵惇是越南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离不开对中国学术的吸收转化。他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接受去探索“象形”,考究“三才”,以求格物致知,体会道和仁,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建构起他的宇宙观、理气观。黎贵惇写作《芸台类语》时说,此书“于以考镜三才,酬酢百变”,或多少会有所帮助,但“至于致广大,尽精微,以造致格物之域,则有濂、洛、关、闽之书在,愚鄙下学,何敢叠床架屋于其间”,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的钦佩和崇敬。黎贵惇较多地接受了中国儒学家的思想观点,如二程、朱熹等人的著述还有明代薛瑄对他的学术影响很大。清朝粤西提督学政朱佩莲曾称黎贵惇为“南藩理学第一人”。至今越南学者研究越南儒学,首先还要讲述中国儒学,讲述二程学说。(三)中原学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谈及历史和文化,习近平2013年就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四个讲清楚”,既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原学探索传承中原历史文化新路径、实现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指明了方向。中原学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我们去深入发掘阐释。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又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结合”的要求,更好地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好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原学研究融贯古今,会通中外,立

足中原和河南,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可以为我国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贡献智慧。

郑州师范学院杜学霞教授认为,中原文化在北宋到达顶峰后,并没有衰落,而是辐射力大大加强,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宋时期,中原文化定型,中国文化基本上定型,中国文化中的典章制度、礼仪信仰、生产水平、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包括审美情趣、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等,都是在北宋开始定型的。如果这样推的话,对内而言,中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文化,这是维护大一统江山的文化向心力;对外而言,北宋以后中原文化辐射力大大加强,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程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力,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或者大大被低估了。四大发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辐射传播,传播时间大致是十三、十四世纪,也就是南宋和元朝时期。(一)造纸术是掀起人类文字载体的革命。(二)雕版印刷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在西方,其替宗教改革开路,使广大民众教育成为可能,而民众教育的兴起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三)指南针传播到欧洲,促进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促进国际贸易进一步展开,促进当时最早全球化观念形成。(四)火药的发明,改变了生产方式,帮助欧洲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的堡垒,促进了近现代国家的形成。由此可见,四大发明都在中原,在北宋以后辐射力、影响力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提升,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我们现在的国际话语权跟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相称,需要大大提高,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也应该建立中原文化自己的国际传播体系,非常必要,非常迫切。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原学是一门融贯古今、汇通中外的学问,立足河南、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学问,需要我们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历史是基础,文化是血脉,期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中原学能够深植中原大地,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新出彩。

作者简介:王学宾(1963—),男,河南汝州人,主任编辑,黄河科技学院中原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12期)

中原学与河洛学

◇ 李庚香

摘要: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新时代,要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思想体系来对待,才能更好地认识河洛文化。从区域范围与研究内容上来讲,河洛学是中原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是中原学桂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打造河洛学,研究解读好河洛文化,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关键词: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河洛学;中原学

在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中,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 3000 多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高峰、文化高地、文化高原。过去素有“逐鹿中原”“鼎立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但我们讲不清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上升到中原学的高度。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炎黄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在中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地位重要而特殊,对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贡献非同一般。在河南,我们都知道“河图洛书”的神秘和神圣,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大家视之为天书,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新时代,我们只有把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站在人类文明、中西文化比较、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用哲学的视野、文明的视野、学科的视野来认识河洛文化、嵩山文明,以中原学、河洛学的相互碰撞、交流和交融,为洛阳“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头活水”,才能找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和钥匙。

一、河洛文化与河洛学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把黄河文化的战略定位提升到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的空前高度,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他特别讲到了黄河四大文化即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用“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十分传神地表达了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指出,要了解中华文化,要到河南,要到洛阳。我们知道,河洛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具有发源、核心、根本的地位和价值。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河洛文化首先是地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流域文化相得益彰,是该地区古往今来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以汉魏唐宋为内容,以洛学为高峰,以古都洛阳所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以“河洛郎”为特征,是海内外华人的民族血脉和精神纽带,

荟萃了嵩山文明的精华,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源头性、根脉性和族魂性特质。

经过30多年的研究,关于河洛文化的成果汗牛充栋,关于洛阳学、龙门学、洛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化。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河洛学”这个概念呢?从横向上来讲,西藏有“藏学”,安徽有“徽学”,湖南有“湘学”,都能自成体系,并代表各自的地域文化。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甘肃,即使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学术名称,但仍有一个贯穿古今的当代显学“敦煌学”。河南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我们都知道有河洛文化,却不知有河洛学,这是河南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社科界的一个遗憾。“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是新时代洛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新时代,如何提升河洛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如何打造“行走洛阳,读懂历史”品牌?这就要求我们用学术讲政治,用学术的方式去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建设河洛学。在话语体系中,相比较主流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学术话语是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现在,我们有河洛文化、洛学、龙门学、洛阳学等学术概念,我们要形成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需要打造河洛学,使我们不仅从“器”的层面,而且能够从“道”的层面来认识河洛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推动河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转识成智”。对于河洛文化研究来说,只有上升到河洛学的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思想体系来对待,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河洛文化和嵩山文明,才能够具有全国大格局、全球大视野、时代新表达。

第一,要把河洛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轴、主干地位讲清楚。什么是主轴地位?如果从唐、宋之间断开,传统中国其实经历了一个由“东西轴”向“南北轴”的明显转型。河洛地区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作用,一是体现在《诗经·大雅》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二是体现在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黄河文明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形成期是炎黄阶段,发展期是夏商周时代,兴盛期是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在这个过程中,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是文明轴心区。以洛阳为中心,西边是长安,东边是开封,在东西轴里,洛阳是个主轴。这个主轴后来又变成了南北主轴,杭州、南京、北京,洛阳还是一个主轴。如何把这个文化主轴定位清

晰,对于我们认识“天地之中”的枢纽定位十分关键。

第二,要把河洛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体系讲清楚。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河图洛书。河洛文化最早的标志是“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滥觞。古代传说中华龙祖伏羲时代,黄河中跃出龙马,背负“河图”,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大禹时代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大禹受之而创立包含“五行”思想的“洪范九畴”。可以说,由“河图”发展出阴阳八卦,由“洛书”发展出“五行”,都孕育产生于河洛地区。河图洛书具有自否定、反身性和人文性的特征,“生”是其本质特征。我们对河图洛书、八卦、六十四卦的演变说不清楚,对源于它的“九五之尊”“大丈夫能屈能伸”“女大十八变”却经常是日用而不觉。《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从河图洛书到八卦到六十四卦,清晰地揭示出文明曙光乍现、人类精神世界生成的文明图景。(2)赫赫夏都。《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其实,不仅是夏商周三代定都河洛,后世很多王朝都在这里定都。河洛地区最早跨入文明时代。中国古代是从黄帝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期。中国古代是从夏王朝的建立而正式进入文明社会的。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夏文化的形成是十分关键的,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就在这里。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二里头位于伊、洛河之间的一个高地上,就是文献中的“夏墟”所在地,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东征伐纣,“息偃戎师”,这个地方在华夏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具有“辐辏之势”,是中华文明形成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夏上承三皇五帝时代,下启商周至明清之初,连接着中华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是我国步入文明门槛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最早开启了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历史演进过程。从禅让制到分封制,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都与黄河文明中的制度治理密切相关。二里头夏朝遗址,对于我们领悟和感知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十分重要。对夏文化的研究,将开启国家文明研究新局面。(3)河洛文化。儒家文化、道家学说、佛家学说首先创立或传播于河洛

地区。特别是“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礼乐文化是我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制度规定,是上层建筑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成分,一直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习俗。(4)洛学。北宋时期二程创立的“洛学”,被朱熹等人继承和发展,称“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对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哲学范畴进行了系统探索。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二程把“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洛学凝聚河洛文化之精华,是河洛文化的结晶和典型代表,并构成了河洛文化的核心内涵。(5)洛阳学。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续发展提供学理支持与政策指导。洛阳学不仅涵盖洛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而且涉及洛阳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个融贯古今、展望未来、多学科交叉、整体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等特征。(6)嵩山文明。河洛文化是在嵩山脚下、黄河之滨诞生的。五岳之中嵩山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位置,与河洛文化从凝聚到辐射的生成与传播过程是分不开的。从河图洛书到赫赫夏都、河洛文化特别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再到洛学、洛阳学、龙门学、嵩山文明,我们要把这个脉络、体系梳理清楚。

第三,要把“河洛郎”“客家人”的概念讲清楚。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位置,又率先进入文明的门槛,是十三朝古都,它是一个文明的辐射源。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影响力源泉在哪?“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河洛郎”这个概念体现得很清楚。“河洛郎”为中原南迁后裔,是中国南方讲闽南语的群体,也是“台湾四大族群”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中原文化随之南迁,在与边陲文化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中,形成了闽南文化。中原移民南迁入闽对于巩固和发展边陲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中原和闽南建立起深厚

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纽带,也赋予了闽南文化深刻的河洛印记。这种强烈的文化记忆,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真实体现。“客家人”最大的特点是“客家非客”。由河洛地区传至中国南方地区的“客家文化”,使中国北方与南方融为一体。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依然认为自己是河洛郎,河洛地区是他们心中难以忘怀的故土家园。河洛地区建立了最早的中国,建构了最早的国家模式,形成了最早的国家文明、中华文化,并经过数次民族大迁徙,以晕轮效应逐步扩散到四周。“河洛郎”“客家人”就是河洛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的魅力展现。这种心念故土、情系桑梓的浓厚深情,正是河洛文化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特性的显性表达。可以说,河洛文化对于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齐鲁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原学与河洛学

什么是中原学?对社科界来说,中原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对高校来说,中原学是新文科;对河南省来说,中原学是地方学。中原学实际上是五方之学。在时间轴上,一是研究炎黄学,二是研究殷商学,三是研究新宋学,四是研究冯友兰新理学;在空间轴上,一是研究河洛学,二是研究新时代黄河学。

河洛学和中原学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说黄河学着眼的是流域,中原学着眼的是地域,那么河洛学既着眼于流域,又着眼于地域。河洛学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是中原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原学桂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从区域范围与研究内容上来讲,河洛学与中原学、新时代黄河学是局部与全部、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河洛学是新时代黄河学的一部分,也是中原学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分。“若问古今兴衰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历史上的洛阳绝大部分时间是中国历史的核心与缩影,洛阳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曾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原历史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文明核心、政治核心、经济核心、思想文化核心而傲立于世。历史上,理学、心学、洛学、儒学、道学、佛学等诸多流派的产生、发展与演进皆与河洛之地有着深厚的渊源。各家并立,共生共存;百家争鸣,自由辩论;相互吸收,融合发展。洛阳记录

和见证了各流派发展演变的历程与成就。

河洛学对中原学建设的贡献、对中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五个大的范畴。第一是“中”。“中”在甲骨文里是一个旗帜插在高地上。河南古称豫州,地处九州之中,故曰中州。中州也叫中土、中原,先秦时期有时干脆就叫“中国”。《诗》赞郑国的子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说:“为之中者归之也。”这个“中”从来都是“逐鹿”“鼎立”的要害所在。“尚中”观念从萌芽到成熟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至西周初年,其内涵已经十分清晰,其标志性的里程碑是周公营洛。“尚中”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深刻反映了中华先人对自己所处特定场域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记载在《尚书·大禹谟》中的这四个四言短句被称为帝王治国理政的“十六字箴言”。这十六个字由帝舜在命令大禹继承他的帝位时作为对大禹的指导 and 告诫之言当面口授。大禹又由箕子传给周武王,实际上是由上古帝王一代代传下来的统治心法。“执中”是河洛文化为中华民族贡献的最大哲学智慧。“中”慢慢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价值取向即“中和”“中庸”。所以中华民族不偏激,不走极端。今天,“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中原崛起”。背景是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在中部六省里,哪个省能代表中原呢?只有河南能够代表中原,其他几个省都是局部地区属于中原,只有河南全部都在中原,而且处于核心部位。二是“枢纽”,连南贯北,承东启西。从中原到中部,到黄河,到中华,到中国,这是一个地理空间。地域、区域、流域、文化圈、国家,是一个逐步辐射、放大、传播的过程。第二是“新”。创新是河洛文化的密码。历史上的洛阳曾经是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河洛大地,是文明的摇篮、理学的源头。其中,“通”和“变”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范畴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概念。今天,坚持固本求新、守正创新的实践,我们必须完善机制,加强人才和资金的支持。河洛文化中的诸多文化元素,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道德、法律、逻辑,还是各种官方或民间的制度构建、传统习俗等,都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这为我们今天“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施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等,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第三是“兴”。“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起也,第二个意思是同也。河洛文化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什么呢?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国语·周语》和《史记·周本纪》都曾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周亡。”意思是说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而灭亡,商朝因黄河枯竭而灭亡,西周因泾水、渭水、洛水枯竭而灭亡,平王东迁。伊水、洛水、泾水、渭水都是黄河的重要支流,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为干流的黄河必将枯竭。黄河枯竭,国家就会走向灭亡。我们现在讲“黄河宁,天下平”。从新中国到新时代,我们的黄河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蕴藏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第四是“理”。二程创造的理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大规则、大规律、大准则。“理”,就是价值观,就是价值体系。《左传》说:“德,国之基也。”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很多人认死“理”。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把“理”这个价值观、这个价值体系看得很高。“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支撑了我们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第五是“和”。和谐是河洛文化的主题词。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洛阳是和谐思想的发源地。和平和睦和谐是河洛文化的文化基因,也是其最大特质。

三、在中原学视界中研究河洛学的新时代意义

中原学在时间轴上要研究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冯友兰新理学。在空间轴上,要研究河洛学、新时代黄河学。洛学既需要在河洛学中讲,也需要在新宋学中讲。河洛学与新时代黄河学也有交集,是新时代黄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洛学研究的新时代意义,至少有这么几点。

第一,河洛学的提出,对于解释人类文明的“多元一体”问题意义重大。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已经被尘封,湮没在历史中,只有源于河洛地区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历经五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始终显示着历久弥坚、风雨如磐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最大特征就是生生不息的“生”。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多元一体”,人类

文明的起源也是“多元一体”。我们把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透了,对于解决人类文明的一元性问题,对于解决“多元一体”问题、对于解决“理一分殊”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有助于河南树立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形象。在文明源流的探求上,我们有“满天星斗”说。上古文明在良渚文明中有体现,在三星堆文明中有体现,在红山文化中也有体现。这些地方文化是否属于同一个篇章?它们之间有什么前后渊源?我们还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干来认识,确立“摇篮”说,确立“一体多元”说,确立“重瓣花朵”说,确立“主体主干”说,确立“正统正宗”说。我们不仅要“寻根探源”,更要“正本清源”“固本求源”。无论是五大都城遗址、龙门石窟、丝绸之路的研究等,都要体现出这一特点。

第三,有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研究生态、人水关系、城市和产业、文化等战略问题。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对仰韶文化、黄帝文化和夏文化研究的深入,河洛学所要书写的,就是一部从黄河出发的全球文明史。

第四,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重大价值。河洛学研究,是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核心层文化。站位新时代,研究好、解读好河洛文化,建设好、发展好河洛学,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河洛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摇篮,是重瓣花朵的“花心”,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的灵魂栖息地。河洛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灵魂所系,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记忆,也是维系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最强大的精神纽带。在我们看来,北宋洛学正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河洛价值观进行了重新融合。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以河洛文化为主体脉络的华夏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正是因为河洛文化是一个开放创新的体系,它以礼乐为主体,融合三

教,不断成熟;从周公制礼作乐始创儒学到东汉经学再到二程洛学,从老子创立道家到道教的形成,从佛教首传中原到龙门石窟的开凿,它们的每一次自我更新莫不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

第五,有助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并进的现代化。河洛学的提出,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一个巨大的文化场域。从周代的礼乐文化到后世的礼法文化,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到科举制,特别是二程的理学,都为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和镜鉴。从筮术到术数到辩证逻辑,中华民族传统思想领域最后以儒释道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系统。如果说道家是“想得开”,那么儒家就是“拿得起”,释家则是“放得下”。三者或治世或治身或治心,形成了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自如的从容世界。二程洛学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进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特别是理学的“理得”和心学的“心安”,都让我们找到了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让中华民族找到了精神上的栖息地。

过去我们对河南的定位一直是“老家河南”。党的十八大之后,关于河南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河南时说,要“让中原更加出彩”;2019年调研河南时说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一个“更加出彩”,一个“奋勇争先”,一个“绚丽篇章”,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出彩河南”阶段。从“老家河南”经过“中原崛起”再到“出彩河南”,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复兴都是绕不开的。我们坚信,在中原学的视野中,建设河洛学、打造河洛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使命,也必将引领我们迎来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光”时刻。

作者简介:李庚香(1966—),男,河南淮阳人,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文艺学硕士,法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主要从事领导力、现代化、当代的精神处境研究。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

构建中原经济学,奏响“新中原中心论” 时代最强音

◇李庚香

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赶考之路上,中部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河南在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奋勇争先、更加出彩,需要亿万中原儿女用一个又一个出彩绘就浓墨重彩,需要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有更大的担当、更大的作为、更大的贡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河南省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后,面对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未来百年,我们前瞻30年,提出河南需要打造中原经济学。

一、全面把握中原经济学提出的新时代背景

中原经济学的提出,不仅有其内在的学理基础,更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应新时代需求而生,是对新时代新要求的积极回应。构建中原经济学,首先要从中原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全面把握其产生的时代大势、社会大局和实践基础。

(一)站位全国,“新中原中心论”呼之欲出

新时代,河南的发展要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定位,要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定位,要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来定位。

202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标志着我国实现了东西南北中无死角的重大战略全覆盖,北有京津冀、雄安新区、东北振兴,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东有长三角一体化,西有成渝城市群,中有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由此,区域协调联动效应、整体效应越来越凸显。河南作为中部地区第一人口大省,作为中部的腹心,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一是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中,河南“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能够实现内循环,并有助于外循环。由于河南的经济是内需主导的经济,所以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二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出后,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有望成为中国的第五个增长极,从而为河南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新时代黄河文明轴心带的形成,为我们研究大河文明与中国之治提供了巨大空间。

三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河南是中国大国农耕的“战略后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河南的乡村振兴必将走在全国前列。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中部地区、中原地区的最大时代机遇。当前,河南要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机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历史机遇以及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中,中原中心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提出“新中原中心论”恰逢其时。

(二)着眼未来,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宏伟蓝图已经擘画

如果说“老家河南”揭示了河南的文明化进程,文史哲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出彩河南”则体现了

河南的现代化进程,中原经济学、中原政治学、中原法学、中原生态学、中原商学将发挥重要作用。河南省十一次党代会以前瞻30年的战略眼光对现代化河南建设进行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确立了“两个确保”的奋斗目标,提出全面实施“十大战略”,明确了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大战略,提出了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从而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河南”和“怎样建设现代化河南”的问题,充分彰显了河南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省之要者”的使命担当,绘就了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的宏伟蓝图,揭开了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崭新篇章,奏响了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时代最强音。

(三)立足河南省情,中原经济学必须解决河南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今日的河南,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与发达省份相比,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比较大,产业结构偏重偏粗偏低,供需匹配度不高,比如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中心城市带动引领作用不明显,商丘、周口、驻马店等传统农区发展相对滞后。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农业大而不强,工业全而不优,服务业不大不强不优,尤其是创新能力不强。在中部六省中,河南的创新体系是比较薄弱的。如与安徽相比,2019年安徽3万亿元GDP中就有1万亿元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的,新经济、新业态、新基建等经济总量占比1/3;河南现在的经济总量是5万亿元,但新经济总量占比还不足1/4,差距很大。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协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资源能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治理、发展和安全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比较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提升,一些干部观念视野、专业能力跟不上新形势新要求。这四大问题,是中原学必须破解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探索大省新路,通过转型发展,通过跨越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中部地区崛起的新路。

总体来讲,“新中原中心论”呼唤立足中原、着眼全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原经济学;锚定“两个

确保”,实施“十大战略”,需要通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的中原经济学;补足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不适应问题,急需立足河南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的中原经济学。

二、深刻理解中原经济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

(一)中原经济学的概念

中原经济学概念是建立在中原和经济学概念基础上的,只有在对中原和经济学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才能对中原经济学的概念和内涵有一个较为清晰、明确的界定。

我们认为,在当下语境中,对中原的理解和认识是有弹性的,应当兼顾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地域指向与文化因素,不能过于宽泛或狭窄。在此意义上,作为一个区域概念,中原是指以河南省为主体和中心,包括与河南毗邻的晋东南、鲁西南、冀南、皖北的区域。若从区域经济的意义上理解,中原大体上等同于中原经济区的范围,即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包括了中古以来历史上中原地区观念中的其他部分,共涵盖5省30个地级市及3个市辖区、县。为什么我们要用“中原”而不用“河南”这个概念呢?因为河南仅仅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而“中原”不仅是一个地域、区域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文明概念。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学科。简言之,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

基于上述理解和界定,我们认为,所谓中原经济学,是以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为时代背景,遵循和体现经济学一般规律和方法,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原传统经济思想为逻辑起点,以中原区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传承和弘扬中原经济思想优秀传统文化,指导、服务和推动中原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它综合运用当代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中原传统经济思想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新成果,为思考 and 解决中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提供先进的理念引领、深厚的学理支撑和最优的解决方案。

在上述意义上,中原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学科

视野下对中原传统经济思想创新转化和对中原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的探究。虽然历史上中原经济学有着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理论雏形,但是并未出现以“中原经济学”为概念的科学理论体系。如果说,中原传统经济思想是完全没有现代学科划分状态下的综合性学术研究,那么中原经济学则是在明确的现代学科意识基础上的综合性应用研究。它强调现代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强调汲取和依托从中原传统经济思想在新时代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而来的最新成果,强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致力于构建解决中原区域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区域特色学科。我们要研究的是3.0版,把经济与生态、文化、数字化一体进行研究。

(二)中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中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关注,并在河南最先提出“新常态”这一论断。他提出的“四张牌”“四着力”“三起来”“三结合”“三个转变”“两个更好”等观点对于河南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是中原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原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原、中国而且对世界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其一,中原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其二,中原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派提供思想引领;其三,中原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中国式管理提供哲学基础。老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更是讲了许多经济学的原理。从历史渊源看,中原经济学发端于中原传统经济思想。中原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渊源既包括夏商周时期的《易》,也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管子、计然、白圭(《汉书》中称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以及唐代的刘晏,清代的康百万等代表性思想家、经济改革家、商业活动家们的思想。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二八定律”,二和八在《易经》八卦中,都属于八卦中的坤卦。因此,所谓的二八定律,和《易经》中坤卦的哲学思维有着同根同源的思想理论。我们平常重视的“变易”“不易”“简易”中蕴含着“交易”和“生意”。比如,“均衡”这一经济学核心理

念,就与《易经》中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异曲同工。西方重平等,中国既重平等也重“平衡”。比如,在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思想,对于当下的治道变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角度来考察,“商圣”范蠡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农末兼营观点、经济循环学说、贸易思想和价格理论四个方面,他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富而好行其德”,以及“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等经营理念,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外,理学繁荣的宋明时期非常重视义利之辩。“二程”等理学家主流思想认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语录》),认为道义和功利是相斥的。这其实与市场经济讲求经济与伦理的统一是不一致的,没有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康百万家族信奉的“留余”文化倡导平衡共赢、因时而变、兼济天下、让利于民,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髓,也是优秀传统经济思想“谦”的体现。中原传统经济思想研究,是综合运用当代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经济学思想及其方法为主、以中原历史文化和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思想研究。比如,对管子、计然、范蠡、白圭、刘晏、康百万等源于中原大地的经济、商业领域代表性人物、学派、典籍及其思想的研究,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如何用时代精神进一步激活,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是中原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河南是中原地区的核心承载地。其大省新路之所以被人关注,是因为它的追赶式发展必须与创新相结合,必须实现转型发展,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河南紧紧抓住新型城镇化和枢纽经济这两大优势,郑州商贸城的发展世人瞩目。中原经济学,就是要解决新时代河南经济社会生态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原经济学就是研究河南的现代化进程的,就是要研究河南的高质量发展的,就是要研究“创新起,中原兴”。如果说广东经济的特质是“开放”,浙江经济的特征是“民营”,那么河南经济的特点就是“转型”。河南经济是一种追赶型经济,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行结构转型。主要应该聚焦四个问题:一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如何成为中高端、关键环?二是中部

地区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黄河流域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四是在乡村振兴上如何走在全国的前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当代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以经济学领域及其方法为主,以中原区域经济发展实践涉及的经济理论、经济问题、经济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原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比如,“创新起,中原兴”的研究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比如,中原区域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资源和要素空间配置;中原区域经济发展要处理的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均衡与非均衡、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关系,县域治理“三起来”等问题,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着力研究。

三、擘画中原经济学未来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过去100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构建立足河南实践、有效服务河南经济发展的中原经济学是河南经济学学科发展和河南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诉求。中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打造新时代中原经济学专家学者群

我们常讲,河南是社科大省,不是社科强省。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省高等院校、省市社科院、党校系统等专门从事社科研究的人员达4.5万人,社科工作者众多,社科专家众多,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名家、大家较少。相比我省的文学创作、作家群体在全国的影响力,社科理论研究领域逊色不少。“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大力实施河南社科名家推介工程,积极打造有影响的中原人文学者群、中原法学家群、中原经济学家群、中原思想家群,推出“中原百家”,不断提升河南在全国社科界的影响力。打造中原经济学专家学者群,我省有着良好的基础。

一是拥有扎实的经济学人才储备和基础。河南专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基础研究的学者众多,他们立场坚定、功底扎实、学风优良,积极开展经济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特别是河南高校的经管学院,拥有一大批专门经济学人才。从社科联工作层面看,在年度调研课题申报、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优秀青年社科专家评选等工作中经济学专业都占了最大的比重。

二是拥有一批高素质的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如杨承训、耿明斋、孙新雷、张占仓、谷建全、焦国栋、喻新安、王永苏、程传兴等,他们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经济学理论知识,目前,虽然他们大多还没有在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为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原经济区的概念就是我省的经济学家在省社科联组织的省领导与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提出的,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在上述基础上,发挥“集团军”的整体协同作战能力,形成“五指握拳”、集中发力、团队作战的效应,打造新时代中原经济学家群,正当其时。与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相呼应,与中原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相一致,要通过开展中原经济学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学综合性应用研究,凝聚不同学术视野、不同专业见解的科研人员集体攻关,深挖特色优势研究领域,培养一批致力于中原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原经济学研究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研究团队,逐步打造新时代中原经济学家群,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创新和学科构建。

(二)积极构建新时代中原经济学理论体系,努力推出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力作

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有14个门类,经济学是其中之一。有影响的经济学成果不仅要顺应社会发展变化,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要反映社会实践,解决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经济学门类又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作用在于认识世界,应用经济学的作用在于改造世界。中原经济学的研究既要求我们重视基础研究,更要求我们重视应用研究,必须重视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河南的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和跨越式发展,河南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第一,要树立“新文科”理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新文科”建设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的学术成果,都要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这种交叉不仅包括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也包括与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原经济学的研究要顺应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运用多学科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建设“新文科”的过程中不断生长、成长。

第二,要突出应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他说:“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的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原经济学要把研究扎根在中原经济发展的土壤中,要把论文写在中原的大地上,一方面不断推动经济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多方位、多维度寻求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最优思路与路径。河南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实现“两个确保”的目标任务,擘画了现代化河南建设的蓝图,为我们提出一系列亟待深化的理论课题、一系列亟须解决的实践难题。中原经济学要扎根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实践,深入对接“十大战略”,聚焦国家创新高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应用性研究。

第三,要有学理支撑。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经世就是认识世界和管理世界,济民就是服务人民、帮助人民。新时代中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理支撑,一方面要视野广阔,要有历史视野、国际视角、全局观念,从中国看中原、从亚洲看中原、从世界看中原;另一方面研究对象要精准,一定来自对河南经济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一定内嵌于河南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一定解释河南经济现象的本质,解释其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从而能够推动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四,要树立学术自信。纵观历史,大国崛起与其经济学理论崛起和经济学话语权提升是相伴而行的。像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从英国逐渐转移到美国一样,在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世界经济中心也必然逐渐转移到中国。当前,河南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经济学大家,也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经济学大作。然而,我国经济学界有实力和自信迎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我们也应该有自信有能力总结河南发展的新鲜历史经验、鲜活实践和伟大成就,提出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的系统性经济理论,进而构建新时代中原经济学理

论体系。中原经济学一方面要善于提出揭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原创性成果,服务河南实践;另一方面,要力争推动重要研究成果从地域性研究上升为一般性经济理论研究,使之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可借鉴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案例和理论,从而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中部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新中原中心论”的经济发展走势,提出了“中原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诉求。然而,中原经济学专家学者群的形成,与构建中原经济学理论体系又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中原经济学专家学者群的形成,我们难以推出中原学经济理论体系。同时,中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中原经济学专家学者的崛起也是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体化推动。要通过《中原经济学概论》的编写,凝聚和汇聚河南经济学界的智慧和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河南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进军的新征程,要前瞻30年看问题。未来30年是现代化河南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原经济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大山大河大平原的中部地区建设具有中原特色、中原风格、中原气派的中原经济学是新时代赋予河南经济学界的机遇和使命,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河南建设“四个强省”、国家创新高地、幸福美好家园的时代需要,是河南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体系的现实需要,是增强河南社科界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需要。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精气神、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为奏响“新中原中心论”的时代最强音贡献经济学界的华丽乐章。我们要通过中原经济学的打造,奏响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河南最强音。

作者简介:李庚香,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中原学关联学科的讨论及学科体系的初步架构

◇ 张新斌

摘要:中原学的关联学科有甲骨学、黄河学、洛阳学、炎黄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发展是中原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关联学科在中原地区发展,并进行了有效整合。由此,中原学的学科体系在横向、纵向与立向三个方向进行架构,但其核心是以中原历史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学基本问题研究,是以中原古今哲学思想精神层面的系统研究为代表的中原学核心问题研究,以及以中原现实发展需要对策研究为代表的中原学主要问题研究。

关键词:中原学;关联学科;学科体系

自2016年李庚香研究员提出“中原学”概念之后^[1],有关中原学的讨论此起彼伏。在中原学提出之前,河南相继有甲骨学、黄河学、炎黄学、洛阳学等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学科问世,这些学科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原学的学科架构,已具有十分的必要性了,希望这种讨论,对中原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中原学关联学科的总体情况

(一)甲骨学:最有中原特色的专门学问

随着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一门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的专门学问——甲骨学,应运而生。甲骨文发现之后,便成为学术界的主要的攻关方向。甲骨学经历了甲骨文盗掘时期与甲骨学研究的草创阶段、甲骨文科学发掘时期与甲骨学研究的发展阶段、甲骨文的继续科学发掘与甲骨学的深入研究阶段、甲骨学的全面深入研究阶段、新时期甲骨学研究的新阶段^[2]。我们可以看到甲骨学的研究,不但凝聚

了一支专业性特别强的队伍,而且还涌现了刘鹗、罗振玉、王襄、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胡厚宣、孙海波、朱芳圃等大师级专家。其研究对象就是商周甲骨文,至今已经120余年,出版了大量成果,对“全部甲骨文四千多个单字中,目前仅释出无争议的一千多个”^[3]。尽管如此,学术界对甲骨文的研究,不仅有国内专家,也有一些国外的专家学者加入其中,使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从目前所见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甲骨学的专门的理论研究似乎很少。对甲骨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中,都将甲骨文和甲骨学混杂而用,但至少是在1949年便有了甲骨学的称谓^[4]。甲骨学与敦煌学一样,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都有特定的研究队伍,所以成果斐然。由于商代甲骨文发现在中原,从地域的角度而言,甲骨文也属于中原学的研究对象。

(二)黄河学:以中原为核心的综合学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黄河水利工作者首先提出了“黄学”的概念^[5]。198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宋正海研究员首次提出黄河学的学科构想^[6],这种学科架构的重点是“黄河区域”。2001年,清华大学的张红武教授等正式提出了创立黄河学的建议^[7],而这一学科涉及人文、自然、地质、水文等方面,毫无疑问应该属一门综合性的学问。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曾经就黄河学进行过专门的论述。黄河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黄河学,包括与黄河有关的所有学问,从古到今,从自然工程到社会人文;而狭义的黄河学,主要是指黄河变迁、黄河水利和黄河文化相关联的学问^[8]。有关黄河学的理论文章,虽然数量并不是太多,但在对黄河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中,还是提出了不少的见解。管华教授就认为,黄河学具有植根黄河根源、发扬黄河精神、发展黄河文化、弘扬黄河文明、促进黄河综合研究、推动黄河开发整治、促进黄河流域发展、解决黄河及流域内重大问题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9]。从2002年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到2004年该中心正式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始终以“黄河学”为研究重点,持续不断地推动“黄河学”的学科建设,围绕黄河学所涉及的人文、自然、经济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取得了不少学术收获。

(三) 洛阳学:由国际到国内的地方学问

洛阳学的概念是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2008年,复旦大学的韩昇教授在接受《洛阳日报》记者采访时就讲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的学者岸俊男就认为日本的平城京(奈良)在建设时受到的影响可能不是来自长安,而是洛阳,所以他在日本提出了洛阳学的概念^[10]。但是真正使洛阳学形成影响,则是在2010年11月,在东京明治大学召开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上,由气贺泽保规教授提出的。类似的洛阳学研讨会,已经先后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洛阳举行。2017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100余人到会。气贺泽保规在他的研究中,对中古时的洛阳地位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洛阳“具有神圣及文化性—精神性”。从

所发现的唐代墓志看,洛阳出土的数量占据一半,而长安—关中仅占有1/3左右,洛阳“具备成为世界中心的条件”。这正是日本提出的洛阳学所聚焦的以中古历史,尤其是以石志所反映的洛阳的特有地位^[11]。国内学者使用了洛阳学的概念,但对洛阳学的内涵,似乎有更为宽泛的理解。笔者曾经提出洛阳学应该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为主要对象,对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学问。就范围而言,以文献中的洛阳以及以洛阳为中心的洛阳地区,如河南郡、河南府的范围为研究的界限;就时间而言,以古代厚重的洛阳历史文化研究为重点,但要涵盖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产业拓展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12]。张占仓、唐金培则认为,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洛阳学的研究重点,包括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规律,洛阳古代历史文化演进及其影响,当前洛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以及洛阳未来发展战略研究等^[13]。总体而言,洛阳作为地方学以及城市学的属性,在国内学术界应该是得到认可的。洛阳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而有关洛阳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洛阳的历史地位。

(四) 炎黄学:以根源为切入点的新“国学”

炎黄学的起步时间并不长,2017年底,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了“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炎黄学正式开启之后,便开始邀请国内学术名家举行炎黄学的专题讲座,并着手编辑《炎黄学概论》,直接开始了构建炎黄学学科体系的尝试。但实际上学界在2010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研讨会”上就已提出了炎黄学的构想。霍彦儒则提出了炎黄学是以研究炎黄时代所发生的文化、历代对炎黄传说所进行的阐释认同和重构的文化,及炎黄二帝发祥与迁徙之地和炎黄文化的传播之地所发生的文化,通过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建立炎黄学系统而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14]。王震中则认为,炎黄学是带有跨学科特点的综合性新兴学科,也可以称为综合性学科。他认为,

在时代上,炎黄学研究所包括的时代范围,既包含了炎黄二帝及其所在的时代,也包括与炎黄密不可分的整个五帝时代乃至之前的三皇时代;在历史文献资料的使用上,以先秦时期的资料为第一等材料,以秦汉时期的资料为第二等材料,以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资料为第三等材料,也包含了考古学材料及人类学材料;在学科的构成上,炎黄学涉及历史学、历史文献学、训诂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是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15]。笔者在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认为,炎黄学就是以上古时期的炎帝黄帝为代表的人文始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其一,炎黄学要对以炎帝和黄帝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其二,炎黄学要对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群体进行专门研究;其三,炎黄学要对炎黄后裔为代表的文化进行研究;其四,炎黄学要对以炎黄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进行专门研究;其五,炎黄学尤其要注意研究炎黄文化当代的价值和应用^[16]。

二、中原学关联学科间的关系考察

(一) 中原学是个活力所在的大体系

中原学到底是什么?李庚香在他的首论文章中表述为,所谓中原学,即在地域上以河南为中心,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以河南乃至全国的中原文化专家为研究主体,将当前以各自的学科方法研究中原文化的专家整合为一个“中原学”研究群体,形成研究中原文化的高端团队^[1]。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原学来替代中原文化呢?笔者认为中原学的提出具有战略意义,但中原学一定是和中原文化有差别的,中原学一定要大于中原文化。笔者在后来的研究中认为:“中原学就是研究中原的学问,就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这一特定地域所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17]笔者将中原文化与中原发展作为中原学的两大学术命题,并将这两类看似不相干的学科体系,统合在中原学这样一个学术框架之中。当然,

由于中原的特殊历史地位,在这个体系中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人文内容,似乎占的比重更大,但由于中原学是因应现实需要破土而出的与地方发展相关的“实”学问,也是因应现实发展需要的“活”学问^[18],这是中原学与传统学科最大差异的活力所在。在讨论中原学时,李庚香强调“中原应当有学”,这是因为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中原学的发展对于实现让中原更加出彩的目标意义重大,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对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的意义,中原学实际上是打造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19]。所以,中原学这种以中原为攻关对象学问的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原学是研究中原的学问,是研究中原的文化、文明,是研究中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地方性知识体系。”^[19]这应该成为共识。

(二) 中原学包含了关联学科的重要内容

中原学的研究是以中原为研究对象,那么在中原发现的甲骨文,毫无疑问是中原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就是说甲骨学和中原学是有交叉的,这种交叉恰好反映了中原学的学科统合意义。至于中原学和洛阳学,由于洛阳是中原史前文化的核心,是中原历史上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中原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中原历史上思想文化的核心,所以洛阳学也是中原学的核心内容^[20]。中原学的体系建设中,很可能包含有“地域体系”,除洛阳学外,开封学、郑州学、南阳学、安阳学、商丘学等,也都会纳入其中^[21]。在最近的研究中,大家似乎都关注到了黄河学、炎黄学、洛阳学与中原学,中原学与黄河学有时空方面的重叠,但黄河学、炎黄学,“其学科标识在时空范围和学科影响力方面已超出中原历史文化的含义”^[22],或认为黄河学、黄帝学(炎黄学)、洛阳学为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三驾马车”,必将出现“三家归一”到中原学上^[19]。对于这个命题,黄河学(黄河文明)、炎黄学、中原学(中原历史文化),坚定不移地走学科化道路,客观上又推动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大学科群格局^[23]。这种以中原,尤其是中原关联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建立,必将促成中原问题研究再上

新的台阶。

三、中原学学科体系架构的初步设想

(一) 中原学的学科体系架构的讨论

笔者在中原学的最初研究中,将中原学的基本框架确定为中原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原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中原学的历史问题研究、中原学的文化精神研究、中原学的现实问题研究^[17]。这一考虑,主要是因中原学作为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问,必须研究解决其面临的重大和基本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原学的研究可从三条轴线展开:一是以时间为轴线展开纵向研究,二是以空间为轴线展开横向研究,三是以问题为轴线展开立体研究^[24]。这种思考可以包含中原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中原学的学科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对学科定位、学科队伍、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平台、学科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21]。当然,中原学研究应扩大学术视野,打破地域限制,立足中原,面向世界^[25],也应从历史区域分析法的角度去尝试建构中原学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6]。总的来说,学术界在对中原学学科架构的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诸多的尝试,提出了比较好的建议。

(二) 中原学学科体系架构的初步认知

中原学的学科体系架构是中原学构建的基础性工程,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实践,最终形成完善的中原学的学科体系架构。这种架构要从横、纵、立三个方面进行规划构建。

第一,在横向方面,形成中原区域板块的研究。要从自然地理、地貌特征、环境生态、人文传统、民俗风情等角度对中原文化板块进行区分,如古代的河南、河内、河东的划分。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及东部平原的划分,以及郑州、洛阳、开封、南阳、安阳等现代行政区划的划分,可能成为更小的地方学分支学科,成为中原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在纵向方面,形成对早期中原、历史中原、当代中原与未来中原等四大时间轴段的系统考察。早期中原指的是在文明国家出现之前的中原,这里

涉及中原人类的起源,中原人类族群的文化演进与社会组织的递变,中原早期聚落的演变以及生业方式的递进等。历史中原,主要是历史时期文明的演化、王朝的递变、中原中心地位的形成、中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变迁、中原内在区域间主次中心的变化规模、中原政治制度的贡献、中原族群的南北交流等。当代中原与未来中原,主要涉及当代中原的经济构建、当代中原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代中原族群的素质提升、中原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产业模式、当代中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等宏观问题的把控,以及微观问题的研究等。

第三,在立向方面,形成对各有关学科的专门研究。包括中原哲学、中原历史学、中原考古学、中原文学、中原艺术学、中原语言文字学、中原民俗学、中原法学、中原社会学、中原政治学、中原经济学以及中原历史地理学等,也就是说可以用不同的学科对中原进行专题研究。

虽然中原学的学科体系的架构非常宏大,但从中原学实用性的角度出发,中原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三大块。第一块,中原学的基本问题研究,这就是中原历史文化研究。中原历史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的辉煌,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的代表,具有根源和主干意义,因此认真研究中原历史文化,探寻中原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内核揭示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块,中原学的核心问题研究,这就是中原古今哲学思想精神层面的系统研究。从古到今,中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以及在实践中涌现出了大批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杰出代表性人物。直到现代,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新乡英模先进群体精神、南水北调精神等,均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代表。认真研究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的贡献,对于探寻东方精神的内在密码,具有典型意义。第三块,中原学的主要问题研究,中原现实发展需要的对策研究。中原发展面临很多的现实问题,这包括中原经济的发展、中原社会的进步、中原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等。中原学之所以具有鲜活性,就是因为中原学

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学科,不断解决中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就是中原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原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李庚香.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J].河南社会科学,2016(6):1-16.
- [2]王宇信,徐玉华.商周甲骨文[N].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3.
- [3]王宇信.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C]//考古学研究(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59-370.
- [4]胡厚宣.五十年来之甲骨学[M].上海:复旦大学之讲义本,1949.
- [5]王化云.大家来研究“黄学”[J].人民黄河,1985(6):3-5.
- [6]宋正海.黄河区域的综合研究[J].科学学研究,1989(4):19-36.
- [7]王洪伟.何谓“黄河学”?如何“黄河学”?——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C]//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6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13-27.
- [8]张新斌.六十年来黄河变迁、黄河文化的研究与黄河学的建立[C].黄河学高层论坛交流论文.河南大学,2009.
- [9]管华,张大丽.黄河学论纲[J],人民黄河,2005(11):3-7.
- [10]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昇[N].洛阳日报,2008-04-24.
- [11]气贺泽保规.中国中古洛阳的历史地位——兼论从墓志资料看到的“洛阳学”之可能性[C]//洛阳学研究——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525-532.
- [12]张新斌.河洛文化与洛阳学[J].中州学刊,2016(12):126-132.
- [13]张占仓,唐金培.洛阳学初论[J].中州学刊,2018(3):120-125.
- [14]霍彦儒.炎黄学论纲[J].宝鸡社会科学,2011(3):42-49.
- [15]王震中.炎黄学:炎黄文化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3):64-66.
- [16]张新斌.炎黄学三题[C].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交流论文.信阳师范学院,2017.
- [17]张新斌.中原学探论[J].河南社会科学,2017(10):119-124.
- [18]张新斌.中原学研究中的“漯河样板”[J].河南社会科学,2020(1):16-19.
- [19]李庚香.走进新时代的中原学——构建新时代中原学的历史使命和实践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2019(8):1-9.
- [20]李龙.洛阳学与中原学内涵关系探析[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8(5):24-30.
- [21]王喜成.中原学研究应突出“四性”、构建四大体系[J].河南社会科学,2019(7):58-61.
- [22]尹全海.中原学的地域性与开放性[J].河南社会科学,2019(7):61-64.
- [23]宋争辉.构建“三位一体”的中原国学大学学科群[N].光明日报,2020-08-15.
- [24]宋朝丽,汪振军.构建中原学基本理论体系探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9(11):9-15.
- [25]周苏灿,罗诗谦.中原学若干基本问题再思考[J].河南社会科学,2020(1):2-7.
- [26]陈隆文.中原研究与历史区域分析法[J].河南社会科学,2020(1):8-15.

作者简介:张新斌(1960—),男,河南新乡人,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河南省高层次B类人才,河南省优秀专家,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先秦历史与考古、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等。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第10期)

中原学之本：厚重博大的中原历史文化

◇王星光

摘要：中原学是以中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原学以中原文化为其研究的中心内容，意在构建中原特色、中原风格、中原风貌的“中原学”学科。“中原学”实以中原历史文化为其核心构成和立学之本。中华文化主要发祥于中原大地，中原文化尤其是中原历史文化绝不是一般的区域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和主干，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文化、主流文化、正统文化，中原是“四大发明”的故乡即可彰显其重要地位。植根于深厚广博的中原历史文化之上的“中原学”，研究领域之广阔、研究成果之典型、研究影响之深远，绝非一般的区域文化所媲美，值得学界同仁深耕细耘，戮力探究。

关键词：中原学；中原文化；中原历史文化

中原学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这一特定地域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1]。提出建设“中原学”，“意在整合各学科中的中原文化研究力量，引导中原文化研究方向，将多学科方法集中于中原文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中，从而拓展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而言之，所谓“中原学”，即在地域上以河南为中心，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以河南乃至全国的中原文化专家为研究主体，将当前以各自的学科方法研究中原文化的专家整合为一个“中原学”研究群体，形成研究中原文化的高端团队，以继承和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现代中国文化为指向，以凝练中原文化精神、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直接目标，以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追求，构建具有中原特色、时代风貌的“中原学”^[2]。从以上论述“中原学”的学科定义时连续出现10个“中原文化”的名词可知，“中原学”的首倡者是“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并以此来划分中原文化研究方向，形成中原文化研究团队和高地，构建中原特色、中原风格、中原风貌的“中原学”。由此不难看出，“中原文化”是中原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和主旨所在。需要指出的是，中原文化尤其

是中原历史文化绝不是一般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和主干。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主要发祥于中原大地，并且中原也是中华历史文化不断孕育、繁荣和发展的沃土。

一、中原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

早在五六十万年以前，南召猿人就活动在豫西南的南阳盆地。在许昌灵井发现的“许昌人”头盖骨化石，距今已有10万~8万年，对研究东亚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从而表明河南是中国现代人形成的中心区域之所在。在安阳小南海洞穴发现的距今2.2万~1.1万年的精制石器，则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标本，预示着中国史前历史将要迈入新的时代。

发现于郑州新密的李家沟文化遗址，距今10500~8600年，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遗址，揭开了中原新石器时代和农耕文明的崭新一页^[3]。新郑裴李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遗址。裴李岗文化距今有9000~7000年，分布在河南省内的广大地区，出土的彩陶双耳壶、陶塑人头像、椭圆形石磨盘、圆柱形石

磨棒、舌状石铲、锯齿石镰,表明了裴李岗文化的高度繁荣。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有五孔、六孔、八孔、两孔和七孔,至今仍可吹奏,是当今世界上最早具备七声音阶结构的乐器实物;发现的炭化稻米,将中原种植稻米的时间提到8000年以前。与周围其他省区的新石器文化如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陕西地区的老官台文化、河北地区的磁山文化、湖北地区的城背溪文化等相比,裴李岗文化的发达程度和分布范围,尤其是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已开始显现出领先的态势。接续而来的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以在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命名,河南作为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磨制石器种类繁多,彩陶器皿异彩纷呈。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至今已迎来百年华诞。郑州大河村陶器上绘制有天文图案,濮阳西水坡遗址更出现了蚌塑龙虎图。灵宝北阳平遗址现存面积达90万平方米,为豫西地区最大的仰韶文化聚落群遗址。在巩义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双槐树大型聚落遗址,遗迹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因其居于河洛交会的中心区域,被专家称为“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三重大型环壕,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大型中心居址位于内环壕北部正中,并在东南端发现具有瓮城结构的布局;加之融合北斗九星的大型遗迹的相关建筑,表明先民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已有“天地之中”宇宙观萌芽;骨质蚕雕艺术品的出现,与青台、汪沟村等同时期丝织物遗存的发现,证实5300年前中原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与繁荣的农业技术共同创造出领先于世的农桑文明。^[4]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彩陶以花瓣纹为显著特征,体现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关系,为研究古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证。郑州西山古城距今5300~4800年,是黄河流域最早发现的夯筑城池;而登封王城岗发现的龙山城墙遗迹,为“禹都阳城”提供了有力证据,从此,掀开了中华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建立的国家。在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面积达3平方公里,遗址中的宫殿由主体殿堂、廊庑、庭院和大门组成,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加之青铜工具、兵器,尤其是铜鼎、铜爵及镶绿松

石兽面铜牌饰的发现,证明二里头遗址应是夏王朝的都城之所在。夏王朝曾绵延长达400多年,国都也屡有迁徙,如果说登封王城岗是夏代早期都城,那么偃师二里头则为夏代中晚期的王都。

商代是我国上古时期的繁盛时代。尽管对商代早期都城的地望究竟是在郑州还是在偃师尸乡沟仍有争论,但这两处商城都在河南则是不争的事实。郑州商城由宫城、内城、郭城和护城河组成,内城中宫城墙、壕沟、蓄水池、排水沟、祭祀坑等大型建筑,周长约为7公里。在城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作坊遗址。尤其是出土的高100厘米、长62.5厘米、宽60.8厘米、重86.4公斤的杜岭方鼎,是我国最早装饰饕餮纹和乳钉纹的青铜礼器,也是世界上年代最早、体积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郑州商城的规划布局、宫殿建筑、青铜铸造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青铜时代的最高水平。正是有鉴于此,郑州才有资格被列入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遗址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4公里,面积达24平方公里。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和铸铜、制玉、制骨作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1939年春挖出的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达832.84公斤的后(司)母戊铜鼎,庄重浑厚,铸造精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是存世的体量最大、重量最重的古代青铜器,是世界青铜史上的典范。在发现的十多万片甲骨中,已考释出1000多字,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也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安阳殷墟毫无争议地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安阳还被确定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并于200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

当武王伐纣大获全胜、终以小邦周取代大国殷之时,头脑清醒的周公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派出天文官员在今嵩山脚下的河南登封进行天文测量以定天下之中,至今周公测景台还在那里巍然耸立。于是周公随即在远离国都所在地——陕西关中

镐京东部的洛阳营建成周,这样,西周实行的是东、西二都制,洛阳实际上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之所在。从此,“得中原者得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难以割舍的情结。

从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在河南的发现到新石器时代李家沟、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的繁荣,从中国早期王朝夏商立国在中原到洛阳成周都城的营建,都充分证明河南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源头和立国的根基。

二、中原历史文化是中华历史文化的主干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东迁中原的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也就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卫国、宋国、郑国、许国、蔡国、陈国等曾是雄踞一方的诸侯强国。到了战国时期,这里成了韩、赵、魏、齐、楚、秦、燕七雄逐鹿中原的主战场。北制之战、晋灭虢虞之战、城濮之战、崤之战、伊阙之战、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著名战役都发生在中原大地。

中原大地也是政治家、思想家活动的舞台。道家鼻祖老子为今河南鹿邑人,所著《道德经》阐述了“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6]。其追随者庄周是今商丘人,所著《庄子》一书阐扬了老子的学说。《老子》和《庄子》同为中华元典中的精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祖籍为宋国(今商丘一带),他周游列国的范围在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并长期在卫国居住。这些地方多为中原诸侯国家,晚年的孔子才回到鲁国整理文献,可以说其思想学说是在中原大地游说讲学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商鞅,战国时期卫国(今濮阳)人,是法家一派中以法为主的代表性人物。《商君书》记载了商鞅的思想和言论,主张制定法律要因时而异,不能尊古不变。郑国人申不害、韩国人韩非为法家学派的创始人。尤其是韩非将法、术、势三大法治要素结为一体,主张“抱法处势则治”^[7],为秦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深深扎根于中原沃土的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时期,洛阳的地位仅次于都城长安,河南郡的地位仅次于关中的京兆邑。汉武帝曾指出:“洛阳

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8]东汉定都洛阳,河南又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洛阳城长约九里,宽约六里,古称“九六城”,南宫殿堂巍峨壮观,北宫寝殿豪华气派。在国家体制方面,东汉在中朝设立尚书台,加强皇权。在地方上设立州、郡、县三级机构;撤销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加强国家对军队的控制。东汉重视儒学和教育。洛阳城南的太学为国立最高学府,曾动用十万二千人修建校舍,“凡所建构二百四十序,千八百五十室”^[9]。最多时,学校可容纳学生30000人。太学门前耸立着46通高大的熹平石经,是东汉熹平年间由文学家蔡邕(今杞县人)书写的《尚书》《诗经》《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六经,它们是上万名太学生的必读教材和六经的标准文本。洛阳太学应是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班固在洛阳编著我国第一部断代体史书——《汉书》;许慎(今郾城人)所著《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南阳人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由此可见东汉中原地区经济的繁荣、教育的发达、科技文化的兴盛。曹魏、西晋和北魏时期,仍以洛阳为都。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比汉魏洛阳故城大一倍多,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洛阳伽蓝记》描绘北魏时期的洛阳道:“门巷休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10]^[6],宫殿楼阁雕梁画栋,佛塔寺院也“昭提栒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10]^[1]。由此可见北魏时期洛阳的富丽堂皇。

到了隋代,洛阳继续受到重视。隋炀帝下令从全国征发200万民工兴建洛阳城,称为东都,朝官均至洛阳,其地位超过京城长安,并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及至唐代,洛阳的地位又得到了隆升。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六年下令洛阳“号洛阳宫”。唐高宗正式以洛阳为东都,洛阳成为与长安齐名的统治中心。武则天主政时,改东都为神都,在她称帝建周后的20多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神都洛阳度过。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据说是武则天的化身。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丰颐秀目,端庄典雅,含蓄而神秘的微笑中透露出对世间的关爱和智慧的光芒,被誉为东方艺术的杰作。龙门石窟已入选为世界文化

遗产。实际上从周公营建成周,到武则天定洛阳为神都,洛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缘于此,宋代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才吟咏道:“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今封丘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了大宋王朝,定国都于东京(今开封)。东京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在皇城四周。外城(亦称罗城)平面近方形,东墙长7660米,西墙长7590米,南墙长6990米,北墙长6940米,周长约29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皆三门,北面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全城道路从市中心通向各城门,主干道称为御路者有三条,其中的一条从皇城南门至外城南门的南北向干道,宽200米,是全城的主轴线。东京从始建起即没有封闭的里坊。它以坊巷为骨架,城市面貌颇具特色。其主要街道成为繁华的商业街,皇城正南的御路两旁有御廊,允许商人交易,州桥以东、以西和御街店铺林立,潘楼街也十分繁华。东京的住宅与商店分段布置,州桥以北为住宅,州桥以南为店铺。有的街道住宅与商店混杂,有的集中的市与商业街并存。大相国寺被称为“瓦市”,其“中庭、两庑可容万人”,“每一交易,动计千万”^{[11]44}。在一些街区还存在夜市,如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11]63}。许多酒楼、餐馆通宵营业。《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东京商业繁华、文化昌盛的面貌。北宋末,东京人口有130万~19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最早的纸币“交子”已在流通。东京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商业文化中心。东京的城市结构冲破了传统的里坊制,更多地顺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历史上都城布局发生重要转折的焦点,对后世的都城建制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宋王朝无论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处于当时世界之前茅。如在思想文化方面,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古文运动的完成,宋词的繁荣,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以及科举制度的完善,教育的发达,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12]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3]

由上显见,从两周时期的中华元典到东汉王朝的国家建构,从隋唐洛阳的繁华到北宋东京的极盛,河南都撑起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脊梁。

三、中原是“四大发明”的故乡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指出:“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14]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中国人民为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主要是在中原地区产生和传播开来的。

东汉蔡伦在洛阳任尚方令时,与工匠们一起总结前人造纸经验,于公元105年制造了第一批植物纤维纸。造纸工艺的改进和推广,为书籍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我国书籍史上,也是世界书籍史上的一件大事。有了纸,才能大量抄书、藏书,才可能有印刷术的发明,从而大量印书。书籍数量的增加,使人类创造的文化知识得以较多的记载和保存,并广泛地传播,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没有汉代纸的发明就没有灿烂的唐宋文化。中国古代造纸术发明后,纸至少在5世纪以前已传到朝鲜和日本,而造纸术在公元610年也传到了日本。到了9世纪,造纸术已被阿拉伯人掌握。以后又传到叙利亚、埃及及北非海岸,11世纪时传到君士坦丁堡,12世纪西班牙已开始造纸,以后便在欧洲大陆风行。13世纪蒙古人的西征促使纸币及纸制品在西方更加盛行。欧洲人评价说,纸是发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重要因素。总之,纸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化。

印刷术也是在中原发明并最先得得到应用的。印刷术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一般认为雕版印刷产生在隋唐之际,与印刷佛经有关。我国最早的寺院为东汉永平七年(64)建于洛阳的白马寺,洛阳又是蔡伦“造纸”的所在地。隋唐时期,中原之地佛教兴盛,佛经印刷盛行。到了北宋,文风大盛,朝廷的崇文院、秘书省、司天监、国子监等机构都刻印书籍。开封城内还设有许多私家印书作坊,成为全国的印刷中心之一。私人刊印书籍之风也很盛行,且印刷精美,质量上乘。这都为印刷技术的改进

创造了条件。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用胶泥活字印刷。沈括长期在京城开封做官,对京城的印刷业更为熟悉:在开封外的四川成都、浙江杭州、福建建安这三大印刷中心,都不易找到制造活字的胶泥用土,而在包括开封在内的河南境内,胶泥土壤则唾手可得。据此推测,胶泥活字印刷技术很有可能在京城开封一带较早出现。活字印刷使印刷效率大大提高,以后又逐渐出现木活字、铅活字、铜活字、锡活字等,印刷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印刷技术也由京城向全国各地和海外传播开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号称浩若烟海,为世界之最,这与中国的造纸和印刷术发达直接相关。印刷术通过文化交流、战争等方式先后传到了东亚、南亚及西方国家。朝鲜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发明了铜活字,1485年朝鲜金宗直在为《白氏文集》作序时,明确表示,“活字法由沈括首创”,说明朝鲜的活字知识来源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过较多的中国印刷品。元末大乱,有大批雕版工匠东渡日本,为日本印刷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592—1598年,丰臣秀吉在对朝鲜的战争中将活字印刷设备掠回日本,活字印刷术在日本得以发展,但日本更通用木活字。越南15世纪出现了木活字的印刷物,也与中国印刷术的南传有着密切关系。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和马可·波罗返回欧洲,中国的印刷术可能由此而传入欧洲。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认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由此可见印刷术的发明意义是多么重大。

火药配方约在唐代业已为炼丹术士所掌握。唐、五代时也偶见火药用于战争的记载。北宋时期,由于宋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绵不断,火药兵器受到特别重视。开宝三年(970),兵部令使冯继异献火箭法,宋太祖赵匡胤赐衣物束帛,并在开封试制。到开宝八年(975),已拥有火箭2万多支,并有火炮等抛射武器。宋真宗时,唐福、石普先后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11世纪,宋敏求的《东京记》中就记

载了东京设立国家火药兵工厂的情况。宋仁宗还命曾公亮、丁度编著《武经总要》,书中记载了东京制造的火箭、火枪、火药鞭炮、火鸡、竹火鹏、铁嘴火鹏、烟球、毒药烟球、霹雳火球、火炮等火器,制定了火药、火器的制造规范。该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科技著作。宋王朝已将火器用于战争,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一次就从东京向陕西运送火箭25万支。由此可见河南在火药及火兵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将火药武器传至西班牙,后传遍欧洲的。尤其是蒙古人的西征加快了火药及火药武器的西传。阿拉伯称由中国传来的火药武器为“中国铁”“契丹火花”“契丹花”“契丹火箭”“契丹火枪”等。火药、火器传到欧洲,不仅改变了作战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资产阶级把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为资本主义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战国时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韩非在《韩非子·有度》篇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定朝夕”的记载,但方便实用的指南针见于宋代文献。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曾在东京任司天监的杨维德在此后所著《莹原总录》一书中首先记载了一种指示方向的磁针,当为指南针。曾公亮、丁度在《武经总要》中记载了可辨别方向的指南鱼。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水浮、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旋丝四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北宋宣和(1119—1125)时朱彧在《萍州可谈》卷二中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稍后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这说明指南针在水上行船时已作为辨别方向的常用工具。宋代是指南针向实用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开封作为北宋国都,对指南针的制造和传播理应起到重要作用。指南针发明后,在12世纪末传到阿拉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认为,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是在1180年左右。指南针的西传,为欧洲的社会巨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它不仅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对于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对16世纪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均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及市场开拓,对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中世纪立下了重要功勋。这也是中原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所

做出的伟大贡献。

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16]。

马克思评论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7]“四大发明”只是中原古代科技文明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古代河南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四、结语

如果屈指略算一下便可发现,若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算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有明确记载的古代历史共历有3981年;而从夏代在中原立国,到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1234年以东京汴梁为都的金军被元军消灭,金朝覆亡,在这长达3304年当中,中原地区几乎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也可以说,在这3981年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史和经济文化发展史中,有3304年的历史主要是在中原大地上演的。中原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由此足以说明,中原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具有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原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更是中原学的立学之本;而植根于厚重广博的中原历史文化之上的中原学可谓根深叶茂,研究领域之广阔、研究成果之典型、研究影响之深远,绝非一般的区域文化媲美,值得学界同仁深耕细耘,戮力探究。

参考文献:

[1] 张新斌. 中原学关联学科的讨论及学科体系的初

- 步架构[J].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2020(10): 19-22.
- [2] 李庚香. 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 奋力建设思想河南: 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J]. 河南社会科学, 2016(6): 1-16.
- [3] 王星光. 李家沟遗址与中原农业的起源[J]. 中国农史, 2013(6): 13-20.
- [4] 王胜昔. 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揭开五千年前“河洛古国”神秘面纱[N]. 光明日报, 2020-05-08(01).
- [5] 王星光, 贾兵强. 中原历史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251.
- [6] 老子, 著. 河上公, 注. 严遵, 指归. 王弼, 注. 刘思禾, 校点. 老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43.
- [7] 王先慎, 撰. 钟哲, 点校. 韩非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428.
- [8] 司马迁. 史记·滑稽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781.
- [9] 马端临. 文献通考·学校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86.
- [10] 杨銮之, 撰. 范祥雍, 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11] 孟元老, 著. 王永宽, 注译. 东京梦华录[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 [12] 邓广铭.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 1986(2): 137-144.
- [13] 陈寅恪. 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77.
- [1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5: 1.
- [15] 王星光. 中原科学技术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4-6.
- [16] 培根. 新工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14.
- [17] 马克思, 恩格斯. 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27.

作者简介: 王星光(1957—), 男, 河南获嘉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科学技术史、生态环境史。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10期)

中原学之夏文化研究的思考

◇ 李 龙

2021年3月20日,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就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相关情况。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再次惊艳全世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热议,考古工作也一下从小众冷门进入大众的视野,热度爆表。夏文化是中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对夏文化考古与推动中原学研究有颇多的启示。

一、三星堆新发现引起关注

三星堆曾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次的新发现,同样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一是新闻媒体集中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连续4天以最高规格在新闻频道现场直播,并在其他频道播发实时新闻。新华社、人民网、光明网等重量级媒体及时跟进,为全世界呈现了中华文明考古大餐。CNN、BBC、《南华早报》等海外媒体对此都进行了及时的跟进报道,三星堆的全球关注度可与秦始皇兵马俑并肩。二是海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评价三星堆考古新发现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事业的有益探索。美国加州大学考古学家罗泰、哈佛大学考古学家费正清等人认为,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及亚洲文明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三是海内外网友热议。三星堆迅速开启了刷屏模式,中华文明引起了海内外网友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四是参观热潮的出现。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带火了三星堆博物馆,2021年“五一”假期,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的三星堆博物馆共接待游客8万人,比2019年增长3倍多,文创产

品热销。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被高度关注,其影响可谓一次对中华历史文化遗产认知的革命,背后反映了国民文化自信的与日俱增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提升。

二、三星堆新成果带来考古之问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给我们呈现了辉煌灿烂的中华物质文明,同时也给我们传统的考古认知和历史学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重新思考。

其一,中华文明源头问题。三星堆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与中原地区或传统认知的华夏文化核心区的青铜器特征迥异,但是与两河流域及古埃及青铜文化有类似之处,部分学者和网民据此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西来说”是舶来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部分学者为服务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而牵强附会而来。夏鼐等前辈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明,中华文明自成体系且包容开放,文化交流过程中吸纳了不同的文明元素。

其二,“黄河流域中心论”“中原中心论”。三星堆出土众多的精美的青铜器甚至金制品,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超越了中原文明,要淡化“中原文明中心论”,提出“多文明中心论”“文明中心转移论”。“黄河流域中心论”“中原中心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学家夏鼐等根据黄河流域考古发现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论”,但并没有否定中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具有

向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凝聚的发展趋势,其时间临界点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其三,夏文化问题。夏文化探索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重大学术问题,也一直是考古学史上争鸣最为激烈、最为持久的专题之一。学术界先后提出过仰韶文化夏文化说、龙山文化夏文化说、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说等观点。由于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文字等可以证明夏族属的直接证据,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被想当然地与夏文化联系在一起,产生了“谁是夏文化”一时难以定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夏文化不存在,即使是20世纪的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怀疑的也是历代文献叠加记载的夏文化内容而不是否认夏的存在。《尚书》《史记》等经典历史文献记载与近百年考古探索的成果都证明,夏文化探索的核心在中原。至少目前,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面貌相对最接近夏文化的历史真相。

三、三星堆关注热凸显河南夏文化考古工作短板

三星堆考古带来的谜团,使得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有了多种不同的解读,无形中对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中原文化软实力形成冲击与挑战。河南各界尤其是历史与考古学界在应对这一问题中暴露了两大工作短板:一是应对缓慢。面对各种质疑的观点,反应迟钝。学术界、媒体甚至政府有关部门没有迅速发声,没有利用现有科研成果讲清辨明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和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二是话语权缺失。中原地区夏文化研究进展缓慢,缺少有影响力的科研团队和学术带头人,学术话语权不强,对外交流影响力不够。这两大短板值得我们警惕,应该尽快加以改善。

四、三星堆考古给河南夏文化研究的启示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引起的大众关注热说明考古已经不是传统的冷门与小众学科,而是肩负着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及满足大众文化生活需要的历史

使命。正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所说,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慢慢变成已知。当人们面对未知的历史时,考古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挺身而出,大声释疑,最大限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理性看待考古发现中的阶段性谜团。这也给河南考古研究工作诸多启示:

一是学术研讨要有新目标。建议由河南省委、省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讨会,邀请国内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就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进行学术交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求同存异,讲清楚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作的现状、瓶颈与挑战,形成共识与建议,共同推进中原学之夏文化相关研究工作。

二是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新时期考古新发现会越来越多,阶段性的未知考古课题势必会增加。面对新的与中原有关的考古文化现象,学术界、新闻媒体与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及时跟进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宣传活动。学术界要根据考古发现材料讲清事实,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应该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坐视不理或继续搞学术小圈子,自说自话,孤芳自赏。

三是夏文化研究要有新进展。河南要加大考古发掘力度,从点到面,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寻找新的夏文化遗址。要加大研究力度,组织科研团队深化二里头夏文化研究,争取早日在前辈的基础上有较大的理论突破,赢得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的话语权,打造中原学特色学科。

四是科研整合要有大力度。河南夏文化研究多年来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研团队和学术领军人物。要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为核心,整合科研队伍,培养夏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

作者简介:李龙,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形塑共同体：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的内在耦合性研究^①

◇王明钦,岳鹏星

黄河文化与中原学是一组关键词,也是一组研究命题,如今已经成为一组文化符号,涉及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众所周知,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崇高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学界针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历久弥新。与此位阶有所差异,“中原学”则是李庚香先生近年提出的针对中原地区学术研究的一个命题,属于较为新颖的学术话语。“中原学”在空间范围上主要是以河南省域为中心,着力于中原文化研究,意图将学界针对中原文化的研究群体整合为“中原学派”。同时,还提出以推进中原文化研究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以现实观照为抓手,进而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学术界针对中原学、黄河文化的思考与探讨可谓汗牛充栋。笔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能够进一步廓清中原学与黄河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继续推进靶向性研究,对于推进中原学学科建设则具有重要价值。试简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的地域耦合性

从空间的角度而言,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之所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在于二者之间的地域耦合性,也即中原学的地域指向和黄河文化的存续空间具有一致性。

顾名思义,中原学即研究中原的学问。从地理空间的意义上讲,“中原”一词作为地域之名意为“天下之中”。《尚书·禹贡》中命名的“豫州”,主要指的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中原学”主要从狭义上的中原即河南立论,其缘由在于河南所在的地域最

有资格代表中原和中原文化,不仅仅因为唯有河南全境尽在中原文化圈的覆盖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河南省具有中原文化最基本的文化因子,同时还向周边区域辐射。正是在此空间属性的基础之上,中原学形成了以河南为核心的地域底色,并主要致力于研究河南地区文化的嬗变以及服务于现实的需求导向。显然,河南省域是中原学思考的基点,同时是具有现实导向价值的命题归属。也缘于中原学的地域属性,中原文化成为依存于中原地区的中原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正如李庚香先生所言,中原文化即中原地区的文化。它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又是其他地域文化的渊薮。近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在区域文化演进过程中,与荆楚、吴越、岭南等地域文化研究相比,中原文化的相关研究处于滞后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在新时代伴随着中部崛起的发展态势,重新梳理中原文化的意义,以满足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需要。

与中原学的地域指向相对明确不同,黄河文化的地域指向比较复杂。从空间属性上看,黄河文化紧紧依赖于黄河作为自然河流的空间载体。黄河作为自然河流本身具有着发育形成的过程,根据多方面的研究,古黄河的地质变迁过程主要有古黄河孕育期、古黄河诞生成长期、形成海洋水系等阶段,而真正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华夏文明产生重要意义的时间则是在距今1万年的早、中全新世时期。该时期的黄河沟系发育迅猛,尤其是黄土高原,出现“千沟万壑”,是黄河水系的大发展时期。华夏先民与黄河之间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留下了最早

的历史记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远古洪荒时代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华夏先民改造自然条件,与黄河展开文化联结的初始。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黄河的泛滥成为王朝密切关注的问题,甚至是关系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同时,正是因为黄河容易泛滥,黄河流域文化的波及面更加宽泛。因此,黄河形成史、改道泛滥史使得黄河文化的地域指向异常广阔。其地域空间远远大于河南一地,也并非河南一地所能囊括。只是,河南一地对于黄河而言,意义特别重大。首先,河南地处黄河从黄土高原到大平原的出口,塑造了黄河在中下游的区位。其次,人类在河南一带活动频繁,为大河文明和中华文化奠定了地利与人和的基石。再次,河南区域与黄河难舍难分,从一而终。

也正因如此,中原学研究以河南地区为空间指向,其中也瞄准了黄河在河南区域的空间属性。这也构成了中原学与黄河文化内在一致性的地域耦合价值。从文化生成的空间背景考虑,总体上可以说黄河文化是一种流域文化,属于一种大河文明,统摄于大河文明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内在密切的关系,具有较高的世界意义、时代价值。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同文明的起源和发生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世界上著名的古文明均孕育于大河流域。同样,中国的古文明也主要孕育于黄河流域,其中河南地区是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因此,黄河文化不仅围绕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本体进行思考,同时进一步开拓开展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探讨,也有助于形成更有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义的研究话语体系。

二、中原学的文化研究指向与黄河文化的耦合性

中原学的文化研究指向与黄河文化之间并不完全相同,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而言,中原文化是从属于黄河文化的一个组成单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代表性。从哲学的角度说,可以认为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之间存在着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意味,中原文化的特殊性对于黄河文化而言完全适合,黄河文化的普遍性也适用于中原文化。

对于中原学而言,目前学者们的思考点在于学科化的方向。在研究的内容上,多主张以中原文化

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在国家倡导文化自信的层面,意图通过挖掘中原传统文化,进而实现优秀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则主张针对当下中原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出现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案,提供基本的学理支撑。因此,中原学在发掘与应用优秀传统中原文化的基础上,需要下大力气,毕竟中原文化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包罗万象,非常丰富。而针对现实性问题的思考,则需要凝聚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展调研和学术研究活动。

至于黄河文化则众说纷纭,一般意义上只要涉及黄河元素的内容均在其中。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在其编撰的鸿篇巨制《黄河文化》中认为,黄河文化是一个自强不息的生命体。可以说,黄河文化是一部自然与人文、精神与科技、经济与文化、科学与艺术、价值与风俗、历史与地理相互融合的综合体。因此,中原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构成单元是黄河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此种定位,在中原学学科发展之中,李庚香先生也已经有所论述。在他看来,“中原学”自身是在黄河流域孕育的,构成了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河文明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中原学发挥了重要的价值。

只是,如何在黄河文化的视域之下看待中原文化,如何在中原文化的研究中思考黄河文化,是两个重要的方向和命题。或者说,中原文化对于黄河文化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根、中华文化之魂。中原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重心,决定了学术界在研究中原文化的同时,实际上就相当于在研究黄河文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中原学在探究过程中,从中原视野上升到黄河文化的研究视野,其结果最终上升为华夏文明的视野。葛剑雄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一文中,侧重于理解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生成和地位问题。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黄河文化。黄河文化不应强调地域性特点,而应该强调共性,因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在这里发展,许多地域的文明都是黄河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形成的,母体依然是黄河文化。黄河曾经哺育了华夏民族的主体,黄河儿女遍布中华大地,并已走向世界各地。因此,必须从“中原学”中重新定位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乃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学者

丁素认为,中原学应当是对中原文化和中华文明核心地域、核心问题的再研究、再概括,是对中原文化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去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明又怎样在根与魂的核心内容上体现中原文化的风采和已有的贡献这两方面互动关系的现代新解、当代新释^[2]。同时,在黄河文化研究之中,突出中原文化的地域性、特色性、典型性和价值性,也弥足重要^[3]。

在如何处理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的关系方面,李庚香先生提出,希望中原学学科建设要以黄河文明、黄河文化为主轴、主体和主方向,重点做好三篇文章:一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文明、中原文化的科学论断,准确把握中原文化作为华夏文化之根、中华文化之魂的历史定位。二是抓住农耕文明、家国同构、治理体系三个维度,全方位认识黄河文化的主干性、丰富性、融合性。三是着力突显黄河文化与中原学研究对于“人类起源的一元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河南高质量发展”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所论至当、至实,也为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三、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的路径耦合性

根据目前中原学和黄河文化研究的具体情状,如何凝聚共识,形成力量,成为推进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必须解决的方法论命题。中原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中原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原区域发展现实性问题研究,进而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性统一。中原学学科化方向对于中原学自身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李庚香先生认为,对于中原学而言,走学科化道路,建设中原学,为大省河南的发展提供经世致用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话语体系,标志着中原学学科建设的自觉。对于中原学自身而言,从学界已有的中原历史文化研究到中原学的提出就属于质的提升,而将中原历史文化研究扩展到黄河文化、黄河文明研究同样是质的提升^[4]。这也契合了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的路径方向。

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共同体包括三个要素:共同的文化记忆、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精

神。打造文化共同体,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建立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理想追求,为社会发展提供巨大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可以有效协调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提升文化品位,增强民族自信;可以强化社会认同,弥合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因此说,围绕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形成一批知识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性力量,推进民众走进社会主流性实践,形成共同的文化生活,践行着文化精神,既有助于学科发展,也有助于弘扬黄河文化。在实践层面,就需要为打造文化共同体而努力。具体路径方面,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双轮驱动、三个工程。

一条主线,即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不管是中原学学科建设还是黄河文化研究,其最终归途都在于顺应历史之大势,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中原学学科建设和黄河文化研究在民族、国家层面的终极意义。

双轮驱动即一方面立足于中原学学科推进知识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立足于黄河文化研究提振民族精神,推进二者的相融互惠。在中原学学科推进知识体系建构方面,首先,以炎黄学、宋学、黄河学、洛阳学等作为学科支撑,立足中原大地,推进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以夯实中原学的基底。其次,以中原文化专题为主,从物质、制度、精神等领域瞄准“专”“深”“新”等特点,构成专题研究,形成网状研究态势,确保中原学学科的深入发展。再次,以面向中原现实需求为导向,结合重大战略需求,谋篇布局,融入社会主流实践过程中,即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征程。在立足于黄河文化研究提振民族精神方面,首先,挖掘中原地区核心地带的黄河文化谱系,一方面根据时间轴的发展趋向,瞄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系统性地发掘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生态体系;另一方面,以空间属性为重要着力点,从空间角度对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专题研究,可以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其次,在厘清黄河文化发展基本脉络的前提下,以现实问题为专题开展研究,尝试通过不同学科的支撑,构筑文化服务于现实发展的体系。再次,发掘黄河文化、中原

文化研究的精神指向,建立文化主题公园、场馆,设计项目活动,增强民众素养、丰富民众文化生活,提高全民文明程度,进而提振民族精神。

三个工程即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培育工程、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科平台创建工程、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体制机制建设工程。在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培育工程方面,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倡议成立“中原学派”^[5],形成学术风格。一方面,继续凝聚学科共识,在学者群体中形成稳健的概念体系。特别是在中原学概念、范畴、研究方法与学科定位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增进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依托已经形成的研究基础,以省内科研院所为基本力量,依托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省内高校有关特色优势学科的支持,以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中原学科建设,以后备学科梯队化助推中原学学科建设,最终打造一流学科生态体系。在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学科平台创建工程方面,首先要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立体化宣传平台、多层次交流平台,通过众多平台的搭建,夯实研究基础,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第八次思想重构中去,继往开来,形成有力的平台支撑。其次要搭建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平台。将中原学学科建设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学学科建设进行交流,将黄河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样态进行比较和交流,增强中原学学科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继续增进黄河文化的普适性价值参与,为构筑人类优秀文化共同体提供坚实基础。在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体制机制建设工程方面,一方面,将构建中原学视为一项系统工程,争取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支持,实施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项目,打造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中原品牌,启动中原学研究与建设工程,进而在政府供给层面给予政策制定、经费投入、项目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帮扶。另一方面,积极借用社会力量,发挥社团作用,增进国内外交流,设立交流基金,完善奖、评、助制度体系,出版研究资料和成果,建立推广应用基地,进而推动中原学学科的发展,推进黄河文化研究的深入。

四、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互为张力,同频共振

文化在历史中产生,可以看作历史的内涵。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兹说过,一个民族的详细文化清

单,几乎完全是历史在传播中积累的结果,一种活生生的文化,总是历史上种种行为形式的博物馆。不管是中原文化还是黄河文化,均是如此。源于共同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中原学学科建设与黄河文化研究具备了同频共振的时代契机。

中原学与黄河文化研究具有互为张力的基础。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骨骼与主体,也是中原学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从华夏民族演变到汉民族,进而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以黄河文化作为核心要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含着族群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的嬗变。黄河文明承载的内容基本上贯穿了华夏五千多年文明的始终,到今天依然体现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自古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族类观”,中国不同族群间的整合与融会是通过文化吸引和价值包容来实现的。中国之所以能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其核心就在于中国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顺应“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叙事,遵循了一种“民族构建国家”的文化致思逻辑。这种“民族-国家”的构建范式不仅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观的话语超越,也隐喻着中华民族多元族群内在的文化聚合性^[6]。而之所以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实现“美美与共”式中华民族的家国建构,就在于长时期形成的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为底蕴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家国一体、富民安邦、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思想文化因子的生发。黄河文化更像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具体的地理环境是黄河文化的物质存在,聚散式的网状结构是黄河文化的发展活力。

如果从文化样态方面考虑,黄河文化有很多的流域文化单元,而且每个文化单元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意义。不同文化单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中原文化的重要性确实是最为值得关注的。“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主干和集大成者。”^[7]与周边其他区域相比,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核心作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8]。中原地区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在制度层面形成了基本传统体制,构筑了周、秦、汉、唐等王朝的制度基础,后期的中国基本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并与当时的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规

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相互作用,从而演变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因此说,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体两面,互相依存。

中原学和黄河文化研究同频共振,共同发展的时代契机已经呈现。中原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是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等为研究对象,重在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征程的新起点。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脉河、幸福河的黄河将会进一步发挥出自身的价值,进一步激活中原文明,努力实现中原崛起、中部崛起、中国崛起^[9]。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黄河的相关指示精神,为谱写新时代中原学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10]。

目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为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对于学界而言,其意义在于鼓励专家、学者努力加强对于黄河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研究,进而从黄河文化中汲取营养,为当下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奏响出彩的河南乐章,需要继续扎根中原大地,讲好黄河故事,在建设高质量现代化河南的进程中凝聚力量。显然,通过聚焦黄河文化、在黄河文明的研究范畴中思考中原学的学科建设,最终“不断推动中原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4]。

五、结语

中原学致力于从不同学科各自的路径形成研究中原文化的合力,发掘中原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服务于中原大地的现实需求。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中原学学科发展需要与黄河文化研究进行结合,找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从地域空间、文化向度、方法路径等方面进行思考。要围绕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这条主线,一方面立足于中原学学科推进知识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立足于黄河文化研究提振民族精神。综合运用学术共同体培育工程、学科平台创建工程、体制机制建设工

程,完善中原学学科建设体系,推动黄河文化研究;瞄准黄河文化问题,增强中原学学科发展优势,最终实现二者同频共振、互融互惠。

注释:

- ①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2021年度调研课题“河南推动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SKL-2021-261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李庚香.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J].河南社会科学,2016(6):1-6,123.
- [2]丁素.推进中原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EB/OL](2017-01-20)[2021-11-01].<http://www.hnskl.org/zt/zyx/20210120/10910.html>.
- [3]王喜成.中原学研究应突出“四性”、构建四大体系[J].河南社会科学,2019(7):58-61.
- [4]李庚香.聚焦黄河文化黄河文明主题,持续提升中原学研究水平[N].河南日报,2020-03-27(09).
- [5]宋朝丽,汪振军.构建中原学基本理论体系探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9(11):9-15.
- [6]张九童,邹广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向度[N].光明日报,2021-07-14(11).
- [7]李庚香.准确把握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N].光明日报,2020-08-21(11).
- [8]陈隆文.中原研究与历史区域分析法[J].河南社会科学,2020(1):8-15.
- [9]李庚香.勇担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历史责任[N].治黄科技信息,2020-08-26.
- [10]李庚香.走进新时代的中原学:构建新时代中原学的历史使命和实践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2019(8):1-9.

作者简介:王明钦,男,教授,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建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岳鹏星,男,历史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河南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慈善史、文化史研究。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二程洛学与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第五次重构

◇ 李庚香

摘要: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二程以儒为宗,批判地汲取佛道中的哲理,以天理论为基础,以明义利为核心,以成圣成贤为追求,以正人心、修道德、格君心之非为方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二程洛学有别于宗教的外在超越,转而实现内在超越,找到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为宋代社会的道德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何解决公共性问题,是儒家人伦关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以公释仁”区分了“爱”与“公”的差异,揭示了公共价值理念,实现了从“仁爱”到“兼爱”的跨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 二程;天理说;以公释仁;思想重构

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王国维讲:“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同汉唐经学相比,宋明理学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宋明理学不同于经学的政治哲学,也不同于佛学的宗教哲学,而是一种人生哲学,具有以人本、内在超越的特质。宋明理学主要研究理事关系,可以说是“天人关系”这一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次变形,从而实现了思想重构和价值提升。

一、“天理”说的提出石破天惊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在其提到的25位思想大家中,宋明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名列其中,可见二程及其创立的理学

(洛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洛学作为中原文化价值提升的产物,既是中原文化的精粹,也是黄河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被称为理学双凤的二程,其所开创的洛学学派的主要思想,作为宋元明清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深刻影响着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远播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对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理”说的提出石破天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程“道接子舆”“学贯濂溪”,承接孔孟千载不传之学,从传统儒学理论体系中拈出“天理”二字作为立论之本,将其视为万事万物永恒的最高精神存在,建构了一个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一体、理一和分殊为一体、天理和人欲相统一的广大精微的思想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儒家的理论思维水平和理论阐释空间。冯友兰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2]。

在二程思想中,争议最大的是“天理”“人欲”的关系问题。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在儒家早期经典《礼记》中已有涉及,二程将其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予以新

的阐发,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这一命题常被误解为禁欲主义而遭诟病。实际上,二程强调对“人欲”的去除,不是像宗教一样要消灭人的所有欲望,而是强调儒家一以贯之的“克己复礼”精神。去欲存理,或存理遏欲,才是其本质所在。

二程以天理论为基础,以明义利为核心,以成圣成贤为追求,以正人心、修道德、格君心之非为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其核心和精髓要义在于:重义轻利,大公无私,不断追求成圣成贤、成己成物的境界。

(1)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将“人道”和“天道”结合起来,是对孔子“仁”的观念的演变与发展。二程廓然大公,把仁爱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对于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启发意义。我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廓然大公”中汲取营养,必须正确处理“天人关系”,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2)利不妨义的义利观。从存天理、节嗜欲出发,二程提出利不妨义的思想。程颐说:“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计较,但不至妨义耳。”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程颐说:“富,人之所欲也,苟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如义不可求,守贫贱以守其志也。非乐以贫贱,义不可去也。”

(3)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思想。公与私,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两种价值观,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核心命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面对公共事务,强调“公心”。“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理者天下之至公”,这种境界使宋代知识分子往往能够“以理抗势”,从廓然大公的思想出发,培养“不为一己之私所累”的大公境界。

(4)成德成圣的道德观。如何成德、成圣始终是二程关注的重要命题。程颢说:“‘德不孤,必有邻’,一德立而百善从之。”程颐说“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指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也就是说,做到了中、正、诚,就是圣人。程颢则更通俗地讲:“孝当孝,悌当悌,则圣矣。从洒扫应对上可观圣人气象。”

二程理学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一是以儒为宗,整合了佛道思想;二是正确处理体用关系,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原则。通过探讨

理事关系,理学家们突破了宗教话语而转向人生哲学话语,从而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个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它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二、宋学与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第五次重构

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先后经历了七次重构,宋学系第五次重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哲学都是围绕天人关系展开的。到了宋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为理(精神)气(物质)关系问题。围绕理气关系,宋学在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人性论、伦理论、认识论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展示出来,使宋代哲学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

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先秦是一个旋涡,宋明是一个旋涡,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宋代影响后世最深邃的即是理学。理学吸收道家与佛家的若干精义,用以阐发传统儒家的思想,使之更加充实完备。在这个意义上,宋学是以儒学为基础,援用道佛哲理融汇而成的一套新儒学。在宋明理学中,二程则是这个旋涡的中心。

宋学的代表性人物是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他们有研究理学的,有研究心学的,有研究气学的,或叫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邵雍被视为理学先驱,提出了“穷理尽性”的主张。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创者,用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和善恶等,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张载严格区分天、道、性、心等概念,开创了理学中的气学一派。包括二程在内,宋学的伦理思想一直有着比较强烈的德性论传统。关于理事关系,理学认为,理在事先亦在事中;心学认为,理在心中亦在事中;气学认为,理在事中事在理先。

(1)理学。在二程思想体系中,理有三层含义:一是天理,二是物理,三是伦理。在二程看来,物理和伦理都是天理的表现。程朱理学认为理在事先,只是从逻辑的角度而言;从事实的角度看,理在事中。所谓“性即理”,意味着理在事中。理在事中被表述为“理一分殊”,他们既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也承认世界的多样性。理一为何会分殊?在朱熹看来,天理必须借助气才能体现出来。“气异”才是“理一分殊”的原因所在。

(2)心学。理学和心学都认同天理,理学认为理在天上,心学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学一派由南宋陆

九渊发其端,明代王阳明集大成,统称陆王心学。他们提出“心”和“良知”概念,把本体和主体统一起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确表示本体的内在性。王阳明心学的理论核心是“知行合一”,对程朱理学的僵化起到了纠偏作用,并推动儒学从庙堂走向民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相对于儒家的压抑人性,心学则是解放人性的。

(3)气学。气学由张载发端,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大成。张载把道家的“太虚”引入,提出“太虚即气”。关于太虚与万物的关系,张载用气之散聚来解释,气聚而为万物,气散而为太虚。在王夫之看来,理和心都不是本体,气才是本体。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则是理,理乃是气的体现。他用“天下惟器”说取代了张载的“太虚即气”说,把理事关系转换为道器关系,强调事在理先,器在道先。气学一派没有把理论重心放在人生哲学方面,而是放在实践哲学方面,重视对现实生活的应对,从而把经世致用讲透了。

总之,理学家立足当下世界搭建精神世界、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找到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那就是有别于宗教的外在超越,转而实现内在超越。理学是立德树人、教人学做人之学。著名大师钱穆说:“理学者,所以学为人。”心学追求明明白白做人,气学追求踏踏实实做人,理学追求堂堂正正做人^[3]。传统儒家重视成人与成贤、成圣的追求,重义轻利、大公无私,为道义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以二程为代表的宋学,着眼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宋代社会的道德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二程“以公释仁”的新时代价值

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人利物之谓仁”。“仁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仁”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则把“仁”推加于万物,并融入“爱”的概念,形成爱亲、爱民、爱万物三个层次。与之同时代的庄子进一步凝练为“爱人利物之谓仁”。在孟子和庄子思想的基础上,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见解,将仁爱之心升华为万物之爱。

二程对“以爱释仁”的传统进行了纠偏,主张“惟公为仁”,在仁学解释传统上实现了重大转变。孔孟仁学的出发点是“亲亲之仁”,其所追求的是一种由“自爱”到“爱人”的延伸与扩展。在二程看来,仁的

境界就是大公无私。公而近仁的过程,就是克灭私意、天理流行的过程。

“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是最高的价值本体,但面临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爱”和道家的“无情”的挑战。儒家的“修己”从来就是为了“安人”,其血缘之爱和普遍之爱的关系构成一个重大关节。这种“普遍之爱”,不同于墨家的“兼爱”,也有别于佛家的“慈爱”,更有别于近代西方的“博爱”。如何解决公共性问题,是儒家人伦关怀面临的重大、最突出的问题。从“血缘伦理”到“公共伦理”的过渡,是儒学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关键所在。“以公释仁”实现了从“仁爱”到“兼爱”的跨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天理的本质是公。先秦时期,人们认为上天是主宰人命运的神。汉代董仲舒从天人感应认识论出发,仍认为天是主宰人们命运的神祇。北宋时期,程颐认为“天者理也”,这是认识论的一次飞跃,开辟了人们认识自然的新路径。

其次,仁爱的前提是公心。程颐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著名命题,由爱人到爱天地万物,由爱一人一家到爱天下众生的“博施济众”,从而进入圣人的思想境界,比孔子的“仁者爱人”进了一步。解决了“仁是什么”的问题后,还要解决“如何行仁”的问题。程颐正是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以独特的视角从“仁”中提炼出了“公”,教人思量内外、物我之间的“一体”关系,开辟了“以公释仁”的新路径。

再次,“以公释仁”的核心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二程的义利观是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传承与发展,在继承孔孟先义后利基本精髓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义与利的实质是公与私的关系,并提出利不妨义的基本道义理想,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道德修养原则。在二程看来,为私还是为公,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境界、道德水平乃至对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

最后,治国理政的核心是大公无私。二程对公私关系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人的道德修养层面,而是深入到了政治领域,明确提出执政者的公心与私心是决定国家兴盛衰败的关键。程颐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公心是一心为国家、民众服务的大公之心,是一切从事公共服务工作者的基本政治品格,这是由公共事务岗位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公心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公共

事务动机”。

推动二程理学在新时代发扬光大,需要我们格外重视做重德、守德、修德之人。当我们的民族能够知仁、行仁、存仁时,公民的个性将会变得活泼开朗、果敢勇毅,我们的民族将会变得更加蓬勃向上、富有创造力。

四、叫响“山东有孔孟,河南有二程”的黄河文化大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河洛文化在中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地位重要而特殊,对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形成贡献非同一般,是“中华源”“黄河魂”“天地中”“大摇篮”。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山东有孔孟,河南有二程”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二程思想是在对孔孟儒学创造性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的结果。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仁者无敌。儒家文化中的优秀、精华、经典成分,为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

叫响“山东有孔孟,河南有二程”口号,对于打造河南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改变过去河南文化“满天星”而无一轮明月的现象,聚焦形成河南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我们要牢牢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深刻论述为指导,深入挖掘二程理学蕴含的时代价值。

(1)打造二程思想的研究重镇。要搭建二程思想研究平台,深入开展二程理学思想理论研究。成立中国(河南)二程思想研究中心,吸引凝聚国内外、省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多领域、跨学科研究。联合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研究力量,创立宋明理学(洛学)国际论坛或研究联盟。依托省内外全媒体平台,宣传推介二程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扩大二程思想研究的学术影响力、成果转化率和社

会知名度,形成新时代二程思想研究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2)打造二程思想的践行重镇。要把二程思想研究自觉放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中来,放到构建有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来,放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来,守大德,严公德,重私德,以明德引领社会。要加强官德建设,以此淬炼党员干部的党性,加强公共事务动机研究。

(3)打造二程思想的活化重镇。嵩县地处黄河重要支流伊河中游,文化积淀极为厚重。要立足“二程故里”的独特地位,创复二程书院,研发二程研学体验项目,修缮保护二程祠等文化遗址,打造二程特色文旅小镇。要讲好新时代“程门立雪”“如坐春风”的故事,充分借助新技术手段,积极开展二程思想普及推广,推动二程思想研究成果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使之更好地走近社会公众、放大“溢出效应”,促进二程思想的传播践行。

二程“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体现了高远的人生境界,为我们打开了成圣成贤之门。我们要进一步讲好黄河文化中的二程故事,打造“山东有孔孟,河南有二程”文化旅游品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谱写出彩的河南篇章做出贡献,努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迈进!

参考文献:

-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77.
- [2]辛冠洁,丁建生,蒙登进.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2:271.
- [3]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447.

作者简介:李庚香(1966—),男,河南淮阳人,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主要从事黄河文化、中原学研究。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二程理学是中原学研究绕不开的“高峰”

◇ 李庚香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向新的征程,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一是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七一”讲话之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两个大的研究方向:一是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里会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二程是宋明理学、程朱理学中的核心人物。那么,二程理学作为中华民族思想第五次重构的结晶,我们怎么与之相结合,来推进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百年新

征程中如何构建有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构筑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换句话说,宋明理学影响了中华民族近千年,它好在哪儿?问题出在哪儿?今天我们如何从这个起点上再出发?如何重构精神家园?如何建设“中国价值”?这对于中原学研究来说,是极为关键的。

一、二程理学在中原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思想精髓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研究中原学,就是要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炎黄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二程理学作为中原学研究的高原和高峰,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更要看到它在中华民族第五次思想重构中的巨大价值。

我们认为,对二程理学的认识要从历史的长轴上来定位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主流主线、主体本质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第一个研究领域是“天人之际”;魏晋玄学研究的是“体用关系”,名教是用,道教是体,这是“天人之际”的一个变体;到了宋代,援佛入儒、援道入儒,

变成了“理事关系”。通过探讨理事关系,理学家们突破了宗教话语进而转向人生哲学话语,从而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个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二程理学成功将儒释道合流,从而实现了治世、治身、治心相统一,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做到了“心安理得”,做到了“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达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样一种极高的思想境界。所以它是我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正确处理理气、心性的关系,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关键所在。由此,我们看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就能够用马克思的物质与存在、思维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一个思想框架来理解。

二程理学有很多思想精华,对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以公释仁。从理性到公共性,是现代化的重大价值转型,如何解决公共性问题,是儒家人伦关怀面临的、最大、最突出的问题。从“血缘伦理”到“公共伦理”的过渡,是儒学实现现代性转化的关键所在。“以公释仁”实现了从“仁爱”到“兼爱”的跨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公释仁”的核心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在二程看来,为私还是为公,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境界、道德水平乃至对事物认识是否准确的根本标准。二程对公私关系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人的道德修养层面,而是深入到了政治领域,明确提出执政者的公心与私心是决定国家兴盛衰败的关键。“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公心是一心为国家、民众服务的大公之心,是一切从事公共服务工作者的基本政治品格,这是由公共事务岗位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公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共服务动机”。“以公释仁”不仅区分了“爱”与“公”之间的差异,更难能可贵的是揭示了公共价值理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都是“以公释仁”的新时代表达,体现出来的是“天下”、“四海”的广阔胸怀。(2)王道与霸道。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总体上走的是“仁政”“王道”的路子,而非霸道。为什么不选霸道?因为秦始

皇施行的“霸道”给了我们民族深刻的教训。西周时期,我们施行的是礼乐文明,东周秦汉唐时期,是礼法文明。秦国在诸子百家中最终选择了法家,实现了富国强兵、统一六国。汉朝在分析总结秦朝两世而亡的原因后选择的是道家休养生息的方法,后来采取了儒学的积极进取、积极作为。宋朝认为唐朝灭亡的原因是立国出了问题,三纲乱了,李世民弑兄夺得帝位,虽然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开头没有开好;后来由于武力强盛,唐朝末期还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宋代借鉴唐代的教训,把三纲放到了第一位,“崇文抑武”,重视道德,“存天理、灭人欲”,最后又出了问题。每一个朝代都在汲取前车之鉴,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矫枉过正。我们再来看西方,特别是美国,过去200多年,美国走的是富国强兵、大国崛起的道路,也就是“霸道”的路子,走到今天,从霸权变成了霸凌。“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于:“王道”是以理服人,用道理来说服人;“霸道”是“以力服人”,以武力威胁来让人服从。王道与霸道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构成了学理背景,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向。(3)知行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接点就在知行关系上。中华民族讲究实践,讲究知行合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在于:西方哲学要么是唯理论,要么是经验论,讲的是如何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加起来,就是我们说的知行合一。但我们讲的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的知行合一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知”不仅是德性之知,还包括见闻之知,特别是科学,三大规律等,“行”是建立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我们的“知”是道德践履,道德上认同就去践“行”。这是二者的区别,但总体上都属于实践论。因此,二程理学的知行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具有融通性。

具体来说,我认为其中有五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二程理学用“理一分殊”解决了思想体系中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使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呈现出完整的面貌。二程理学在哲学认识高度上所提

出的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在二程思想体系中,理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天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百理具备”。佛、道,一个“空”一个“无”,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二程的本体论理念是“理”,则是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无常”,而二程认为,这个常就是“理”。二是伦理。三是物理。在二程看来,物理、伦理都是天理的表现。既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也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这样就把理与物理、伦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讲清了。“理一分殊”,“理一”是统一的,道理就是一个,而它的形态各种各样,世间万物分属这同一个“理”。这样,二程就建构起了自己的“理”本论,与张载的气本论、王阳明的心本论相辅相成,体现出“道”、“德”、“理”的时代转化。

第二,二程理学的最大意义在于掂量出“天理”二字。5000年来中华文化主要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而二程理学研究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后边的“理”。二程的“天理”是针对道教的“玄理”、佛教的“佛理”而提出的一个“实理”。我们做事都要有一个“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个“理”,就是事后边的理、事后边的道。二程理学针对佛老肆虐、纲常废弛的现实,萃取“天理”二字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大本,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理论的进一步提升。佛理就是佛性,佛教主张世界是“空”的;玄理对应道教,道家强调世界是“无”的。儒家解决的是现实生活中“有”这个问题。从“理”上升到“天理”,以此出发,把“无”“有”“空”讲透了,从而实现了儒道佛“治世”“治身”“治心”的有机统一。这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意义重大。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该如此”“理所当然”“天理难容”,均是受理学的影响。中华民族依靠这一套理论,做什么都很从容,这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炎黄文化、中国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独树一帜,之所以屹立不倒的一个关键原因。所以我们认为“天理”说的提出意义重大。

第三,二程理学最核心的精义在于“以公释仁”。“仁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之间有了爱,才能凝聚,才能形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跟“仁”有很大关系。孔子仁学“以爱释仁”,出发点是“亲亲之仁”,追求的是一种由“自爱”到“爱人”的延伸与扩展。到了二程理学,提出“以生释仁”“以觉释仁”“以公释仁”等观点,对“以爱释仁”的传统进行了纠偏。特别是“以公释仁”,主张“惟公为仁”,在仁学解释传统上实现了重大转变。事实上,儒家的“仁爱”是一种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有远近亲疏之别。这样,与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爱”、基督教的“博爱”相比,它虽然富有解释力,但胸怀不够博大。在二程看来,仁的境界就是大公无私。公而近仁的过程,就是克灭私意、天理流行的过程。人有了公心,就能爱人,就能爱其他的一切,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这样人生的境界就打开了,从而对于解决公共性问题、社会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与西方的个体本位不同,中国文化是共同体本位。当然,这个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伦理共同体,也是社会共同体。西方从“个体本位”出发,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定义为经济人。中华民族讲究“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并立,讲天地人“三才”。这与西方的“经济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在“共同体”视角中,大禹治水的“公共服务动机”至关重要。

第四,二程理学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条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道家、佛家是出世的,讲究静心、修道,遁世、出家,修仙、成佛,追求外在超越,强调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对立,实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而儒家是入世的,理学家们取消了彼岸世界,重申了“一个世界”的原则,强调要在事上磨,要在心上练,强调磨炼心性、大义担当,追求的是内在超越。这种内在超越不同于外在超越,体现的是平凡中的伟大、入尘与出尘的统一。二程理学以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为宗旨,通过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将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内求于己、外化于行,把人们从佛教的性空和道教修仙长生等不切实际的思想愚昧中拉回现实社会。在他们的努力下,哲学的势头压过了佛、道二教。他们把内在超越的哲学精神讲透了,推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了最高峰。宋代以后,“以理学代宗教”成为现实,中国没有成为宗教国家,宋明

理学功不可没。

第五,二程理学得以广泛传播在于实现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化。二程理学着眼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对宋代社会的道德重建、思想重构,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传统儒家讲道德都是针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由于佛、道的兴起,孔孟所开创的儒学中断了1500余年。二程理学不仅以儒为宗,整合了佛、道思想,更重要的是正确处理体用关系,完成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型,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原则,从而使其思想体系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法治型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如果说道德文化是属于精英的,那么伦理文化则是属于大众的。伦理关系、人际关系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是道德,这是我们为人处世最高的行为原则。包括二程在内,宋学的伦理思想一直有着比较强烈的德性论传统,这是我国社会比较重视亲情、重视个体德性的重要理论前提。正是二程从“道德”到“伦理”的开创性转化,使理成为从普通民众到士大夫和帝王都公认的道德原则,这是非常厉害的。就解决现实问题的深度而言,就“明体达用”而言,二程理学实现了儒家伦理纲常进入寻常百姓家的问题,其广泛性、深刻性是无可取代的。

以上几个方面,标志着二程理学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对二程理学发展嬗变的透视与审思

二程理学对中华民族影响如此之大,它好在哪儿?后来逐渐走向衰落,问题又出在哪儿?弄清了这些,我们才能继往开来再出发。

第一,二程理学的精神高度镜鉴。二程理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彰显出强烈的立统精神、汇通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精神世界、精神家园中是一个精神高地。(1)立统精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佛教的传入使传统儒学受到严重冲击,此时意识形态领域亟需一个能够抗击佛道的正统思想。二程学术构建及政治活动的一切努力,无外乎

重构儒学的主体地位。在二程及其弟子后生的接续努力下,宋代儒学开创了新局面,特别是元代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得以确立,使其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在士大夫中广泛传播开来,进而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虽然是朱子学主导了两宋以来七百多年的学界,但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二程理学在主导着学界。(2)汇通精神。在与佛、道对抗的过程中,二程援佛入儒、援道入儒,融汇了佛道精髓,从佛、道思想体系中吸收有利于其发展的方面,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受佛禅影响,二程的精神世界(人格精神、人生境界、治学风气、学术思想)体现出趋于理性化、注重自觉性以及追求宏大境界等特征。二程理学自创立之初,就吸纳了佛家包括华严宗的法界说、禅宗的佛性、本性等概念及道家的“无欲说”在内的佛老不少思想方法,运用儒家的伦理纲常和辩证法思想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改造,从而建构了一个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一体、理一和分殊为一体、天理和人欲相统一的广大精微的思想体系。在理论创立过程中,又不断地与张载的关学、司马光的涑水之学、王安石的新学、三苏的蜀学进行积极讨论,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在传播过程中,二程理学又经由后学的传衍与改造,充分吸收朱子学、陆王心学、明清实学等方面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二程理学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与其开放包容的兼容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对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3)创新精神。二程理学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二程的创新思维上。二程主张做学问要独立思考,摆脱陈说。基于这样的坚持,他们创造性地发现了“理”这个重要理论范式,并以此构建起完备的哲学体系。程颢曾强调:“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的学术创新也是针对时弊而发的,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第一个时弊即沉溺于八股文,应试教育的一个弊端是易引人误入歧途;第二个时弊是咬文嚼字的训诂之学,严重束缚时人的思想;第三个时弊是缺乏文化自信,受佛道影响,容易迷失自我。这种对于时代困境的觉醒仍为我们现世所

受用。

第二,二程理学影响何以如此深远?二程理学产生、形成于洛阳,但影响范围遍及大江南北。二程理学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不仅在于其天人合一思想、理性主义世界观、诚敬为本的修身处世之道、至公无私的执政理念等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二程的阐发和传授,经过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传播与发展,生生不息,从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程颢、程颐不仅是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当时追随他们求学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收徒讲学,弟子众多,二程理学得以发展与传播主要是靠这些弟子及再传弟子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二程理学开枝散叶,形成了诸多地方流派。从地域上来讲,大致分为三个方向:南方、西北和中原。(1)二程理学在南方的发展。南宋建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南移杭州,二程理学的传播发展也随之南移。经过二程弟子们的不懈努力,二程理学在南方形成了五大地方学派:福建闽学、湖湘学派、江西陆学、浙江永嘉学派、四川涪陵学派。福建闽学由二程的两大著名弟子杨时、游酢首创。杨时、游酢都是福建人,“二程四大弟子”中的两位,跟随二程学有所成后,他们把二程理学带回了家乡,经过罗从彦、李侗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了朱熹,对二程理学做了一次系统总结和阐发,从而形成了一套闽学思想体系,也就是后世所称的“程朱理学”。湖湘学派的创始人是杨时的弟子、二程理学家胡安国,编有《春秋传》《二程文集》,这是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石。胡安国的儿子胡宏曾拜杨时和侯仲良为师。胡宏在南岳衡山文定书院讲学二十余年,门生众多,其中张栻最为出名,湖湘学派就是被张栻传播开的,并对江西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江西陆学是由陆九渊创立的心学,陆九渊虽然与二程理学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以程颢的“心本论”为主要思想源头。程门四大弟子之一谢良佐承继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以生论心,对程颢的心学进行了创新。后来经王蒲、张九成等人的延续,传到陆九渊。在陆九渊这里心学得到升华,形成了江西陆学思想体系。浙江永嘉学派发端于北

宋,兴盛于南宋。北宋中期浙江温州的周行己等“元丰太学九先生”接受二程理学,并成为程颢、程颐的弟子,对永嘉学派影响很大。南宋建立后,周行己的私塾弟子郑伯熊接续了对二程理学的发展,经过再传弟子薛季宣、叶适、陈亮等的传承,永嘉学派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四川涪陵学派与二程理学最直接的关系是程颐被贬涪州。涪陵的谯定师从程颐学《易》,得到二程理学的精髓,创立涪陵学派。(2)二程理学在西北的发展。由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吕大临所开启。关学与二程理学本是并列的理学学派,但正如闽学有二程理学传承一样,张载去世后,关学也受到了二程理学的渗透和影响。吕大临拜二程为师学习吸收二程理学后,二程理学的一些思想在关学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如吕大临的心性论就是在关学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二程理学。(3)二程理学在中原的发展。南宋建立后,大批二程理学家南迁,二程理学在北方逐渐萧条,但二程理学在中原的传播余绪未断,而是以一种较为特殊的家传方式得以传承,到金末逐渐“复盛”。元朝入主中原后,二程理学重回北方。元代大儒、二程理学传人许衡不仅多次向元世祖推荐“汉法”,还利用职务之便,将二程理学贯穿于教育之中,使“四书”“五经”成为国家科考的教材。他与姚枢、窦默等二程理学传人相聚今河南辉县的苏门山,开办学堂,讲学授徒,研习二程理学,在苏门形成一个学术中心。特别是明朝政权建立后,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二程理学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

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学派,二程理学之所以能够得到传承与发展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奠基者,其突出优势在于:一是其思想的创发性和超越性;二是代代传承,尤其是朱子这样的集大成者,将二程理学发扬光大;三是士大夫政治推动;四是通俗化、平民化,渗入百姓日常修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二程理学得以在学派林立中脱颖而出,重新构建起儒家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再度兴盛了700余年。这对我们今天传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价值观念只有深入人心,才能很好地指导思想和实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凝聚团结奋进力量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二程理学的广泛传播,对于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第三,对二程理学的批判性思考。二程理学后来走向衰落,我认为,问题至少出在三个方面。(1)“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二程思想中争议最大的一点。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实质就是义利关系、公私关系,或者说价值观与人性的关系。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论题。天理与人欲讨论的核心是人的道德本性与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二程“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很大的负面性。“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儒家一以贯之的“克己复礼”精神,主张去欲存理,或存理遏欲,这在道德层面上是有价值的,但在经济层面上则是违反规律的。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讲,叫作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二者同源同流、水乳交融,而非水火不相容。供给和需求是人类活动的两个最根本的原点,二者的关系是通过社会主要矛盾来表达的。过去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物质文化需要都是人的正常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得到合理的满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其中有很多需求过去并不是很紧迫的问题,比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的需求等,现在人民群众要求高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工作水平也要相应提高,这是需求状况;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产品供给难以满足高端消费需求,这是供给状况。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新局,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推动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三纲五常。五常,仁义礼智信,是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这个没有问题。二程理学的问题出在三纲,因为三纲的前提是不平等。(3)“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观点虽然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砥砺人格、激发民族气节的作用,但后来遭人广泛诟病,被认为是“以理杀人。”

三、二程理学对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价值和启发意义

新时代我们要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建构?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结合起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制胜密码。

第一,坚持价值观自信,弘扬中国价值。在理想信念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一个“行、能、好”的问题。在精神家园建设中,“如何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也有一个“举、立、建”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二程理学是一种价值观。历史上,印度佛教传入,对中华民族心理构成巨大挑战。二程理学的最大意义在于,面对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冲击和挑战,我们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和蜕变。在当时佛教传入、道教兴盛的历史背景下,二程浑然起立、积极迎战,批判吸收佛家、道家思想,革新完善儒学理论体系,完成了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一次伟大重构,使儒学得以浴火重生。在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的接续努力下,重新夺回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宝座,并在元、明、清三代独领风骚,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引领力。这是一种强大的价值观自信。就如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批判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成果中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可以把西方的科技、市场经济拿过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吸收借鉴外来精华,同时又不失根本,对其进行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我们就实现了自我超越和提升,这也是一种价值观自信。

第二,构筑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需要构建有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精神文明、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理学是道德哲学,是教人学做人之学。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很多时代困境。应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对精神家园、精神世界、心灵世界、精神生活的追求。新时代我们面临四大难题:创新性、精神性、生态性、公共性。这四个方面,二程理学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是创新性。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怎么研究创新文化、先进文化、现代文化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原文化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不仅要研究老家河南,还要研究出彩河南。没有创新文化、现代文化、先进文化,光靠我们的炎黄文化、黄河文化、中原文化是不行的。所以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构筑我们中华民族新时代的精神家园。这就要求我们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创新。二是精神性。二程理学立足当下世界搭建精神世界、意义世界、价值世界,在当下世界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地,找到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那就是对人格“境界”的追求,对“成圣成贤”的追求,对“内圣外王”的追求。这种内在超越的精神生活方式,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意义重大。三是公共性。传统文化没有解决公共性问题,儒家的“仁”“仁者爱人”,费孝通说是一种等级、一种差序格局,靠亲情来维系,越亲的聚得越紧,越往外越远,没有解决墨家“兼爱”的问题。佛教有慈爱,基督教有博爱,传统儒家没有解决感情往更大范围扩展的问题。但是二程理学“以公释仁”就有了一个大的改变,一下就把视野空间给扩大了。这对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研究意义重大。四是生态性。儒家所讲的“与物同体”“天人无二”以及“天人合一”说,认为天人本来就是一体的。其中所包含的生态理念与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是高度契合的。从这几个角度来说,二程理学对于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创新性、精神性、公共性、生态性四大难题,都是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三,弘扬共同体精神,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程理学主张“民胞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强调“天”“理”的整体性,从价值观上坚持了儒家社会本位的共同体精神体现出“天下”“四海”“万物”的广阔胸怀。这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吻合。在文化认同上,我们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我们不仅要懂得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欣赏别人创造的美,要学习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借鉴,这样才能实现多元文化的共荣共生。二程吸收佛、道合理成分以构建自身学术体系的探索和努力,也为今天我们面对不同思想文化如何选择指明了路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渗透,同样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文化选择态度。“和而不同”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最佳相处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深刻读懂“共同体”的真义,从二程理学中涵养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在深刻把握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引领人类发展大潮流。

作者简介:李庚香,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郑州大学中原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摘自《人生与伴侣》2021年第9期)

思想文化是黄河文化之魂

◇ 汪振军

摘要:在整个黄河流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无疑处于核心地位,而在中原文化的各种文化中,思想文化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可以说,思想文化是黄河文化之魂。二程思想是河洛文化的结晶,是前代儒学的发展,是后世儒学的开端,是儒道释文化的融合。今天继承弘扬二程思想,既要看到它为中国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又要认识它的历史局限性。我们需要以辩证的眼光,重新发现二程思想的当代价值,即天人一体的生态理念、穷理探源的科学精神、浩然之气的人格修养、至公无私的人生境界,认真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二程思想;历史贡献;辩证审视;当代价值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它影响和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取向和审美取向,是中华文明的母体,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石。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承上启下,承东启西,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中原文化在整个黄河区域文化中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中心地位,自古以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中原文化的核心,就是河洛文化。

从文化类型来说,黄河文化包括了自然文化、生态文化、人居文化、古都文化、手工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武术文化、姓氏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等,而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则是思想文化,可以说,思想文化是黄河文化之魂,它支配着、影响着、渗透于其他文化之中。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核心文化儒、道、释均发源于河南,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墨子都是河南人,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

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正是从黄河文化的视角,我们从历史与当下出发,重新发现二程思想的新价值。

一、二程思想的历史价值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的儒家学说经历了孔孟的原始儒家阶段、汉儒董仲舒阶段、宋代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阶段。“洛学作为北宋庆历学统四起之后兴起的理学流派,在经过弟子后学的代代传承、建构之后,逐渐由学术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并在元、明、清三代独领风骚近千年,从社会风俗到政治舞台,无不深受其影响。”^[1]南宋学者黄震说:“本朝之治,永追唐虞,以理学为根底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2]当代哲学家陈来先生进一步指出:“洛阳是宋明理学的‘千年祖庭’。北宋时代,以二程先生为中心的洛学是道学的真正建立者,没有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影响就建立不起来;没有二程,朱熹的出现也就不可能。一句话,没有二程,也就没有两宋的道学。”^[3]

二程儒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

四个特点。

二程思想是河洛文化的结晶。《易经·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河洛地区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黄河流域的河洛大地养育了二程，使他们的思想生于斯、长于斯、发于斯，可以说没有河洛汇流、没有河图洛书、没有《周易》、没有孔子入周问礼、没有两汉儒学、没有魏晋玄学、没有洛阳千年的文化积淀、没有黄河文化的丰富滋养，就不可能产生二程理学。如果说山东的儒家思想文化以孔孟为代表，那么，河南的儒家思想文化则以二程为代表。

二程思想是前代儒学的发展。二程思想虽产生于河洛，但根源则是孔孟，又在孔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孔子的思想主要是一种人性养成之学，孟子的思想是一种民本政治之学，董仲舒的思想是帝王统治之学，他们都停留在现实的政治层面和伦理层面，而未到形而上层面。到了二程理学，儒学则上升到宇宙层面、事理层面、物理层面，这种学说已经有了深厚的形而上的色彩。二程提出的“理”，很大一部分来自道家之“道”和《易传》之“道”。道家之“道”讲“一”，《易传》之“道”讲“多”，二程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只有一个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天人一体”的论断。所以，二程讲的“理”，就包括了天理、性理、物理、义理，真正实现了对前代儒学的超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李泽厚认为，从历史上看，关洛同时而并称，但从理论逻辑上看，和张载比，二程不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张载的基础上把宋明理学的基础略事摆正而已^[4]。

二程儒学是后世儒学的发端。二程思想不仅继承了孔孟思想、两汉儒学以及唐代的韩愈思想，同时代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而且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直接影响，甚至对陆九渊、王阳明

也有很大影响。可以说，二程是中国儒学向后世发展的桥梁、中介，是以后儒学中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的开端”，没有二程，就没有程朱理学，也没有陆王心学。二程的思想兼具理学与心学。它以天理为基础，以正人心、修道德、明义理为核心，形成天人一体、以理统心、以理节情、理归于心中正诚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后来朱熹提出的“月印万川”“理一分殊”“天命之理”“主敬持一”，陆九渊提出的“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以及王阳明提出的“道心人心不为二，天理人欲不并立”“知行合一”“致良知”都与二程思想有密切关系。

二程思想是儒道释文化的融合。二程思想是在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思想，正如黄河文明，包容了多种文化、多区域文化形成多元一体、一体多样的文化格局。二程思想不仅吸纳了儒家思想、《周易》的思想，而且还吸纳了道家的思想及佛教的思想。儒家的“仁”，道家的“道”，佛教的“心”，三家思想圆融无间，为我所用，最后自成一体，显示了二程思想的开放、包容、阔大、无界的气象。

二、如何看待二程理学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作为宋代儒学的四大流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作为对传统儒学的新阐释、再发展，主要目的在于建构一套符合时代现实的新理论、新话语。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天理论、格物论、人性论、理欲论、圣人论。这“五论”构建了一套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宋明理学发现的基础。二程理学的核心是“天理”，“天理”是统摄，是中心，而“人心”是内核，是本质。“天理”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天理”。正是以“天理”作为形而上的基础，才派生出道理、性理、物理、事理。由一统多，由多归一，这种思想正符合当时“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现实。“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必定脱离

不了当时所处的时代,若说思想是果实,那么所处的时代就是孕育发芽结果的土壤。社会发展形成的‘时代课题’是促使理学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5]自魏晋之后,儒学衰落,虽有韩愈等人倡导儒学,但并未真正大兴,宋代国力增强,局势稳定,国家亟待确立文化支柱,儒学由此勃兴,成为显学。二程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引人注目,影响巨大。

从辩证的角度看,任何理论都有它的两面性,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二程的思想遗产,就会发现,它在当时为社会做出巨大思想贡献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理论基础。宋明理学的根本目的是以伦理学为旨归,来证实封建伦理和封建秩序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理”就是“礼”的代名词或同一语。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之所以以儒家为主流,就在于儒家思想强调血缘关系、宗法社会、等级秩序、家国同构,这与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思想上的“大一统”以及中央集权、一个中心不谋而合。而且,这种“大一统”被宋明理学论证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更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增强了它的说服力。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后,特别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成为官方哲学或御用哲学,成为统治人们思想的强有力的工具。对此,思想家李贽、戴震有过深刻批判。李贽在《焚书·四勿说》中对“礼”进行了阐释:“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盖由中而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降者谓之礼,从人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也就是说,理学家的“礼”,所谓“男女有别、上下有等、尊卑有序”,是专门用来治人的,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用“假言”“假行”“假心”宣扬“礼”的那些人,平时并不守“礼”,却用严刑峻法来强制百姓守“礼”。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

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在《与某书》中又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淫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特别是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毁掉了多少妇女的青春与生命。宋明理学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否定和压抑了正常的人性需求与情感需求,走向极端,成为典型的禁欲主义。宋明理学被统治阶级所用,所造成的现实恶果和社会悲剧是有目共睹的。只要看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祥林嫂》,就可明白。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看到了封建礼教的弊端,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猛烈批判,赢得了人们的拥护和喜爱,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大趋势。

从当下的语境看,在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二程理学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历经近千年,应如何批判地继承这笔遗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二程理学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毕竟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做出过巨大贡献。比如讲秩序、顾大局、重气节、讲修养、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情怀等,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还要继承发扬。张载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理想还要传承下去。

三、二程理学的当代价值

近100年来,特别是“五四”之后,我们对于儒家文化,包括二程理学曾经有过激烈的批判与否定。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地域化、文化一体化与文化多样化、市场经济利益至上与社会发展诚信公平等矛盾,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如何批判地继承,如何在否定之中有肯定,如何辩证看待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成了人们正在面对和思考

的问题。弘扬二程思想,就是要与弘扬黄河文化相结合,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与创造性转化相结合,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相结合。

(一)天人一体的生态思想

《易传》中有“天地大德曰生”,这个“生”,一般人理解为“产生”,即生生不息,而程颢认为这个“生”应该理解为“生命”。“生生之谓易”,也就是生命产生、发展、变化的道理。“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道,生生不已即是宇宙之根本原理。易即天之道,生即天之道。”^[6]张载提出“气”是宇宙的本体,气贯穿一切事物之中,人的生命也是气的表现。程颢特别赞同张载的思想,认为与万物合一,就是“仁”。程颢在《识仁篇》中提出:“学者先识仁,仁者浑然与万物一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这里的“仁”就是个体对生命的感知、直觉、发现,同时,要求仁者必须对于生命具有“诚敬”之心。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树立保护自然、敬畏自然的态度,认识“万物一体”。人与自然就是命运共同体,共生共处,亲密无间,爱护一草一木、一河一山,从心底树立环保意识,增强环保意识,才能真正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只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保护。

(二)穷理探源的科学精神

《易传》有言:“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道是无形的,器是有形的。道是看不见的,器是看得见的。张载认为,万事万物不过是“气”的显现;而程朱认为,“我们所看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所聚时遵循叶之理。”^[7]二程在前人的基础上发现了“理”是世界的根源,一物有一物之理,所以要“穷理探源”“穷致其理”,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哲学本体论。天理,即自然变化的法则;性理,即人心善恶变化的法则;物理,即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则;义理,即社会和人生变化的法则。“天”-“命”-

“性”-“心”统统由“理”贯穿起来,“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所以,新儒学又叫“理学”。今天,我们依然要弘扬“穷理探源”“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培养理性主义的态度,尊重事实、追根溯源、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规律、发现规律、遵循规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普遍规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浩然之气的人格修养

《孟子·公孙丑上》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孟子认为,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诱惑、威胁,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二程继承了儒家的传统,特别强调个人的人格修养。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除了对于“道”的探寻,还有对于“心”的涵养。程颢说:“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以直道顺理而养,则充塞于天地之间。”^[8]浩然之气强调的是人的正气,是“大”,是“刚”,是“直”,也是程颐强调的“至大”“至刚”“以直”。浩然之气是《周易》说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文天祥《正气歌》中写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这是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精神传统。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的浩然正气则是体现在不为金钱所诱惑,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权力所诱惑。二程的“浩然正气”思想对于加强人格修养、树立人生信仰、坚定理想信念、端正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至公无私的人生境界

庄子《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无己”就是无我。程颢的《定性书》提出“廓然大公”,强调无私。这是二程天理至公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二程理学的核心价值之一。程颢说“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天理至公,一入于

私,皆非礼。”程颐也说:“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8]77}公与私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体现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公而忘私是大境界,一心为我是小境界。程颐说:“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钟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江河之量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惟天地之量者,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8]108}“斗筭之量”就是小境界,“天地之量”就是大境界。程颐说“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这是最高思想境界的人,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的人。凡有大境界者皆能从容。程颐有诗《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8]482}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知天命、乐大道的通达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功利化的社会中,人们不仅需要有一种抛弃私利的奉献精神,更需要有一种站在天地万物立场的大境界和大格局。大境界造就大胸怀,大格局成就大作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就是不计得失、不谋私利,鞠躬尽瘁、无私奉献,就是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我”,是“无私”;“无我”,是“无畏”;“无我”,是“无愧”。“无我”是“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无我”不是没有自我,而是成为“大我”,个人价值只有融入人民需要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发扬“至大无我”的精神,每个人的人生将空明而洁净,古老的中国定会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蓬勃的生机。

总之,我们今天研究黄河文化与二程理学思想,就是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既需要“照着讲”,也需要“接着讲”,既要学习体会二程思想的原义,也要将二程思想与当下现实相结合,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与人

们的信仰价值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

(注:本文为2020年9月“黄河文化与二程理学研讨会”论文)

参考文献:

- [1]李敬峰.二程洛学的传承、分化与走向[J].中州学刊,2019(11):108-112.
- [2]黄震.跋尹和靖家传[M]//黄氏日钞:卷九十一.元后至元三年刻本.5972.
- [3]陈来.二程与宋代道学的文化意义[EB/OL]. [2020-05-02].<http://www.rmzxb.com.cn/c/2017-04-10/1470013.shtml?n2m=1>.
- [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J].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227.
- [5]任婷.二程洛学构建话语体系的历史经验研究[J].新西部,2020(6):98-99.
- [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7:104.
-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16.
- [8]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渔,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作者简介:汪振军(1963—),男,河南灵宝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级教授,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原文化传播。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二程家风文化的易学探源

◇王 璋

摘要:二程家风文化继承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主要体现在家国情怀、立德为要、书香常绕、尊老爱幼、谦卑待人、尽责有序诸方面。这些方面均可在易学中寻得源头。二程也是易学传承发展的大家,弘扬二程家风文化必须寻根溯源,学习易学中的主要齐家精髓,以便更好地把握要义、加深理解、继承发扬。

关键词:程颢;程颐;家风;《程氏易传》

注重修身齐家、注重家教家风,是“二程理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二程是学易、用易、研易的大家,易学义理是贯穿二程理学的主线,特别是《程氏易传》在易学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探源易学齐家精髓文化,更有利于弘扬二程家风文化,进而为家风、家教提供借鉴。

一、二程家风文化的内容、特点与影响

(一)二程家风文化的主要内容

二程理学以“中、德、诚、敬、恕、公、正、仁、顺、和”之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提炼升华、传承弘扬、科学发展了孔孟儒学所注重的“孝悌忠恕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家风文化贯穿其中。

二程家族以《论语》中的《九思》为家训纲领,九思为: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得思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要想到看明白没有,听要想到听清楚没有,神态要想到是否温和,容貌要想到是否恭敬,言谈要想到是否诚实,处事要想到是否谨慎,疑难要想到是否要求弄懂,愤怒要想到是否有后患,有所得到时要想到是否理所该得。

“九思”讲的既是做人的道理,又是修养的功夫。现代广为流传的程子家训以“九思”为纲领,具体内容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朋友信。见老者敬之,见少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

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长于我,我必远之。勿谈人之短,勿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人有小过,以量容之;人大过,以理责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利己,勿嫉贤妒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义合之事则从。崇诗书,习礼仪,训子孙,宽奴仆。守我之分,听我之命。人能如此,天必从之。此常行之道,不可一日无也。”每读一遍这简明实用的句句真言,都会接受一次良好家风家训文化的洗礼。

(二)二程家风文化的主要特点

家国情怀的高站位、全面务实的大格局、言传身教的实力行,是二程家风文化最显著的三个特点。

古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共同体意识在二程修身立德、传承家风、治国平天下的行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二程家风彰显了家国情怀的内涵:修身立德、治国平天下重在精神层面的提升,而家庭是精神成长的沃土,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家风的涵养、家教的养成。

二程家风文化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方位对接,针对家庭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具有全面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呈现出了全面务实的大格局。程颐道:“天下之治,正家为先,家正则天下治;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身正而家治;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

用言传身教的方法,实实在在笃行传承,是二程

家风最为值得学习的方面。(1)孝廉家风世代相传。二程家族世代为官,孝廉为先。其祖父官为县令,俸禄多用于济贫救困,以致去世后其父程珦借钱安葬;程珦官至知州,因奉养寒士,生活十分节俭;二程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2)至诚事亲传为佳话。程氏家风以诚为本,弟子问程颐“何为孝?”程颐的回答是“至诚事亲则成人子”,意思是说,当孩子的要以至诚之心来孝敬父母,诚为孝之本。(3)父母是传承发展良好家风的主角。二程母亲侯氏知书达理,孝敬老人,相夫教子,收养孤儿,乐于助人,为程氏家族传承发展好的家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领儿向邻居道歉、教儿尊重奴婢、教子能屈能伸等故事为二程成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二程家风文化对整个社会家风建设的积极影响

二程家风文化对程氏家庭以及对整个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二程家族良好家风的哺育下,程氏家族亲人之间呈现的是团结向上互助合作的正能量。官宅民房连为一体,族训乡音融为一声,足见二程家风的强大感染力和坚韧度。二程上承孔孟,下启朱王,二程家风文化可谓家风家教精华范本,二程家教可谓言传身教的好教材,二程家族堪称治家典范。二程修身治家的思想、格言、家风、家训,对于当前进行道德建设、家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经典《大学》对后世诸家家风家训家教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二程都作了《大学》改本,都对《大学》这个文本做了改动调整。接下来就到了朱子的改本。朱子的改本吸收了二程对《大学》文本的调整,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学章句》的读本。“天下之治,正家为先。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天下之治,治家为先,家正则天下治。”这些经典内容成为了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并世代相传。

二、二程家风文化与易学

二程是易学传承发展的大家,一部《程氏易传》把易文化与程氏理学紧紧联在一起。二程家风文化是二程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易学中的主要齐家精髓,更有利于把握实质。

程颐解《易》,重义理而轻象数,主张“因象以明理”,认为“事尽天理,便是易也”,将《周易》视为天下万理的总括。他通过注解《周易》构筑了理学思想体系,同时也用理学思想成功地完成了对《周易》的解读。《程氏易传》是易学史上继王弼《周易注》之后的又一部义理派名著,对后世影响巨大。

易文化与程氏理学的关系可概括为以下方面。(1)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易文化是程氏理学的源头活水,程氏理学又丰富了易学内涵。(2)二者为纲与目的关系。易文化是总纲绳,程氏理学是纲绳下结出的目。(3)二者为体与用的关系。易文化是程氏理学的本体,程氏理学是易文化的具体应用和发扬光大。就易文化本身而言,《周易》与《程氏易传》之间是经与传的关系。做好易文化传承,既要坚守经之要义,又要通过“传”之转化发扬光大。(4)二者是守与化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对以易文化为源头活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树立起强烈的文化自信,进而通过学习感悟在传承中与时俱进进行转化,形成具有独到见解有力推动易文化精髓弘扬的“传”来。弘扬二程家风文化必须寻根溯源,学习易学中的主要齐家精髓。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明白要到哪里去,进而更好地把握要义、加深理解、继承发扬。

三、二程家风文化的易学探源

二程家风文化主要体现在家国情怀、立德为要、书香常绕、尊老爱幼、谦卑待人、尽责有序诸方面。这些方面均可在易学中寻找源头活水。

(一)八卦大家庭道出了齐家与治国的关系

八经卦构成了一个父母带领三男三女共八口人之家大家庭,每个八经卦分别对应一个家庭成员,即乾父、坤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欲想家庭和美,所有家庭成员就要各负其责、各守其位。乾坤二卦代表父母,在易学框架中排列为64卦之门户,称为乾元和坤元,故喻义扩展为天地、乾坤、国家与天下,展现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崇高精神境界。八卦大家庭、乾坤天地父母与六子女所代表的万事万物,道出了家国情怀,把修齐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诠释得淋漓尽致,二程家风中的家国情怀要旨来源于此。

(二)纳甲学问道出了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责任

何为纳甲?“甲”在这里代表干支,“纳”意为配应,纳甲指卦或爻配应于干支。易学之六爻纳甲依据“齐家”理念,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规则。

纳甲中的纳干表现为尊老爱幼(如图1)。十天干头尾各二归父母,甲为乾父下卦,壬为乾父上卦;乙为坤母下卦,癸为坤母上卦,是为尊老也。依序从小到大,分别把剩下的六天干分给六个子女,即丙少男艮、丁少女兑、戊中男坎、己中女离、庚长男震、辛长女巽,是为爱幼也。



图1 家庭成员纳干

纳甲中的纳支表现为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如图2)。阴支配阴卦,阳支配阳卦。即:阳性卦乾、震、坎、艮顺序从初爻向上依次数阳性地支(子、寅、辰、午、申、戌)至上爻。阴性卦坤、巽、离、兑逆序从初爻向上依次数阴性地支(亥、酉、未、巳、卯、丑)至上爻,是为男女有别也。

地支与各卦初爻的对照具有规律性可遵循。乾下卦初爻地支为子,上卦初爻地支为午;坤下卦初爻地支为未,上卦初爻地支为丑。三男卦震、坎、艮的初爻地支按乾下卦三爻地支顺序分配,即震/子、坎/寅、艮/辰。震与乾地支配置相同,体现了长子如父理念,顺序依长到少。三女卦巽、离、兑的初爻地支按坤卦二、三、四爻地支逆序分配,即巽/丑、离/卯、兑/巳,体现了女随母后,顺序排列也是从长到少,表明长幼有序。另外,八宫体现了族群,八世体现了辈分。这些义理观点在二程家风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五行生克装六亲道出了家风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周易把阴阳五行与家庭及社会的六个方面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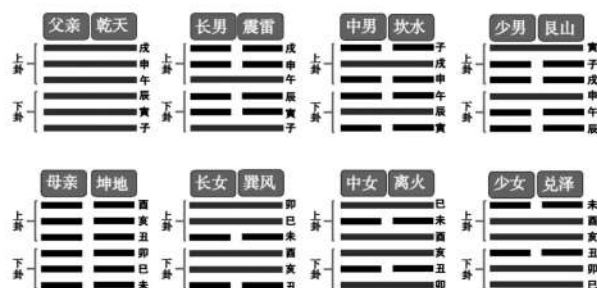


图2 家庭成员纳支

了起来,这六个方面称为六亲,即父母、主人、子孙、妻财、官鬼、兄弟(如图3)。先根据世爻等先决条件排出“我”即家庭的主人,尔后按照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推出六亲的关系来。六亲关系具体表述了和谐幸福家庭应具备的条件,即生我者为父母,我生者为子孙,我克者为妻财,克我者为官鬼,我比肩为兄弟。“生我者为父母”警示我们要孝敬长辈,时刻牢记父母生育之恩;“我生者为子弟”警示我们要关心下一代,时刻牢记养育后代之责;“我克者为妻财”警示我们要树立良好家风,管理好家庭成员,左右好钱财而不被钱财所左右;“克我者为官鬼”警示我们要遵纪守法,不妄为亢奋,“官”应理解为政策、法规,“鬼”应理解为自然社会规律;“我比肩为兄弟”警示我们要珍惜手足兄弟情谊,团结一致并肩前行。另外,防止隔代亲的溺爱、处理好婆媳关系、后代重在提升素质等方面也给予了警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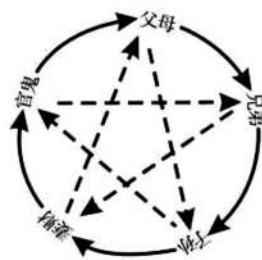


图3 六亲生克关系

为维系一个大家庭和谐幸福的局面,一家之主“主人”个人素质的养成、诸种关系的协调、义务责任的尽职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更离不开其他成员的积极配合,这些均贯穿于二程家风文化之中。

(四)蒙卦道出了启蒙教育与书香常绕的重要性
周易第四卦为“蒙”卦(䷃),道出了启蒙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营造书香常绕的

氛围,使人们解除蒙昧困惑,走向文明进步。本卦提出了“蒙以养正,果行育德”的大教育理念,也就是要通过启蒙教育去除蒙昧困惑,树立正确的思想理念,去果敢地进德修业,造福于人。本卦象为上艮下坎,艮为阻止、障碍,坎为困难、艰险。意为如果不加强启蒙教育,解除蒙昧困惑,人生征途就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艮又代表少男,坎又代表中男,更警示我们突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

本卦六爻诠释了通过启蒙教育营造书香常绕社会的六个重点问题。初爻是发蒙,启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通过教化规范人们的言行,弃恶扬善。二爻是包蒙,启示有教无类,全面教育。三爻是警示,以德统才,谨防图财忘义。四爻是困蒙,启示营造重视教育的环境,实施普及教育,注重教育公平。五爻是童蒙,启示教育要从早抓起,善始善终,注重教育公平。上爻是击蒙,启示对于不接受教育者,仍应坚持更为严格的教育说服措施,通过猛击一掌,使其自觉接受教育。蒙卦对于搞好家庭教育和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程家风文化非常鲜明地传承了蒙卦的精髓,并将其贯穿于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

(五)谦卦道出了正确的学习态度

周易第十五卦为“谦”卦(䷎),此卦是周易64卦中唯一的有吉无凶、有利无害之卦。“谦受益,满招损”,此乃天道法则,谦卦不仅道出了正确的学习态度,更是指导人们走向成功的路标,是人人、时时、事事的普适之卦,更是家风建设重要之卦。所以,曾有先哲说,学《易》懂此一卦,即可悟出做人之道。它使人懂得自敛,谦虚不自满,故本卦为唯一跳出“物极必反”周期率之卦。卦辞曰:“谦:亨。君子有终。”“谦”卦象为上坤下艮,坤为地,艮为山,高高的山自位在低低的地下,不显山不露水,可见足够谦卑的态度。坤为母,也喻示厚德载物的育人氛围,艮为少男,喻示学子在以崇德为主旨的母爱哺育下茁壮成长。

从卦象可以看出,良好的家教应持正确的态度。谦卦给出了“卑自以牧,谦极不反”的精髓思想,也就是说,要以谦卑的学习态度规范自己,懂得谦虚是成功之母的哲理。谦卦六爻告诉了我们谦虚使人进步的奥妙:初爻启示我们时时事事均应谦,学子之初更应重谦;二爻警示我们成绩面前更应继续持谦

不渝;三爻告诉我们功高位高更应谦,切忌居功自傲招致妒恨而不能善终;四爻更直言,谦无不利;五爻、六爻告诉我们,必须德威兼施,要刚柔相济治理不谦和的人或事,使谦敬礼让之风广布天下。谦虚学习、卑和待人、和谐相处是二程家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谦卦的卦义精髓在二程家风文化中得到了很好的转化和传承。

(六)咸、恒、家人三卦道出了不同阶段家风建设的重点。

“咸”卦(䷞)为下经第一卦。人伦之始,始于夫妻,夫妻关系的出现是文明世界的开端。咸卦为建立婚姻关系之前的互为了解的阶段,“心感为贵,以诚待人”为本阶段突出的重点。

咸卦辞为:“咸:亨,利贞,取女吉。”“咸”同感。也就是说,双方以真诚情感互为感化,求得同心协力精诚合作,形成万事亨通局面。心心相印、笃实和谐、谦让包容,这是婚姻的理想状态,会和睦吉祥,呈兴隆气象。

咸卦象为上兑下艮两经卦组成。兑为少女,艮为少男,表明了青年男女恋爱阶段应有的态度。少女兑为上经卦,上为外,喻为貌相,少男艮位于下经卦,下为内,喻为含章才华,也喻示出了传统文化中“男才女貌”的婚姻价值观。本卦六爻给出了很有借鉴意义的六条交流沟通原则:一要遵循人之心理规律,不可急于求成;二要心有主见,谨慎稳重进行;三要遇到障碍不可急躁,要逐一排解;四要重在心灵真诚沟通,不可三心二意;五要不存非分之想,重在真诚,不留懊悔;六要甄别真伪,谨防花言巧语以假乱真。真情实感、心心相印是构建和谐幸福家庭的基础,二程家风文化中突出彰显了“真情实意”这个问题。

紧接咸卦为“恒”卦(䷟),表达男女组成家庭后阶段在家风建设上应注意的问题。“恒道贵正,以变求恒”为本阶段家风建设的重点。

恒卦辞曰:“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也就是说,夫唱妇随,居家常道;雷风互应,随顺而动。持守正道,就会通达,顺利持恒运行。这就是“恒则亨”的道理。既要有恒常德性的原则性,又要有顺势

向前的灵活性,二者有机结合,适宜于干成任何事情,这是本卦的真谛所在。

恒卦象为上经卦为雷,下经卦为风。在家族成员排列组合中,雷为长男,风为长女。启示世人一旦确定婚姻家庭关系,成为家庭的主人,就要把握好“恒道贵正,以变求恒”的原则,追求白头到老,恩爱永远。长男在上,上卦又为外卦,表明男方为家庭的顶梁柱,为家庭持续发展的主动力。长女在下,下卦又为内卦,表明女方是操持好家庭内部事务的主角,为家庭持续发展的辅助力量。这就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家庭观的渊源。夫妻双方如何弘扬持恒的素质修养,进而寻求白头到老的目标?本卦六爻均有启示:要以初六与上六两个极端为戒,压力大环境劣要防止被压垮,夫妻双方要形成合力,共同克服万难坚持恒守;生活优越时,双方要防止大脑膨胀挑战恒守瞎折腾;要以九三为戒,免于不恒其德之羞,要以九四为警,要用恒定之心谋成功之事,不可跟着感觉走;要效法九二及六五,坚守中正之道,既采纳众意,又坚持真理,追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家和万事兴,白头到老随,风雷互应势,持守正道通。这是良好家风的具体表现。二程家风文化传承发展了这些方面的内容。

周易第37卦为“家人”卦(䷤)。该卦对于如何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全过程进行了很好的诠释。“修身齐家,治家如国”是家人卦的思想精髓。该卦辞为“家人:利女贞。”家人卦象为上经卦为风,下经卦为火。在家族成员排列组合中,风为长女,火为中女。启示世人:一旦为人之母,就要担当起养儿育女、经营好家庭的重要责任,主妇是家庭的主要角色,贤惠主妇是一家之福,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端正了家风,天下就会安定。长女又喻为婆婆,中女喻为媳妇,家庭和睦幸福的关键是处理好婆媳关系。综观该卦六爻辞,更富有哲理地告诉我们: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需要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全卦六爻就重视家规家教、当好慈母、严教子女、家庭和谐、当好负责任的父亲以及做威严的长辈六个方面阐明了基本的治家原则。初爻告诉我们,家有家规,以防范不良,消除懊悔之事;二爻告诉我们,家庭事务要按规矩行事,特别是要当好柔顺正贞之德的母亲;三爻告

诉我们,对子孙要严格管教,不能溺爱放纵;四爻告诉我们,家和万事兴,家人要各守其分,共建富裕和谐家庭;五爻告诉我们,要处理好大家与小家的关系,家长特别是父亲要治国不忘齐家;六爻告诉我们,长辈要有信有威,使良好家风代代相传。家人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全面诠释,将家风建设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功,特别强调女性在家风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如程颐“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的论述更直截了当地强调了这一点。这些精华内容在二程家风文化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四、结语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让我们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易学源头活水中寻找齐家文化智慧,不断发扬光大,进而把二程家风文化进一步弘扬好,把全社会倡导的家风建设推向更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 [1]王璋.周易大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 [2]程颐,撰.孙劲松,范云飞,何瑞麟,注.周易程氏传译注(上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8.
- [3]侯瑞华.二程家风与理学思想初探[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1):28-30.
- [4]吴建设.二程理学对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影响[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4):8-10.
- [5]贾秀梅.解构与传承:司马光家风家训及其当代价值[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67-71.
- [6]龚娱.论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及其时代传承[J].文化学刊,2020(12):127-129.

作者简介:王璋(1956—),男,河南方城人,第十三届郑州市政协主席,郑州大学特聘教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黄河科技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易经》《黄帝内经》等传统文化研究。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10期)

二程理学对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影响

◇ 吴建设

摘要:二程理学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对中国人内在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为中国人确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二是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三是超越一己之私,培养了廓然大公的浩然之气;四是张扬了中华民族重气节、重操守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二程理学;精神世界;中华民族

河洛地区是孕育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肥沃土壤。发端于伊洛之滨的二程理学,则是河洛思想文化、中原思想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在宋以后的主流价值形态,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为中国人确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二是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三是超越一己之私,培养了廓然大公的浩然之气;四是张扬了中华民族重气节、重操守的民族精神。

确立道德理想:以天理为核心

孔子的仁爱思想作为士大夫的道德理想,没有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准则。北宋时期,二程在重新阐发孔孟儒学经典的基础上,融合佛道思想,创立了以天理论为哲学基础的理学体系,并将孔孟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孝悌等纳入“理”的范畴,为普通民众建立起道德理想与道义自觉,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道义原则。这是二程为中国人建立道德信仰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二程的天理思想有丰富的内涵,包括自然规律和人伦道德等诸多含义。按照陈来先生的研究,天理即天道、物理、性理、义理。天道(天理)是自然法则,物理是事物的具体规律和性质,义理指社会的道德原则,性理则指人的道德本质和人的理性^[1]。在

这些概念中,对人性的研究(“性即理也”,人性禀受的天地之理,就是道德本质)、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研究(“德者本也,一德立而百善从之”“涵养须用敬”,诚敬为本的修身原则等)、对人的理性的研究(“理胜则事明,气胜则招拂”“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等)是二程关注的重要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说,二程理学是道德哲学,二程是“真正的人生大导师”^[2]。二程从人性的道德原则出发,经过心性的道德修养,完成了人的道德理性的塑造:发而皆中节的中和原则;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中道处事原则;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万物一体、天下大同的理性主义思维。

二程建立的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就是为百姓树立了日用而不觉的道德信仰。过去目不识丁的乡民也懂得为人处世要讲理,不能不讲道理,不能做伤天害理之事,否则将天理不容。这是二程理学深入民间的有力证明。做一个讲道理之人,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是今天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二程理学将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

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人类除了具有一般动物的生理特性外,还具有高于一般动物的精神生活。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文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

的儒学思想,高扬起博施济众、普爱天下的道德旗帜,促进了仁爱思想的发展。到了北宋时期,程颢认为,孔子的仁学还不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他从天人合一的思维路径出发,推论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3]15}。

仁者为何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里涉及程颢对仁的看法。程颢并不认为仁是爱,而是以生释仁。他认为仁中蕴含着无限生机,仁就像果仁一样,孕育着人世间的万千气象,生生不息地进行着创造,推动着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程颢从天人合一的思维出发,认为人本来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与自然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刻也不能分离。因而,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孟子说:“仁者,人也。”仁者,也就是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意思是天地万物都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天地万物的喜怒哀乐也就是自己的喜怒哀乐,天地万物受到伤害,就如同自己受到伤害。这就要求人在处事时,既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又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当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向自然界索取、开发时,要做到合理开发,考虑资源的永续利用,而不能竭泽而渔。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境界,是一种天德,是无私无欲、至纯至善的圣德,是一种只有圣人才有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儒家称为“大其心”,程颢称为“大其胸”,程颐称为天地之量。“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钟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江河之量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惟天地之量者,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3]108}这种思想境界,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称之为一个人有大胸怀、大格局,有大气度,能干大事。

人具有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境界,就会有前所未有的体验与快乐,就会使人产生如程颢所说的“大乐”,“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这是一种超越了道德自律的真切感受,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心灵愉悦。在日常生活中,当你为路边的乞丐施舍时,当你救起受伤的哀雁时,当你走过绿意盎然的花园时,当你仰望湛蓝的天空、呼吸新鲜的空气时,你才能体

会到这种出自内心深处的快乐。人具有这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境界,是人性的张扬与提升,是人生境界的开拓,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超越一己之私,培养廓然大公的浩然之气

公与私是所有人必须面对两种价值观,是儒家义利之辩的核心命题,也是一个人是否具有浩然之气的基础和前提。

程颢首先从自然万物的属性来启示人们确立公心思想。程颢在《定性书》中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3]460}程颐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尔,人能至公,便是仁。”^{[3]439}人如果能有大公之心,就会有仁爱之心。

二程认为,具有公心的人,思想境界高远,具有阔大的心胸。程颢说:“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渺然一身,立于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异也。”^{[3]1172}程颐说:“无私,天德也。”^{[3]764}天德,就是天之大德,就是博施济众的大德。程颐认为,这种具有无私之天德的人,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二程还认为,私心、私欲盛的人,境界不高。程颢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3]42}程颐也说:“至公无私,进退以道,无利欲之弊,以谦退自处,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虽有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鸟已已然也。”^{[3]1069}

超越一己之私的廓然大公,能生发人的浩然之气。人是自私的动物,天然有为我、利我的情感与倾向。在面对物欲诱惑的时候,如果不能超越这种利己的私欲,人就会被物欲所化,成为金钱的奴隶,只有超越一己之私,才能生发人的浩然之气。程颢说:“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不害,则塞乎天地,一为私心所蔽,则欲然而馁,却甚小也。”^{[3]20}“只著一个私意,便是馁,便是缺了它浩然之气处。”^{[3]29}在程颢看来,要养一个人的浩然之气,根本的在于“至公无私”。二程对一己之私的内在超越精神,为文人士大夫树立了精神标杆,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立视不义如浮云的高洁之志。

浩然之气,是人的大公之心、无私无我精神的外在表现,是一个人内心高洁、纯粹至善内在品性的外

在流露,是当前亟待弘扬的中华民族的昂扬正气。

张扬了中华民族重气节、重操守的民族精神

气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的体现,涵盖了这个民族的心性、心志、精神状态的诸多方面。从程颐对涵养心性的表述到程颢对廓然大公的公心的张扬,从二程对义利之辩的阐发,到二人的道德实践,都为我们展示了一副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

二程年少时曾受到周敦颐“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人格的感染,受到“孔颜之乐”的心灵滋养,慨然有求道之志。他们浸润在古代圣贤的思想精华之中,领略到了圣贤思想的天地境界、修齐治平之志。二程的天理思想,是中国人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出现了以“理”抗势的士大夫精神。程颐重视人的心性、心志的涵养,认为心性、心志的涵养可以使人面对生死考验而不动心,“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3]321}。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心志正,炎热的夏天也不会感到烦躁,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感到战栗,没有什么感到愤怒的,也没有什么感到可喜的事,荣辱升降也不看重,生死也不在乎。这就是一种大丈夫精神、大丈夫气节。

程颢从树立人的廓然大公思想出发,培养人的不为一己之私所累的大公境界,由大公境界生发出人的浩然之气,由浩然之气涵养人的刚直气节。程颢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表现了他超越富贵、贫贱的男儿气节。程颐也说:“至诚无私,可以蹈险难者,乾之行也。”^{[3]764}至诚无私的人,可以历艰难险阻,执着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在这种精神气节的引领下,二程特立独行,表现了以理抗势的独特人格操守。程颢在朝中任监察御史,因与王安石变法意见不合而被贬外任。宋神宗爱惜其才,不忍外放,后经程颢几次请辞,宋神宗让他到京西路任提点刑狱,程颢以职务高于所任监察御史而坚决不从,最后到澶州(今濮阳)当了判官。程颐在给宋哲宗当

老师时,提出“格君心之非”的思想,言历代讲官所不敢言。程颐晚年被流放涪陵,在一次乘船时,因浪大几乎翻船,一船人大惊失色,只有程颐凝然不动,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临生死而不动心的心魄与气节。

在二程理学以心性修养而涵养出的浩然之气的影下,从南宋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勇于为信仰献身的士大夫。姚瀛艇先生在论述二程思想时说:“从长远看,士大夫的节操,也因重整伦常而大为发扬。宋以前,王朝灭亡,为之死难者不多,而投靠新朝者不少。……南宋灭亡时,不仅出现了象陆秀夫那样慷慨死难的志士,而且出现了象文天祥那样从容就义的仁人。明朝灭亡时,殉难死节的人就更多。如史可法、张苍水、阎应元、夏完淳等。这些人物的产生,不能说与二程思想的传播无关。”^[4]近代以来,许多为国捐躯的英烈,无不是胸怀忧国忧民之志、胸涌浩然之气慷慨赴死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二程理学倡导的以天理为核心的价值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境界、超越一己之私的浩然之气、重气节重操守的精神追求,仍然可以为我们建设精神家园提供精神滋养。

参考文献:

- [1] 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79.
- [2] 钱穆.钱穆先生全集:宋明理学概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3]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 姚瀛艇.论二程思想[J].河南大学学报,1985(4):81-86.

作者简介:吴建设(1956—),男,河南嵩县人,嵩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副局长,现为嵩县二程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二程理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二程理学思想当代价值研究。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二程理学是中原学的灵魂

◇ 魏 涛

摘要:作为对北宋以前中原文化整体提升产物的二程理学,是中原文化中最为精粹的部分。它充分吸收了历史上的佛、道、墨等诸家思想,熔铸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为从根本上实现儒家伦理纲常进入寻常百姓家建构起了完整的传承谱系,有效回答了人们的伦理行为的根本动力和至高规约问题。二程理学应当成为中原学建构时所应充分重视的灵魂性文化要素,应当成为显豁出鲜明中原特色的文化标识性的思想资源,也应当是中原学建构的核心与枢纽之所在。抓住了二程理学的核心价值,也就把握住了当代中原学理论构建的关键。

关键词:二程理学;中原学;中原文化

作为当代中原学建构的首倡者,李庚香早在2005年就针对重塑当代河南新形象问题,提出了“文化形象再造”及“建设文化河南”的新思路,这可以视为其中原学理论建构的肇端。后历经十余年的酝酿与沉淀,他在《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一文中正式提出建设“中原学”的构想。他把提升河南的文化软实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振兴河南文化,重塑河南形象,提炼新时代的“中原文化精神”,引领未来河南经济社会建设的潮流等作为“中原学”建构的理论旨归,并且对“中原学”的地域范围、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主体做了清晰的界定。^[1]这给当代“中原学”的理论建构指明了方向。2020年,张新斌在详尽阐释了中原学研究基本概念的前提下,又对中原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研究中原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新时代中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概括^[2]。这一概括将中原学的学科架构从历史引向了现实,强化了中原学建构的现实导向和问题意识。在当前众多的中原学研究中,大家都认识到要实现跨学科的协同推进,内容上应该囊括整个中原文化,但到底如何提

领中原学,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到底何在?这一问题解决不好,中原学则会成为由根亲文化、黄帝文化、玄学文化、古都文化、民俗文化堆砌起来的松散联合体,从而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中难以实现持久有效的发展。

中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文化高峰的形成,都与中原学者的参与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高峰之一的宋明理学,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达数百年之久,甚而远播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促成了备受世界瞩目的儒学文化圈。毋庸置疑,北宋时期河南籍学者程颢、程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整合对于这样一种重要趋向的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二程理学为灵魂,凝聚整合中原文化的丰厚资源,构建当代的中原学,提领中原文化的当代价值,乃是依时顺势之举。

一、二程理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罕有其匹”

首先是方法的高度。“以天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核心。所谓以天为则,就是以天为效

法的榜样。这一思维由来已久,从《尚书》的“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到孟子“诚”与“思诚”的理论辨析,再到《中庸》的“诚者”与“思诚者”,荀子的“不诚则不能化万物”,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和《易传》君子法天立德的思想,可以说法天思维成为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重要方面。二程继承了古人的这种论证方法,将天拟人化。在他们看来,天地为什么是公正的?因为日月无私照,天地无私载。它不偏袒任何人,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天理。天地运行遵循一定的规律,违背其规律,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天理不可欺。在天道规律面前,人应该遏制自己的欲望,维护公众的利益,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这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方法,是一种哲学思维、人文思维,不能拿科学思维来否定它。“以天为则”的思维尽管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但只有至二程,才真正实现了上下本末一以贯之,真正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的自然义、主宰义、义理义等融为一体,真正体现了其对道德理性之超越性与绝对性的准确而富有深度的把握。

其次是核心范畴“天理”的高度。经过唐末五代之乱,宋朝汲取历史教训,很快实行了重文抑武的政策。受其影响,儒家思想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从宋初三先生到北宋五子,儒家哲学在充分吸纳佛道等诸家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返本开新,达到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新高峰。周敦颐开创了本体宇宙论的新儒学思维体系。邵雍精于数理而构造出了皇帝王霸的历史哲学体系。张载勇于“造道”,以“太虚即气”的命题实现了本体与工夫的合一、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合一,扭转了诸子“有有无之分”之浅陋和“体用殊绝”的局面。二程则进一步以“天理”为宗,用理气论、心性论、中和论、格物致知论和工夫论,建构起了一个奠定后世理学发展纲维的博大理论体系。二程兄弟紧紧抓住当时儒学出现的核心问题,从儒家思想的本有资源中拣择出“天理”二字作为应对佛老“空”“无”的核心范畴。如其所言:“吾学虽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里的“体贴”浸透着二程兄弟对儒家伦理纲常失范的根源性思考。发源立本固然是作

为当时许多儒者的普遍思路,但是却以二程对于立本问题的解决最为有效。二程对“天理”的拣择和重视,被后世所广泛传扬。

再次是贯通上下本末的“公心”的高度。二程所提出的公心思想亦是展现其理论高度的重要方面。第一,程颐提出天心即公心,天理即公理,天理即是人理。程颐指出:“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尔。人能至公,便是仁。”^{[3]439}程颢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3]450}程颢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3]460}人应当效法天地,开阔眼界,心包万物,以公心对待自然万物,对待社会人生。程颐说:“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3]214}意思是说,人连这个天理都不能存,那还是人吗?人理是对天理的认知,而存天理则是人的本质属性。第二,从社会伦理道德层面来看,二程以公释仁,提升了仁爱的思想境界。程颐在回答什么是仁时说:“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3]285}“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则不忠,公理则忠矣。以公理施于人,所以恕也。”^{[3]372}“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体,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3]360}在社会层面,二程将仁与公联系起来,将人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层面,扩大了传统仁学思想的内涵。从政治哲学层面来看,将为公还是为私作为检验治国理政是非得失的标准。程颢说:“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3]142}“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公生明。”^{[3]367}程颢在地方为官时,能够做到“视民如伤”,关爱百姓,为百姓排忧解难。这是“以身体道”的表现。第三,在个人道德修养层面,程颐非常重视修身养性、实践养成。他说,“人只是一个习”^{[3]190}。只有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才能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程颢指出:“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以天地无异也。”^{[3]1172}朱熹在《近思录》中对二程的公心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人心只是为“公”

就能把握好外物和自我的关系,这就是“仁”能够使人做到“恕”和“爱”的原因。“恕”是“仁”实行后的结果,“爱”是“仁”的作用。二程所言之“公心”,上下兼该,本末一贯,是真正展现二程思想高度的重要方面。

二、二程理学有效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理论提升和创造性转化

二程针对唐末五代后的纲常废弛局面,从儒家思想体系中拈出“天理”二字形成对传统儒学的体系化重构,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从语源学的意义来看,“天理”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庄子·养生主》说:“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4]119}《庄子·天运》说:“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4]502}《韩非子·大体》论及天理时说:“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5]在这些命题中的“天理”,完全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应该追溯到《礼记·乐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6]尽管这里已经将“天理”和“人欲”相对应,但实际上所提及的“天理”仅限于一般的规律层面,带有明显的具体之理的意味。

由此可见,“天理”一词虽然不始于二程,但二程在前贤的基础上,给“天理”这个词注入了新的内涵,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由一个表征纹理、规律、具体之理的词语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层面。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3]31}

尤其是他们把道家的“天理”和儒家的“天理”融为一体,更准确地说是把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二程的天理论中所谓的天理,既包含了自然之理,又包含了人伦之理。在理与物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先有理后有物。实际上,就理与物的关系而言,二程理学除了接受道家所谓“无所不在”的“道”的思想之外,还接受了佛教的影响,引入了佛学关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映万川”的观念,提出了“理一分殊”的重要理论。作为程门弟子和朱熹老师的李侗曾说,儒学与佛老等异端之学的差别即在于理一分殊。天地万物由一个共同的“理”所统摄,这个“理”渗透在万物之中,就像天上那一个月亮把月光投射到所有的江河里,使得“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从而使万物都具有这个“理”。他们把天理独立于物质世界之上,认为天理是万物的主宰,把“天理”作为理学的最高范畴,把天理提升为宇宙的本体,天理成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

二程将天理作为整个思想的核心,以资统领其思想的方方面面。他们提出“万理归于一理”^{[3]216}。在他们看来,天、命、道只不过是理的不同称谓而已,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把根据人类社会的类比而设想出来的自然法则转化为理性的法则。故而,他们坚信万物由一理贯之,理作为本性存在于人自身,此点对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贡献卓著。正像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所言:“如此伟大的成就,只能是经过长时间发展的结果。在这之前的一千五百年间的概念逐渐浮现出来,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会显示,早期的思想家已经为二程开辟了道路。但不管怎么说,被嗣后800年间的儒家学派所接受的理的学说,清清楚楚的是二程兄弟的发明创造。”^[7]二程的思想经过朱熹的理论改造之后,其“天理”论更是成为程朱理学在理论上的立足之本,使儒学在更为广泛、深入的层面得以发展,并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指南。

三、二程理学展现出了空前广阔的理论面向

二程理学既明“大道精微之理”,又能够“发用流

行”,实现“明体达用”,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展现出广阔的理论面向。

唐五代以降,佛道二教价值观的传播,导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8]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致使儒家纲常废弛,道德沦丧,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倾覆和意义危机。包括二程在内的宋代知识分子为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纷纷担负起重整伦理纲常,重建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等形上信仰系统与形下实践系统的重要责任。在当时很多士大夫看来,儒学衰微一方面在于佛老的挑战,另一方面则在于汉唐儒家经学的烦琐化、教条化所致。学者们认识到,孔孟之学既遭秦焚书坑儒之灾,又遭汉儒章句传注之繁,丧失源流之正,出现了“文胜质”“博溺心”的弊端,造成“淫辞诡行”昌盛,而“妙道至言”隐退的情境。程颐曾批评汉儒解经:“《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不足道也。”在他们看来,只有从笃守汉唐儒家经典文本的章句训诂中解放出来,从严格的“师法”和“家法”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从“疏不破注”的陈陈相因之旧注体系中解放出来,才可以实现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赋予儒学新生命。

宋明理学构建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针对佛老之“虚妄”,批判其在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上“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不知死生之说”。二程亦是如此,他们通过至实之天理来统领其整个思想,建构起了一个与佛老之虚理相抗衡的足以为儒学发源立本的实理学说。故其后学不仅谈学论道,而且能“明体达用”,凡事秉持“实理”和“实体实用”,多不空言性命义理。例如,元儒许衡“既逃难徂徕山,始得王弼易说,夜思昼颂,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9]411}。明初曹端“造诣笃实,教人务躬行,日事著述,坐下足着两砖处皆穿,得之专静。事父母最孝,及遭丧,五味不入口,寝苦块,始终不易”^[10]。明代中州后学高拱提出了“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他认为认识对象和认识客体都有其“实情”,“夫事有本情而人有本心,出吾本心以发事之本情,则议论而道不悞,作之于事,可推四海而准,通千古而不谬”^[11]。高拱还批判

了天人感应论、灾异谴告说、五德终始说等神学目的论和宿命论,构建起唯实论为特征的无神论。明儒薛瑄教人“以从事小学以及大学由洒扫应对以至于精义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经以求其道也。不事语言文字而必责之诸躬行”^{[9]426}。明儒阎禹锡“励名节,敦士风,抑词章之习,明本原之学,取性理诸书,为士子讲明之”^{[9]428}。南阳后学王鸿儒教人“以涵养为本,文艺为末”,“为学博览,大要以穷理致用为主”^{[9]452}。安阳后学崔铎曰:“日诵五经,不力行,但得其字耳。心无定静之力,即行亦迹耳。”^{[9]15}弘农后学陈云达曾告诫时贤崔铎:“一曰日用间须点检口之所言,与身之所行,不相矛盾,斯为善学;二曰躬行伦理而不亏,人之至者,莫是过矣;三曰公正处己,宽恕待人,自不觉其地位高矣。”^{[9]438}

二程认为:“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3]186}这是二程理学建构时直接针对的问题。正是缘于此,二程理学“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即“只是一个涂辙”。程颐说:“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至于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后来人言性命者别作一般高远说。”^{[3]162}程颢说:“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3]188}二程不仅仅在对天道性命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理论辨析,而且能够将天道与人心相关联,内圣与外王相贯通,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在推进汉学向宋学的转型,扭转汉唐以来儒家伦理纲常废弛困局,确立百姓日用伦常之本等问题上,疾虚妄,明实理,展现出开阔的理论面向。

四、二程理学充分展现了中原文化的兼容并包精神和开阔理论视野

二程理学充分吸收了历史上的佛、道、墨等诸家思想,熔铸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展现出开阔的理论视野和高度文化自信。

二程基于宋代“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实际情况,在从政治伦理及思想理论层面对佛老进行批判

外,还从各个方面借鉴佛老思想,以资构建其思想体系。佛学把佛性、真如等作为本体范畴,认为其含蕴众妙,寥廓无涯,无方所,越思议,永恒独立。二程借鉴这一观点,站在儒家的本位立场,构筑起影响深远的天理论。二程认为:“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3]139}他认为理气之间、本体和现象之间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而这与华严宗的观点非常相似。华严宗认为:“此诸界为体,缘起为用,体用全收,圆通一际。”^[12]“观体用者,谓了达尘无生无性一味是体,智照理时不碍事相宛然是用。事虽宛然,恒无所有,是故用即体也,如会百川以归于海。理虽一味,恒自随缘,是故体即用也,如举大海以明百川。由理事圆融,故体用自在。”^[13]华严宗所提出的即体即用的思想,被二程所吸收。弟子尹焞说:“莫太泄露天机否?”对于华严宗对程颐的影响点得非常明白,对此伊川称赞道:“汝看得如此甚善。”^{[3]439}此外,二程还吸收禅宗“平常心是道”的观点。二程认为,洒扫应对这样粗浅的事务与穷理尽性这样高深的事情之间没有半点距离:“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至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3]152}程颐自己也承认“洒扫应对,与佛家默然处合”。二程与佛学都主张体用合一,差别在于二程并不否认现象界的真实性。此外,程颐还吸收了华严宗的“一多相摄”的思想。此可以通过程颐针对学生的答疑看出来。当学生问程颐:“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关,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程颐答道:“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3]195}

二程除了对佛教思想有所吸收外,对于道家、道教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汲取。从本体论上来看,二程所标举的“天理”范畴是道家首先提出来的,故张岱年先生曾说:“伊川的理之观念,实是古代道家之道的观念之变形。”^[14]面对道教的养生延寿之说,程颐说:“世间有三件事至难,可以夺造化之力:为国至于祁天永命,养形而至于长生,学而至于圣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胜造化,自是人力可以

胜造化,自是人不为耳。”^{[3]291}在二程看来,只要人肯努力,胜于造化而长生是有可能的。从中可以看出,程颐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观点的影响,提出了“夺天命”的主张,“盖虽是天命,可以人夺也。如仙家养形,以夺既衰之年,圣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为有这道理”^{[3]30}。二程不否定道家、道教的养气工夫,只是否定道教的成仙理论。此外,二程还吸收了道家、道教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把天理也说成是自然的:“道、理皆自然。”^{[3]32}“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如此。”^{[3]30}天理自然,人不应以己意代替天理,否则天理就不是天理了。

二程立足儒家本位,通过广泛吸收包括佛道在内的传统思想资源的精华,通过对“天理”核心范畴的统领,实现了儒家经典系统由“五经”向“四书”的转移。这样的理论建构特点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后的儒学基本都是沿着大程和小程所开辟的路径而展开,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稳定而统一的思想格局。这不能不说是开放包容精神及开阔理论视野所显发的作用。

五、二程理学的历史影响在中原文化的谱系中无“出其右者”

通观整个中原文化的发展谱系,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像二程理学一样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持续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达近800年,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像二程理学一样在整个东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众所周知,汉唐时期,儒学在佛老的冲击下,其理论地位日渐下滑,以致出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为扭转儒家伦理纲常废弛的格局,自韩愈始,儒家知识分子便从不同的路径入手,从立本处着眼,力图重建儒家的理论体系以应对佛老。这种理论改造运动至北宋庆历之际已表现得轰轰烈烈,加之政府“崇儒”政策的推动,使得当时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出现了宋初三先生和范仲淹、欧阳修等对儒家思想传播与践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也孕育出

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涑水之学和三苏的蜀学,最为重要的是催生了周敦颐濂学、邵雍先天学、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从历史事实来看,王安石的新学统治思想界达半个多世纪,而周、邵、张、程之理学却仅只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并未占据思想界的主流。然理学因从儒家传统的“性与天道”问题立论,本着“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思维模式,强化了儒家在天道与心性相贯通问题上的论证,彰显本体论、心性修养论的重要地位,使其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被历史所选择,成为占据思想主流达数百年之久的官方哲学。二程兄弟所创立的洛学,立辟各家之失,综合中原传统思想之精华,重构儒家思想体系,遂使从游者甚众。加之杨时、谢良佐、游酢等弟子的发展与传播,对于此后的湖湘之学、朱熹闽学、陆九渊心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经杨时、罗从彦、李侗,传至朱熹那里,其理论被全面继承并广泛传播,这为此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思想史上来看,二程理学通过伦理纲常绝对地位的确立,使得历代统治者看到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是基于此,后世尽管存在着持久的朱陆之辩,但对于由二程所挺立出来的理学价值观的核心——天理的态度却是共同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量,二程理学在形成以后,代代相沿,绵延不绝,在后世的传承发展中,自觉形成了一个学风一贯、谱系完整的洛学思想史,成为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原学统的不二体现。理学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广泛传播,“其入秦也,以三吕;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谢湜、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数君;其入吴也,以王信伯”^[15]。二程理学先后衍生出湖湘之学、陆王心学、朱子学、永嘉学派等,对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伊洛渊源录》《儒林宗派》《宋元学案》及王巧生博士的考订,二程的亲炙弟子(不包括再传弟子和私淑弟子)共有70人。其中,最著名的有杨时、谢良佐、游酢、尹焞和吕大临等人。在中原大地,洛学自宋而后,代有传人。宋有邢恕、吕希哲、朱光庭、李吁、刘绚、谢良佐、邵伯温、耿

南仲、尹焞等人;元有姚枢、许衡;明朝有曹端、薛瑄、王廷相、何瑭、崔铣、尤时熙、高拱、吕坤、孟化鲤、杨东明和吕维祺等人;清代有孙奇逢、张沐、耿介、汤斌、张伯行、田兰芳、冉觐祖、李来章、马平泉等人;清末民国则有李敏修、王锡彤、嵇文甫、冯友兰等。《中州人物考》《洛学编》《中州道学存真录》《中州道学编》《洛学编续编》《洛学编补编》《洛学拾遗》《洛学拾遗补编》《中州先哲传》《中州学系考》等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洛学在中原的传承谱系,对于深入认识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原学统,把握二程理学在河南的历史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迄至现代,河南籍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1895—1990)承接宋明理学尤其是二程理学之思想脉络,融合吸收了西方的新实在论,创立了新理学的理论体系,成为与贺麟的“新心学”、张岱年的“新气学”相并立的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他将二程理学的“理”“气”等观念作为核心范畴,综合运用“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原理,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尤其是程颢哲学中的境界意义与直觉体悟方法,形成了其“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有机结合,熔铸出在现代新儒学中卓有影响的理论体系,将二程理学在现代哲学理论中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冯友兰的新理学,在客观上也使得二程理学的研究在现代学术界逐步发展成为理论探讨之重点所在。

从对海外的影响上来看,元代以后,一方面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得以确立,使其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得以在士大夫中间广泛传播开来,进而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亦从程朱理学获益良多,不断引进其理论资源,并自觉地结合本国特点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得在海外也出现了程朱理学热。二程理学尤其是经由杨时、李侗的衔接,由朱熹集其大成的程颐之学,对东亚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南宋末期,朱子学即传入日本,在室町时代,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宋学由禅僧传入日本,此后逐步脱离禅学而独立传播。之后在江户时代,朱子学作为一种文化体系,逐步被移植入日本土壤并渗入日本的封建制度

之中。在此期间,产生了藤原惺窝(1561—1615)、林罗山(1583—1657)、木下顺庵(1621—1698)等著名的朱子学者,孕育出了在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京都朱子学派。高丽末期,为解决朝鲜国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如安珦(1243—1306)、禹倬(1253—1333)等接受了程朱理学,经其大力弘扬,逐步发展成朝鲜的朱子学。经过以李彦迪(1491—1553)为代表的主理论、徐敬德(1489—1546)为代表的主气论的论争,逐步形成了在朝鲜历史上影响颇大的李滉(1501—1570)的退系学派和以李洱(1536—1584)为代表的栗古学派。尤其是在李滉的推动下,其所推崇的程颐的“居敬穷理”论在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结语

在区域文化研究的热潮中,陕西、湖南、四川、浙江、江西等省在大力推进关学、湖湘之学、蜀学、浙学和赣学的研究与弘扬,如何凝聚起河南传统文化的优势资源,建构起完整的足以展现中原历史文化特质和优势的中原学谱系,是当前中原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原的文化沃土上涌现出河洛文化、殷商文化、诸子文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法家文化、佛家文化、汉文化、宋文化、黄河文化等,这是河南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所在。面对这些思想和学术资源,中原学建构必须全面把握,高度重视,也要重点突出,不可四面开花,既需要从点到面再到网的体系化建构,更需要核心和灵魂。基于二程理学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有理由坚信以其为核心足以建构和提领起整个中原学的框架和脉络。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二程理学是中原学的灵魂,是当代中原学建构的核心与枢纽之所在,抓住了二程理学意蕴及其现代价值的发掘,也就把握住了当代中原学理论建构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李庚香.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J].河南社会科学,2016(6):8.
- [2]张新斌.中原学相关学科的讨论及学科体系的初步架构[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0(10):19-23.
- [3]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王先慎.韩非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209.
- [6]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984.
- [7]葛瑞汉.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46.
- [8]欧阳修.唐废帝家人传[M]//新五代史: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173.
- [9]刘宗泗.中州道学存真录[M].刘氏传家集本.
- [10]耿介.中州道学编[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1上.
- [11]高拱.本语自序[M]//高拱全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225.
- [12]法藏.华严策林[M]//大正藏:诸宗部卷四十五.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2-1934:597.
- [13]法藏.华严经义海百门[M]//大正藏:诸宗部卷四十五.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2-1934:635.
- [1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8.
- [15]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叙录[M]//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5-6.

作者简介:魏涛(1978—),男,陕西西安人,郑州大学副教授,国学系主任,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主要从事张载关学与宋明理学研究。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